



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

一. 安徽省

2006年,安徽省的考古工作依然是围绕重点建设工程进行的。配合交通、能源、水利、工业园区、城市和新农村建设工程,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此外,还进行了巢湖流域先秦遗址专题调查。全年累计新发现文物点百余处,完成考古发掘项目25项,发掘古文化遗址3000多平方米,清理历代古墓葬500多座。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 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存

1. 塘岗遗址

塘岗遗址位于合肥市郊区西北部,董铺水库上游,淝水南岸。遗址主体分布于台地顶部,平面近似椭圆形,东西长264米,南北宽136米,总面积约35900平方米。在建的合淮阜高速公路由遗址西部通过,2006年3月至8月,对公路占用部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合计发掘面积1635平方米。

根据发掘情况,塘岗遗址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其年代大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器形有罐、钵、盆及扁三角形鼎足等。第二期年代约相当于岳石文化时期,陶器有鼎、罐、尊、碗、钵等,从器物形制特征看,带有明显的岳石文化风格,无疑与岳石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本地特点。带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遗存在安徽淮河流域有较广泛的分布,但以往发现的资料较少,特别是缺乏完整的器物。塘岗遗址此次出土成组的较典型的岳石文化陶器,对于研究江淮地区与岳石文化的关系,应具有重要的作用。

2. 繁昌鹭鸶墩遗址

鹭鸶墩遗址位于繁昌县峨山乡沈弄村东北约500米的台地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距繁昌县城约4公里。2006年11~12月对该遗址中西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

该遗址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黑陶和黑皮陶也有发现;器形有鼎、豆、罐、钵、纺轮等;纹饰有刻划纹、附加堆纹、指窝纹、弦纹,并有彩绘陶片发现。石器相对较多,计有镑、铲、凿、刀、锥、钺、锛、砺石、镞、网坠等。从器物特征观察,与良渚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但仍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经正式发掘的较少,此次发掘所获的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对建立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和编年具有重要意义。上层为西周时期遗存,遗迹有灰坑、沟、墓葬、房基、柱洞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及铜器。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红陶次之,印纹硬陶、原始瓷较少;器形有高、鼎、甗、罐、豆、簋、钵、纺轮等;纹饰有绳纹、刻划纹、附加堆纹、指窝纹、弦纹、印纹,素面陶渐多。石器以青石质为主,砂石、岩化石次之,计有斧、镑、锛、凿、铲、刀、镰、镞、锥、拍、砺石等。骨器有锥、镞二器。铜器仅一件残削。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西周晚期。

3. 旗山战国墓群。该墓群位于枞阳县城东约1.5公里处的枞阳镇旗山村的低山丘陵地带,分布在大约直径2.5公里的范围内,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分别作过零星发掘。2006年发掘清理战国中晚期墓葬72座。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从墓坑形制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带斜坡或竖穴(井)式墓道,其中M18有一级台阶;第二类为不带墓道、台阶的宽坑墓;第三类为窄坑墓。第一、二类墓绝大多数呈东西向,墓室长3~4.7、宽1.6~4.4、深2.2~5.5米,墓坑一角往往有脚窝,葬具多已完全腐烂,从残留痕迹看多为一棺一槨或单棺(第一类墓少数可能为一槨重棺),棺槨下多有两根横垫木(残存垫木槽)。多数棺槨以青膏泥密封。第一类墓不见头龛和生土二层台,第二类墓少数带头龛和熟土二层台。第三类墓多呈南北向,墓坑长1.8~2.5、宽1.1~1.5、深2~2.2米,带头龛和生土二层台,葬具为单棺或无棺。

第一、二类墓葬多随葬陶礼器,少数随葬青铜乐器,此外随葬陶质生活用品。第二类少数墓葬中发现原始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第三类墓葬则以随葬陶质生活用品为主。青铜兵器则在三类墓葬中均较常见。

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鼎、盖豆、壶;陶质生活用品主要有豆、罐、长颈壶、钵、盂、盆、碟、盘、匜、勺等;印纹硬陶器主要器类为罐,多饰细方格纹;原始青瓷器仅见甗一种器物;青铜器有勾、素面铜镜、剑、戈、矛及其附件鐏、镞等;琉璃器仅见琉璃管等小饰件;铁器有铁剑,墓葬填土中发现铁斤,应为加工墓坑的工具。

另有12座墓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其中第一类墓1座,

第二类墓10座,第三类墓1座。

4. 潜山林新战国墓地

该墓地位于潜山县梅城镇七里村林新组,东北距县城和彭法山战国西汉墓群约三公里,东临潜水,西为103国道和合九铁路,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战国晚期到两汉时期的古墓群。

墓葬多为中、小型墓,均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土(岩)坑竖穴,其中最大的45号墓带斜坡墓道和一级台阶。部分小型墓带生土或熟土二层台和头龛,方向以南北向为主。葬具有一椁重棺、一椁一棺、单棺或无棺四类,葬具均以青膏泥密封。

随葬品主要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漆木器(多已腐烂不存)。小型墓青铜器均为兵器,如剑、戈、矛等,只有规格较高的M45随葬青铜礼器、乐器、酒器和玉器。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鼎、豆、壶、鼎、盒、壶和鼎、盒、钗,生活用品和明器有些不易区别,主要有盘、匜、勺、豆柄壶等。

45号墓是该墓地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有封土、一级台阶,带斜坡墓道,基本呈南北向,墓口长8.6、宽7、深约7.6米,口大底小,墓道长6、宽2.4米,葬具为一椁重棺,其中外棺为长方形盒状棺,内主棺为悬底弧棺,随葬青铜礼器鼎(2件),乐器铎,酒器匜,车马器轡、箍、马衔,兵器剑、戈、矛、戟、镞等,共19件(套),镇墓兽1件,陶礼器鼎、盒、钗2套,玉璧1件。

旗山墓群和林新墓群发掘的这批战国时期墓葬,从形制和随葬陶器特点及基本组合看,应属以楚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墓葬,少数墓葬可能属越人或越遗民墓。

(二) 汉代考古

1.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和汉六安国王陵区的发现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位于六安市金安区卅十铺镇双墩行政村长岗自然村东北300米,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沪汉蓉客运专用线(合肥武汉段)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2007年1月发掘。双墩呈南北对称分布,为并列双冢墓葬(南墩编号一号,北墩编号二号)。一号汉墓位于铁路路基上,封土底径50米,高10米。封土呈馒头状堆积,土质结构较松,未发现夯打迹象。墓坑为土坑竖穴,形状呈“中”字形,由墓道、椁室、题凑、回廊和外藏椁组成,墓葬全长45米,墓口长17、宽12米,东墓道长20、宽7米,西墓道长8、宽4.5米。

墓室为“黄肠题凑”结构,重椁重棺。“黄肠题凑”长9.1、宽7米。上面用四层木料铺设为盖板,第一层盖板是35根木料,其余三层均为36根木料,每层盖板稍有错缝,盖板上用两根纵向木料压住;“黄肠题凑”南、西、北三面均用长方形木方,木心向内垒叠构筑,用料十分考究,长0.92、宽0.25、厚0.23米;东端为墓门,用三层直立木料建成,对开式,每扇门由7块木板组成,内有六道榫卯;墓门外端北侧发现刻划的数字和方向文字“南方、北方、上一、上二……上七”,门楣上有位置文字“北一、北二、北三”,

椁室盖板有接缝数字文字“一、二……十二”等。外藏椁除“黄肠题凑”东端门外,围着“黄肠题凑”一周,根据盖板木料排向和立柱排列,可分为15个外藏室,东、南、北各是4个室,西3个室,每个室长短不等,长度是1~4米。外层为木椁,椁长4.6、宽3.1、高2.35米;椁板西端和两侧为榫卯结构,内外均髹黑漆;东端是椁室门,为对开式,用“燕尾”式卯连接板缝,木门一侧上、下有门枢。内层为石椁,长3.9、宽2.34、高1.9米;石板之间结合处采用“凹、凸”形方式构筑,内髹一层黑漆,在北侧上端石板有云纹彩绘,东端和木椁木门一样;在石椁盖板上放置有戈、戟、刀、弩机和弓等兵器。外棺长2.8、宽1.4、高1.4米,外面髹黑漆,棺盖的两侧绘制三角形的波浪纹。内棺长2.32、宽0.95、高0.95米,外髹黑漆,绘制红色云纹彩绘;内棺外表用鎏金的柿蒂纹和菱形纹装饰,排列了9列17行,棺盖的四角与两侧中间各放置一面铜镜,镜钮均被砸除,残存镜钮根部;棺内髹红漆。回廊是外椁和题凑之间的空隙地方,木椁外和题凑内南、西和北三面均有对称、规整的上、下两层凹槽,仅在回廊的西北角遗存有回廊门,可能当时在回廊内也分成若干个室。

在墓道两侧,呈对称状分布两座车马坑,内有铅质小马车模型90多件,应为冥器。

在封土堆西部有三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3座小型墓葬均为凸字形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道朝东,墓室连墓道长4.95~6.26米,棺椁已朽,随葬品有鼎、豆、壶、罐、钗、井、灶、五铢钱等。车马坑总长28米,由斜坡道和车马坑组成,其中斜坡道位于北侧,坑内四壁用木板作衬帮并用木柱撑挡,坑底也铺一层木板衬底,均腐朽严重。坑内残存8匹马遗骸和4车残迹。

该墓在唐代曾被盗掘,盗墓者凿穿题凑盖板进入主室棺椁内,外木椁、石椁和内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盗洞及题凑内回廊中清理出漆木器残片、五铢钱、玉器、金箔、银箔、封泥和植物种子、果实等遗物,还清理出盗墓人使用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其中有铁斧、木桶、绳索、竹子编织物和陶碗、残瓷碗等遗物。

共出土随葬品500余件。在外藏椁西1室发现铜壶20件,北4室铜壶2件,其余的室内放置木器,有马俑、人俑和车,马头嘴内含有马镫,马具上面发现小块皮革。在部分铜壶上分别发现有“共府第六”、“共府第八”、“共府第九”、“共府第十”、“沈氏容十升,重州十斤,第二”和“樊氏容十升,重廿八斤十四两”等铭文;出土的封泥上模印有“六安飢丞”文字。

根据文献记载,六安西汉时为六安国封地,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封胶东康王子少子庆为六安王(共王),历夷王禄、缪王定、顷王光、育五王,王莽时绝。“六安飢丞”为六安国负责膳食的官员,铜壶上的“共府”铭文与六安国第一代王共王庆对应。根据该墓的地望、规制、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综合分析,此墓应是六安国始封王共

王庆的陵墓,对研究六安国历史和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汉代诸侯王陵制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双墩附近区域,目前尚存有多处大型墓葬的封土堆,几处较大的封土堆都是两个并列的墓冢,分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已发掘的双墩一号汉墓即位于这个墓葬区的中心。在双墩墓西南约1000米的马大墩在20世纪70年代,在其北墩的西北曾经发现过一个车马坑,出土了一些车马器。根据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的确定,以及现存墓葬封土的形制和规模推测,这一带应是西汉六安国的王陵区。目前,对该区域详细的调查和勘探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庐江县服装工业园汉墓

2006年12月发掘。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保存完整,没有被盗。墓坑长约7.5米、宽5.5米。南北向,墓道在南侧。椁室及盖板用双层楠木建成。墓室由棺室、前室及东、西、北三个边厢组成,棺木保存完整,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此墓形制的特殊之处在于:1.三个边厢都用隔板分成上下两层;2.棺室与边厢之间的隔板都有精美的木作雕刻,内容有歌舞、狩猎、文臣武士、双龙穿壁等。墓室出土遗物主要有釉陶器、木俑、漆器,另有少量铜器。棺内主要有带鞘剑、玉佩、铜镜、五铢钱、漆器等,并有“临湖尉印”铅质印章1枚。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的特征判断,此墓的年代为西汉中期。

3. 其它

在枞阳县沙河、潜山县新林、六安城东和肥东县龙城、大邵等地,发现了几处西汉中晚期墓地。发掘清理墓葬百

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岩)坑墓,部分墓葬带斜坡墓道,葬具多已腐烂,存有痕迹,有一椁一棺和单棺墓两种形式,人骨绝大多数腐朽殆尽,少数几座墓尚残存部分头、肢骨。

随葬陶器有鼎、豆、罐、钵、杯、熏,模形明器灶、仓、井、屋等,印纹硬陶罐,釉陶壶、罐,铜器有铜镜(铭文圈带)、洗、铜环刀、五铢钱等。滑石器主要为璧和七窍塞。

(三) 运河考古

2006年4-8月,在宿州市(甬桥区)西关大街东端一商业步行街的建设工地内,发掘了一段运河遗址,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400余件。该段运河属隋唐大运河遗址的一段,在1999年发掘的濉溪县柳孜运河码头遗址以东约40公里。运河河口宽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现存南北河岸相对高度落差近1米。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大,主要为瓷器,涉及生活诸多方面,如生活用品、文体用具、医类用品、玩具等,瓷器所属窑系有寿州窑、白土窑、越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耀州窑、磁州窑、定窑等20余个窑口。其中不乏精品,如磁州窑珍珠地花卉白釉钵,巩县窑绞胎枕、三彩枕,长沙窑褐釉象座枕,定窑花口瓜棱腹青白瓷瓶等,造型典雅、工艺精湛。有一款制作考究的说唱瓷人尤其引人注目,温文尔雅的书生手执快板,正在说唱,其表情刻画细致,连额头上的皱纹都清晰可见,是一件难得的上品。发掘取得的成果,充分说明了隋唐大运河的地位,证实了隋唐大运河文化积淀深厚,为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及隋、唐、宋的兴衰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宫希成)

二. 重庆市

(一) 重庆三峡库区开县故城遗址

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受重庆市文化局委托,在开县文物管理所的大力协助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宜昌博物馆联合对开县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从2006年2月至4月,完成勘探面积6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此次发掘布方分2个区。区位于遗址中心部,区位于遗址东南部。

开县故城遗址位于三峡库区长江左岸支流小江的上游,隶属重庆市开县汉丰镇(即开县旧县城),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该遗址遗迹现象比较复杂,主要表现为灰坑和房址。

2号灰坑位于T5251西南部,不规则圆形,坑口长径390厘米,短径340厘米,深75厘米。坑内填土为松散状灰黑土,包含有大量石块、兽骨及草木灰。出土有少量酱釉陶和白釉瓷片。可辨器型有罐、碗等。

2号房址位于探方T5251和T5252内。房址平面呈方形,残存2间。其东间房可见部分铺地石板,规格大小不一,最长的有140厘米,宽20厘米~50厘米,厚10厘米

~15厘米。西间房为红褐色黏土铺就,地面平整,土较坚硬,似经拍打,其间夹有少量炭末。另发现石柱础一个,上圆下方,圆径50厘米,通高24厘米。房间用一道条石垒砌成隔墙,隔墙残长8.5米,残高0.3米,宽0.2米。部分石隔墙上残存一排青灰砖,砖长28厘米,宽14厘米,厚4.5厘米。

碑1通。灰砂岩,长161厘米,宽68厘米,高14厘米。碑文400余字,楷体。碑文题为“开州守廨题名记”。

故城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遗物主要为瓷器,有碗、盘、碟、杯、勺、铜钱等。一般多施白釉,少量施青釉、黑釉。部分器物上有莲瓣纹、菊瓣纹、卷草纹等。H2出土的3号罐、2号碗与秭归渡口遗址唐宋遗存的同类器相似。F2与巴东罗平M2形制完全一样,时代应大体相同。

二期文化遗存出土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建筑材料。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盘、杯、碟等。一般多施青白釉,少量施青黄釉、蓝釉,部分器物施釉不及底。多绘青花动物、植物图案,器底或器心有“富贵佳器”“大明年造”“玉堂佳器”“万福攸同”“宣德年制”“福”“寿”等款识。这些特征均为明代器物的典型特征。建筑材料有筒瓦、板瓦、瓦

当、滴水、脊饰等。多为泥质陶,少量夹砂陶。陶色以灰陶为主,次为黄褐陶,红褐陶,器内面多饰布纹。

故城遗址三期文化遗存出土的遗物,器类与二期变化不大。可见器型有碗、盘、杯、碟、勺、釉陶罐、灯、高足杯、器盖、茶碗盖等。新发现粉彩这种艺术彩。部分器物底部有矾红“同治年制”印章款,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嘉庆年制”印章款,“永庆堂制”堂名款。在第二层中还发现有“中华民国”元年铸造的四川银币。故判断其时代为清至民国早期,而A组遗物在时代上应早于B组遗物,A组遗物最迟不晚于清乾隆时期。

故城遗址一、二、三期文化遗存中还发现大量筒瓦、板瓦、瓦当、滴水、脊饰等建筑材料,充分说明自唐宋以来,该地一直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绵延不断。综合开州守廨题名记石碑及《开州志》的有关记述,可以推定该地自唐宋以来,是一处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的聚落中心。

(许永杰 刘继东)

(二) 奉节藕塘遗址

2006年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山西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重庆奉节藕塘遗址进行了较大面积的钻探与发掘,揭示出这是一处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夹砂陶器、夹炭陶器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奉节藕塘遗址位于奉节县安坪乡藕塘村北,海拔140米至150米。该遗址最早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三峡考察队在1993年调查发现。

藕塘遗址沿长江南岸分布在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宽约50米的几个台地之上,从西至东依次为邓家码头台地、孤老田台地、石地坝台地和桥挡丘台地。其中尤以海拔141米的邓家码头台地出土遗物最为丰富。该层堆积呈斜坡状,靠近江边一侧较厚,最厚处达0.82米,其下为自然形成的夹杂有大小石块的冲积土层,其上叠压有近现代或铁器时代的扰动土层,性质较单纯,主要是出土了史前陶片和石制品,未见灰坑、墓葬等遗迹。邓家码头台地T201第4层出土陶片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和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测定,年代为距今 7250 ± 40 年,经树轮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6220年至前6030年。

本次发掘发现石制品200余件,以邓家码头台地T201第4层出土较为丰富。该单位出土石制品共计105件,原料全部为磨圆度较高的砾石,岩性以各色变质角砾岩、石英岩、石英砂岩和角页岩为主,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的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核以及为数不多的断块,还发现了3件打制而成的石斧。石器的打片方法以砸击法和锤击法为主,第二步加工方法基本为锤击法。砍砸器多为两面打制加工而成,有单边刃和多边刃,体型较大,最大径多在10厘米以上。刮削器有直刃、弧刃和凹刃,刃缘的加工以反向加工和交互加工为主。打制石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砸击法产生的零台面

石片及以此类石片为毛坯的石器较多。零台面石片及石器的特征是宽而扁平,大部分仅厚1厘米至2厘米。打制石斧,斧身截面略呈椭圆形,斧刃经两面加工而成。磨制石器主要发现了11件磨制石斧以及石镑和石铲各1件。

陶器未见完整器型,发现各类陶片近200件,以邓家码头台地T201第4层出土最为丰富,有陶片129件。陶器中夹砂陶泥质陶比例相当,有15件陶片除廓和有砂粒外,还夹杂有炭化的植物茎叶。陶色以红陶和黄褐色陶为主,但并不纯净。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纹饰的陶片仅占32.5%,其中又以弦纹和刻划纹占绝大多数,其他纹饰仅见少量的附加堆纹与绳纹。这些陶片中有相当一部分质地粗疏,揉捏即碎,有些陶片厚薄不均,且内壁凹凸不平。内壁凹凸不平的器物,外壁通常平整,有可能采用了直接成型法的制坯工艺。部分陶片可见明显的层脱落痕迹,说明采用了泥片贴筑法的成型工艺。从发现的一些陶片口沿、器底可以判断该遗址的陶器主要有罐、釜、盆、钵、盘、壶等,以折沿罐、釜一类的大型器皿较多,其他器物数量很少。发现的15件夹炭陶器,胎壁很厚,最厚者达5.6厘米,这类陶片往往内壁凹凸不平,外壁则较平整,很可能是手制而成的大型罐、釜一类器皿。

重庆峡江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奉节鱼腹浦遗址,遗址年代为距今 7560 ± 110 年。从所测定的未经校正的绝对年代来看,藕塘遗址略晚于鱼腹浦遗址,藕塘遗存表现出来的某些因素也都表现出比鱼腹浦遗址进步的特征。

目前在峡江地区发现的前仰韶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玉溪下层文化为代表。从藕塘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和陶片分析,藕塘遗存与玉溪下层文化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即前仰韶时代。除此之外,藕塘遗存中夹炭陶器的发现,陶釜、罐、钵、盘等器物的组合,折沿的罐和釜的造型等,表明该遗存与大约同时期的城背溪文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峡江地区处于仰韶时代的奉节老关庙下层文化遗存中,也有一些与藕塘遗存共同的文化因素,初步分析这应是前后不同阶段文化延续的表现。

奉节藕塘遗址地处三峡西缘,从时代而言,它上承鱼腹浦遗存,下接老关庙下层文化,是属于前仰韶时代的考古学遗存;从地域来说,它西临渝中地区的玉溪下层文化,东近鄂西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具有与玉溪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相互交流的性质,至于它是否能并入玉溪下层文化或城背溪文化,或者是否能单独列为一种文化还有待深入研究。总之,藕塘遗存的发现对于全面揭示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完善峡江地区的文化序列,研究三峡及更广范围的峡江地区以至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文化传承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赵杰 宋艳花)

三. 福建省

(一) 永安市黄衣垄旧石器遗址

该遗址位于永安市贡川镇观成村,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2006年2月至7月,为配合泉三高速公路建设,福建博物院和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从中更新世网纹红土中发现两个文化层,还在下文化层揭露一个人类活动面。

下文化层下出土石制品133件,可分为石核、断块、断片、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手镐等7类,以砍砸器为最主要类型,原料以石英砂岩最多,其次有石英岩、砂岩、辉绿岩等。石制品组合以大中型为主,砾石石器占97%。上文化层出土石制品15件,采用原料与下文化层相同,石制品有石核、断块、断片、石片、砍砸器和手镐6类,和下文化层有极大相似性。上下文化层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应为一个文化类型。

黄衣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类型较少,器型粗大、加工粗糙,其文化总体面貌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但石器组合缺少尖状器类型及端刃类砍砸器所占比例大,在中国南方旧石器工业中不多见。福建地区以往发现的其它旧石器遗址如漳州莲花池山洋尾山等和黄衣垄遗址的文化性质存在较大差别,显示其具有地方特色。参考闽南地区网纹红土和永安丰山网纹红土下砾石条带的测年数据,黄衣垄遗址所处地质年代应在更新世中期至晚期之间,文化层年代可能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后段。

黄衣垄遗址的发现,不仅扩大了南方砾石工业地点的分布和文化内涵,也使福建境内增加了新的文化类型。此次发掘揭露的大面积人类活动面,为今后进一步探讨早期人类生活方式、寻找更早的旧石器提供可资借鉴的线索。

(陈子文 李建军)

(二) 漳州市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

该遗址位于漳州市北郊环城路边,面积约10000平方米,2005年由福建博物院和漳州市文管办联合对其进行第二次科学发掘。2006年1-4月,继续发掘该遗址。此次发掘对三个文化层的标本全部提取,共计2100余件,其中石制品477件。石制品分为石器、石片、石锤和断块等,石器分为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等。这些石制品利用的原料仅脉石英和水晶晶体两种,石器的加工较简单,细致的修理少见,尖状器加工稍好。上、中文化层的石器以中、小型为主,类型少,缺乏典型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下文化层以大、中型为主,尖状器数量大,颇具特色。时代约跨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中期和晚期(距今年代约5万~20万年)。

莲花池山出土石制品文化面貌总体与三明万寿岩及新近发现的永安黄衣垄遗址存在较大区别。从近年来的发

现来看,福建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可能存在不同的石器系统。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永安黄衣垄和三明万寿岩发现以砾石加工而成的大石器系统(距今18~3万年),从石制品总体来看,与南方砾石石器文化比较接近,这种以砾石为原料的大石器系统大致分布在福建内陆地区;漳州地区存在着以中小脉石英、石英及水晶晶体为原料加工而成的中小石器系统,与我国南方广布的砾石石器系统有较大差别,这种中小石器系统分布在福建沿海地区。

(范雪春 陈明忠)

(三) 明溪县南山遗址

该遗址位于明溪县雪峰镇上坊村南山自然村北,为一处兼具洞穴类型与旷野类型的古遗址,先后于1989年与2005年进行过两次小面积发掘,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属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旷野遗址位于山顶,在山顶东部,发现新石器晚期墓葬区和一处大型青铜时代建筑台基遗迹;洞穴遗址位于山脚,在编号第3、4号洞地层中,发现了四期新石器晚期垫土台基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物,从灰土层中浮选出300多粒介于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的稻粒标本。

2006年10月至12月,福建博物院、三明市文管办、明溪县博物馆联合对南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26平方米。

3号洞探沟的洞外部分,揭露出四期相互叠压的垫土台基,其中,第二期垫土台基与洞内1989年发现的红烧土居面遗迹相连,说明当时洞口岩檐处另有屋顶接向洞外,以增大洞内有限的活动空间。此外,在第三期垫土台基的岩角处,发现一座浅坑掩埋的婴孩墓,墓葬已残,墓内仅见朽骨的遗骨与一件残破的陶釜。

4号洞揭露出三期相互叠压的垫土台基,台基靠溪流一侧均以乱石堆填,作为固基的护坡,三期台基的最厚处达2米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穴居者对洞口作了较大规模的改造。从台基垫土中含较多石块和泥岩碎屑情况看,它与洞内细质垫土台基有明显的区别,因此,4号洞与鱼塘溪之间10米见宽的垫土台基,可能是当时人们着意营筑的公共活动场所。从探沟南端的发掘情况看,明清时期的河漫滩堆积尚未受到近现代河流变化的破坏,因此推测,遗址近侧的鱼塘溪河床,数千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可能只是逐渐淤积而抬高。

3、4号洞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三类。陶片的数量最大,有泥质陶与夹砂陶两系,均以灰陶为主。泥质陶中,磨光黑陶与磨光灰陶占一定数量,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火候很高,为福建同期遗址所少见,彩陶残片发现一件;陶器可辨认器型有釜、鼎、甗、罐、鬲、豆、钵等,及陶网坠和陶纺轮等生产工具;纹饰有绳纹、篮纹、大方格纹、网纹、叶脉纹、栅篱纹、旋涡纹、人字纹、席纹、曲折纹、戳点纹、戳印圆

圈纹、附加堆纹、弦纹和素面纹等;少量陶器的口沿上,有类型单一的刻划符号。石器中,除常见的石锛、石斧和石箭镞等磨制石器外,尚有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骨器有骨锥和骨镞等。

位于南山山脚的洞穴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主要文化内涵,商周时期的遗物只在地层上部的扰乱层中有零星的发现。从文化面貌上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受到诸多外来考古学文化因素影响,主要有来自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与来自武夷山脉西侧的山背、樊城堆文化,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文化因素多于前者;就福建范围看,它的区域性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南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研究武夷山脉东、西两侧史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于研究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明忠)

(四) 东山大帽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该遗址位于福建省东山(岛)县城城镇大茂村东北,大帽山是福建第二大岛东山岛内第二高峰,东濒台湾海峡,遗址属贝丘遗址,东距海边1200米。2002年,为研究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和南岛语族的起源等问题,福建博物院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2006年5月至7月,又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取样发掘,发掘面积55.5平方米。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贝器,以及大量海陆动物遗骸。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量,烧成火候较低,陶器表面和陶胎的颜色多不均匀,往往红、黄、褐、灰、黑等均存在;纹饰较丰富,以绳纹为主,其它有刻划纹、指甲纹、戳印和锥刺的点状纹、压印的编织、镂孔纹、菱形纹附加堆纹等;器形盛行圆底器和圈足器,不见平底器。从残片观察,器形有釜、罐、豆、盆和器盖、纺轮等,以釜、罐、豆为大宗。石器有锛、镞、凹石、石球、砺石、穿孔器等,石锛和箭镞为主要生产工具。骨器有骨镞和角锥。贝器为一件牡蛎壳加工的圆头刀铲形器。

动物遗骸有陆生脊椎动物、海生鱼类动物和贝、螺类壳体等。

陆生脊椎动物主要为鹿类遗骨及少量禽类碎骨,遗骨非常破碎,大量骨片均有人工加工痕迹,少量被火烧过,推测其破碎主要由加工骨器造成。海生鱼类骨骼大部分为脊椎骨,以软骨鱼类为多数,主要为鲨鱼,部分脊椎骨有被火烧过。海生贝类发现24种,泥蚶和丽文蛤为其中主要的两种贝类采拾对象,多数贝类的生存环境见于大帽山周围海岸潮间带的泥滩、沙底、海岸岩石或礁石上,可见居民采贝的主要地点在海岸潮间带,同时亦采拾栖息于岩石或礁石缝中的一些螺类,采拾时对贝类的大小有所选择。食用海贝的方式有烧燎法、水煮法和敲击法。动物骨骼和贝类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经济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大帽山遗址的文化堆积相对单纯,从2002年三个贝类标本的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约为距今4200~5000年左右,

与福建东部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的年代相近。其文化内涵大体一致,陶器的总体特征包括器形和纹饰等有类似和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区别,大帽山陶器主要为夹砂陶,而昙石山文化泥质陶所占比例很大。两者很可能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不同的地方文化或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区域类型。另一方面,对石器成分的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大帽山遗址的绝大部分石锛是用澎湖列岛的原材料制造的,表明两地的联系很密切。

大帽山遗址的发掘丰富了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进行区域比较研究和建立福建南部、及整个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

(范雪春)

(五) 惠安音楼山遗址

音楼山位于福建省惠安县百崎回族自治乡下埭村下埭自然村北端村口,北临百崎湾,西临洛阳江口,西南500处为洛阳江与晋江交汇处的入海口,东与其他山体连续相连,从地势看,其为一突出的半岛。遗址位于北侧山岗和南北侧山岗的山凹处。2005年晋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时对其进行复查并试掘,

2006年1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约270余平方米,揭露了包括属青铜时代的灰坑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柱洞等建筑遗迹。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和骨器,以及少量陆生和海生动物骨骼、贝壳等。此外还出土一些带有明显夹棍痕迹的烧土块。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为夹细砂,细砂陶中的房和物中常见贝壳粉末,其质地较致密、坚硬;陶色以黄色和红色为主。出土完整器较少,从陶片观察,器类以壶罐类为主,还有个别的甗形器、支座和器盖等器。纹饰较简单,压印较规则,以蕉叶纹、栅篱纹、梯格纹、折线纹为主,还有绳纹、方格纹、席纹等。发现一个福建省内最早的刻划符号。约三分之一陶表面施彩色陶衣和点彩,以红色为主,还有红赭和黄彩;点彩呈圆点状或水滴状,间隔规则排列。石器有石拍等。

陆生动物骨骼有少量的鹿、麂等;海生动物骨骼有海豚、鲨鱼等,还有大量的贝壳,种类有海蛎、蚶、丽蚊蛤、螺、蟹等。从食物构成上看,海生动物和贝壳类占大部分,显见海洋性文化特征明显。

音楼山遗址的时代从新石器晚期延续到青铜时代,其主体内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与之相似的遗存在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中于沿海一带有多处发现,与福建沿海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面貌等有较大区别,可作为闽中沿海地带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陈明忠)

(六) 浦城猫儿山窑址改线路段墓葬发掘、窑址周边遗址探掘

该遗址位于浦城县中北部的仙阳镇西南约1公里,浦

南高速 K30+400~600 米段原线于猫儿垅两侧山头间穿过,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浦城县博物馆于 2005 年 9~12 月联合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九座商代窑炉, 包括圆形、椭圆形升焰窑和长条形平焰式龙窑。同时在猫儿垅北侧、西侧和南侧山顶经发掘发现有灰坑和四座墓葬, 出土物与窑内产品相同, 墓葬内出土器物数量较少, 一两件或三四件。

2006 年 4~5 月, 对猫儿垅东侧、南面和东南面改线路段的由南至北三座山顶分三区进行发掘, 发现商代早期墓葬 16 座, 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2 座。16 座商代墓葬出土陶器多施衣, 其中 15 座墓葬出土陶器与窑内出土陶器器形、陶衣、纹饰及烧造火候相似或完全相同, 每座墓随葬品数量均较少, 一般多则五六件, 少则一两件; 器形有罐、盆、钵、豆、簋等。另外一座 M5 出土 28 件, 陶器内外陶衣均呈黑褐色釉层, 胎质多较坚硬, 胎壁多数较薄, 多数器物如碗、勺、虎子形器、单把罐等陶器均不见于窑内出土的陶器, 整体面貌与窑址周边其它墓葬及窑内出土陶器有所区别。

2006 年 9 月, 为了解猫儿山窑址周围遗址的文化面貌和性质,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浦城县博物馆联合对已发掘的猫儿山窑址和墓葬周边临近的六座山头进行调查和探掘。大致情况如下。

五顶岗: 位于猫儿山窑址西侧山头西南方向山背后。于北坡布 18×1 米 2 探沟一条, 揭露地层堆积三层, 于第三层下发现大量的红烧土块和施黑衣陶片, 器形有罐、尊、盆、钵等, 纹饰以网格纹为主, 其它还有条纹、方格纹、席纹、弦纹与网格纹组合等。五顶岗所出陶器的器形、纹饰、陶衣、火候及制作烧造工艺与猫儿山陶窑完全相同, 和猫儿山应是同一座窑场的另一处窑群所在。

狗扯欠山: 位于猫儿山窑址东南, 山顶被种植开垦所破坏。于山顶布东西向和南北向探沟六条, 仅发现一层扰乱堆积, 质较松软, 出土少量施黑衣陶片和印纹硬陶, 施衣陶为 2 件罐的残片, 能拼接较完整, 未见其它遗物。此山顶很有可能为墓葬区。

猫儿弄背山: 位于窑址东侧山头山背后的东偏南。布探沟 25×1 米 2 和 15×1 米 2 两条, 仅揭露地表一层堆积, 其下发现土坑竖穴墓一座, 随葬品为罐、盆等器, 面貌与窑内出土陶器一致。亦为墓葬区。

吉利山: 位于窑址东侧山头山背后的东面。布探沟 18×1 米 2 两条, 揭露地层三层, 出土较多印纹硬陶, 纹饰有大量的席纹和方格纹, 器形有罐、釜等器, 表现出较明显的黄士仑文化晚期因素。未见与窑内出土相似的施黑衣陶片。

南娘山: 位于窑址东侧山头同一列山的东北端。布探沟 25×2 米 2 一条。南娘山山顶曾被破坏, 揭露文化层共四层, 一、二、三层属扰乱层, 均含施黑衣陶片和印纹硬陶,

含商代早期猫儿山黑衣陶和商代晚期黄士仑文化晚期两个阶段的文化因素。第四层出土均为施黑衣陶片。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施衣陶片中, 有相当多的陶片表面陶衣均表现出一层釉层, 而内壁仍为涂刷的极薄陶衣。

鹅公山: 位于窑址东北面, 西侧山头同列山东北端。山顶和东坡各布 6×1 米 2 和 5×12 米探沟一条。堆积分两层, 表土层下为第二层, 亦属扰乱层, 出土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少量的黑衣陶片。

从改线路段发掘和窑址周围探掘的总体情况看, 商代早期, 在已发掘和探掘的区域内, 形成了西南部以猫儿山和五顶岗为中心的制陶烧陶作坊区, 南部、东部为墓葬区, 北部和东北部目前只发现灰坑, 其应为其它活动区, 是否为居住址尚有待与房址有关遗迹的发现; 在东部墓葬区外侧, 黑衣陶发现极少, 由此看墓葬区很可能已是当时居民所涉足区域的外围, 墓葬区外侧, 已甚少发生活动。

从北部和东北部活动区发掘的材料看, 在未经扰乱的地层和灰坑等遗迹单位里与窑里施衣陶共出的遗物中, 几乎未见其它生产性工具, 说明陶窑作坊区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制陶中心, 这个聚落的居民是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生业的。南部、东部墓葬区绝大多数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与窑内烧制的陶器完全相同, 且随葬品数量少, 变形器较多, 可看出墓主人身份较为低下, 很可能是这个聚落的居民即专业制陶的工匠或工奴。

在当时制陶业已成为完全独立的手工业后, 如此大量的生产已不再是满足自身的需要, 应主要用于输出和交换。同是在浦城县仙阳镇, 其东北面的管九村发掘一批墓葬, 出土的黑衣陶器与窑址出土陶器一致, 这类陶器在福建闽江以北地区常见, 与浙江江山肩头弄的第一期着黑陶器面貌也一致。可见当时在福建北部、浙江西南部等周围地区, 存在一个生活用具以黑衣陶为特征的文化类型或者说一个大型的聚落体系, 以猫儿山陶窑作坊区为中心的这个聚落很可能是这个大型聚落中的一个居民聚落, 一个手工业制陶中心。(陈明忠)

(七) 厦深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勘探

厦深铁路福建段北起厦门市海沧, 南至漳州诏安。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漳州市文管办联合对铁路沿线的文物点进行调查勘探, 发现十多处古代文化遗址, 时代分旧石器、新石器、商周、唐宋时期等。

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龙海市吴宅村后埔顶山、漳浦县盘陀乡林仔山、漳浦车站等三处, 均发现以燧石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小石器, 时代属旧石器晚期, 扩大了漳州沿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小石器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的范围。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漳浦县盘陀乡西街山遗址等三处, 发现较多的夹砂陶片和泥质陶片, 可辨器型有釜、罐等。商周遗址龙海市程溪镇庵顶山、云霄县莆美镇大柏山、漳浦县盘陀

乡岭里后山等七处,其中漳浦县盘陀乡九曲山遗址分布面积约五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米,从发现的陶片和堆积层观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岭里后山遗址面积达40000平方米,地表和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的夹砂陶片、印纹硬陶片,器形有罐、壶、杯、碗、纺轮等,石器有镞、矛、砺石等。汉代遗址发现一处,诏安县白洋乡井山遗址,采集有方格纹的硬陶罐、盅等。厦深铁路沿线发现的十多处史前至汉代遗址为福建的古文化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陈明忠)

(八)南安尾山仔商周遗址

该遗址位于南安市码头镇杏东村惠书桥自然村北侧,遗址东侧紧邻东溪上游诗溪。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为配合泉三高速公路建设,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尾山仔遗址西侧施工范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10平方米。发掘揭露地层分两层,两层出土遗物相似,为较多的夹砂陶片和少量的泥质陶及零星的硬陶、釉陶和黑衣陶,还有个别的原始青瓷残件如豆等器物。器形以罐釜类为主,纹饰主要有条纹和方格纹。石器仅见石戈残件。

第二层下发现商周时期墓葬四座。其中三座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数量较少,器形小,M1出土1件原始青瓷尊,M3为1件原始青瓷豆,M2出土1件夹砂平底陶罐。还有一座墓葬M4,没有发现较明显的墓廓,出土1件夹砂罐,器形较大。

从陶质、器形和纹饰观察,地层和墓葬出土的遗物年代为商代至西周。遗址发掘范围内的地势约略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分地势较高的探方地表已裸露生土层,而文化堆积一般分布在发掘区西北侧地势较低之处,堆积包含的出土物内涵较为单纯,不见其它类的生产和生活器具,且面貌与墓葬相似。因此尾山仔遗址西侧可能为墓地,由于地表开垦和流水侵蚀,地势较高处墓葬内受到破坏,其随葬品出露地表堆积于坡下位置。从随葬品的数量少、陶质较差看,墓葬所在可能为当时文化不发达地区,且墓主人身份较低。(陈明忠)

(九)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发掘

该墓群位于位于浦城县仙阳镇北部的管九村,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为配合浦南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福建博物院与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联合对该墓群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分5个地点,分别是鹭鹭岗、社公岗、洋山岗、麻地尾、社公岗的北侧晒谷坪,共清理33座土墩墓。其中一墩二墓的有6座,一墩多墓的一座(墓中出土黑衣陶),其余的皆为一墩一墓。墓葬的形制可分为:平地掩埋、长方形浅坑、带墓道竖穴土(岩)坑三种类型。

墓内共出土随葬器物280余件,其中原始瓷器67件,主要器形有豆、罐、尊、瓮、簋、盂、碟等器;印纹陶器146件,主要为罐、簋、豆、尊、盅等;青铜器55件,主要有短剑、

矛、戈、镞、刮刀、匕首、箭镞等。玉管佩饰7件,石器7件。

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初步对比与研究,并参考碳十四测年,这批土墩墓可分为三期:第一期 of 夏商时期,均出土黑衣陶器和软陶器;第二期、三期分别为西周和春秋时期;部分墓葬呈现出第二期与第三期过渡的中间状态,时代应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阶段。

浦城管九土墩墓是福建首次发现的土墩墓群,填补了中国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其年代约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阶段,也填补了福建地区该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此次发掘,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器物群最多的考古发现,对福建地区先秦时期社会历史和越族青铜文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批土墩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相对完整的黑衣陶、(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器组合,其中以黑衣陶为主要随葬品的土墩墓对南方土墩墓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批夏商、西周至春秋的土墩墓以平地掩埋发展到浅坑并向深坑过渡,反映了西周至春秋这两个历史阶段土墩墓发展演变的脉络,对研究土墩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该墓群发掘于2007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考古学论坛—2006中国考古新发现”中被评为“2006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同年4月又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吕景燕)

(一)浦城吕处均两晋南朝墓群

该墓地位于浦城县莲塘镇吕处均村后门山、鸡脖岗山等处,2005年为配合浦南高速(浦城—南平)建设,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浦城县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两晋南朝墓11座。

2006年5月,对建设范围内的墓群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此次清理墓葬13座,时代同为两晋南朝,均为单室券顶砖室墓,平面形状分长方形、刀字形和凸字形三种,内部由墓室和甬道组成;以凸字形和刀字形居多,墓室底部多不分级,长3.7~5.2米不等、宽1.26~1.8米不等,属中小型墓葬。墓砖纹饰有叶脉纹、曲折纹、钱纹与网格纹组合、圆圈纹等。发现的纪年砖铭有“太元三年”等,出土随葬品有罐、盘口壶、碗、钵、唾盂等。两次发掘共揭露24座墓葬,加上1986年吕处均附近的七坊山、十八窑及后门山等处进行两次考古发掘清理的11座,吕处均前后发掘揭露的两晋南朝砖室墓总数约有近四十座。这些墓葬多为单室券顶墓,少量平面形状以凸字形最多,刀字形其次,长方形最少;极大多数为中小型墓葬,较大型墓仅一座,长约7.88米。这群墓葬时代从西晋至南朝,密集分布在几座山坡上,反映了选择墓地聚族而葬的特点,中小型墓葬属一般官僚和士族及平民,大型墓则应属较高级的官僚士族阶层。

浦城位于福建西北部,与江西、浙江两省交界。三国时期,福建划归东吴范围,浦城设吴兴县治,两晋时属建安郡

治。三国时东吴政权的移民政策和两晋南朝时的丧乱导致了多次中原士族和民众入闽,地理位置的临近,使浦城成为中原士族较早迁徙、居留的地区。“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移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打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1986年于七坊山西侧揭露的四座墓葬前遗留有弧形坟圈,残长78米,以2~3层平砖叠砌,其中西晋“元康六年”墓砖铭有“王家”等字样,表明此处应为王氏家族的葬地,其中M2规模最大,且居右前方,当是地位身份较高者。同年在后门山清理的M5墓砖铭文“永嘉五年”上有詹姓,史载“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源于战乱而形成的中原人士迁居闽地的活动在西晋末期的永嘉年间迅速形成高潮,詹姓是为八姓之一,此处墓地与詹氏家族有关,应很可能是永嘉年前后迁入浦城的。

福建地区两晋南朝墓各地均有发现,但分布集中且密集的族葬之地发现却较少,吕处坞两晋南朝古墓群的发掘为研究闽北地区六朝时期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及中原文化对福建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陈明忠)

(一一) 南安丰州皇冠山东晋南朝墓群

该墓群位于南安市丰州镇桃园村与西华村北部交界处的皇冠山南坡,面向晋江,遥对紫帽山。2006年8月至12月,为了配合福厦高速铁路建设,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共清理28座砖室墓,年代从东晋至南朝。墓室结构较为简单,均为单室券顶墓;从平面形状观察,除残墓外,绝大多数为刀形墓,两座凸字形墓,一座长方形墓;刀字形墓一般长5.4~6.36米、宽1.4~2.04米,最大的一座M14,长6.93、宽2.34米,最小的一座M9,长4.68、宽1.27米;凸字形墓大小与刀形墓相似,长方形墓M24较小,长仅3.56、宽0.82米。墓底分棺床和天井前后两级,铺法多为二横二纵和人字形;墓壁平砖错缝或三顺一丁、四顺一丁砌筑;左右两壁多用刀形砖起券,少数为刀形砖和楔形砖三顺一丁混合使用砌成券顶,刀形砖多为顺砖,楔形砖多为丁砖。

多数墓葬四壁和顶部均以花纹砖砌筑,花纹图案丰富多样,主要有钱纹、焦叶、卷草、宝相、鱼龙、朱雀、玄武、人物、佛像、动物、几何纹、乐器及多种纹饰组合纹,每种纹饰又各有变化;其中三座墓中墓砖上模印的古乐器“阮咸”纹样,在福建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乐器史及闽南地方戏曲史提供了重要材料。纪年砖铭发现有“太元三年”(378年)、和“天监十一年”(512年)及残缺墓砖“四年”。

出土器物二百多件,以瓷器为主,器类主要有四系罐、盘口壶、碗、盅、钵、杯、托盏、锥斗、托盘、虎子、博山炉、多管插器、唾壶、鸡首壶等。其它随葬品还有熏砚、金指环、铁剪刀、滑石猪、料珠等。

此次发掘揭露的25座墓葬多属中型墓葬,从墓葬规

格、墓砖图案和随葬品观察,墓主人应为中下级士族和地主富豪。这批墓葬集中分布在古镇丰州北侧皇冠山南坡中坡高速路段经过的条带状内,坐北朝南,背靠皇冠山、南望晋江,地理位置优越。在皇冠山下坡位置和东西侧及附近的狮子山等山丘也曾发现较多同时期墓葬,可见丰州皇冠山、狮子山等附近为当时丰州士族、及其同宗亲党部曲等的族葬之地。

西晋时期,福建地区分治为建安、晋安两郡,丰州即为晋安郡所在地。西晋末年,连年的兵灾战乱使迁徙闽地的活动达到高潮,“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固有晋江之名。丰州在西晋作为经济政治中心以来,已开始逐步发展。至南朝萧梁侯景之乱时,又一次土族入闽活动,“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南朝梁时,晋安又分为晋安和南安两郡,丰州为南安郡城。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丰州地区周围包括泉州、南安、晋江、永春等晋江流域地区,以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为多,而西晋时期的墓葬较为少见,可见西晋时丰州虽设郡,但仍为较偏远地区,至东晋南朝时经济文化逐步发展起来,人口才逐步增多,遍布晋江流域各个地区,而丰州地区则为最繁盛之处,从丰州地区近年发掘的东晋南朝墓分布集中、数量大可见一般。

福建目前发现的两晋南朝墓葬,主要分布在闽东的霞浦和福州包括闽侯、连江,闽北的建瓯、浦城,闽南的泉州、南安等,此外福州的福清、闽南的晋江、闽北的松溪和政和、三明的将乐等地也有一些发现。在墓葬的集中分布区,往往以群组的形式出现,数座以致数十座依山势排列,有同一时期的,亦有跨越数朝的,反映了选择墓地聚族而葬的特点。从目前的发现看,这种现象表现的最突出的有南安丰州、浦城吕厝屋、建瓯、福州等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均地处两晋南朝时所设建安、晋安郡或南安郡及丰州、闽州政治中心或在其直接影响范围内。此次丰州墓群及上述浦城吕处坞墓群的发掘为整体研究福建地区两晋南朝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及中原地区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增添了重要内容。(温松全)

(一二) 福清苍霞唐代墓葬

墓葬位于福清苍霞村后张山东南坡,因福厦铁路施工建设,2006年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该处发掘两座唐代墓葬。两墓均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大小略同,长5.1米、宽1.05米、高1.50米,分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甬道与前室底平,前室后部有高出一块砖的平台,放置随葬器物;后室(棺室)比前室高出一块或二块砖。

出土器物均为青瓷,保存完好,种类有盘口壶、四系罐、博山炉、三足炉、焦斗、托杯、托盏、钵、罐、五盅盘、灯盏、唾壶、双系小罐。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的瓷器分析,其年代在唐代早期。(林聿亮)

(一三) 莆田古松柏山宋元窑址

古松柏山窑址位于莆田市东海镇利角村,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与七十年代末调查发现的灵川窑同属一处窑场,是灵川窑中的一处窑址。因福厦铁路建设,2006年10~12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分两个发掘区进行,揭露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两座。

东发掘区揭露龙窑(Y1)一座,Y1系在生土上挖槽砌建窑炉中下部,其平面呈长条形,斜残长19.52、水平残长18.92米、宽1.7~2.21米,前窄后宽,窑头方向139°。窑炉由窑室、火膛、火膛前操作坑等结构组成,残存一座窑门;Y1修建于缓坡上,前段窑底坡度19°,后段10°,尾段则更缓,趋向4°。窑室前段东侧窑墙残高约0.29—0.34米窑墙,从距离窑底烧结层0.21米处开始内弧,由此推测前段窑顶高度为1米左右。出土窑具有匣钵、匣钵盖、托座、垫饼、火照等,装烧方法,以托座叠烧和匣钵正置仰烧为主。火膛平面呈半圆形,后壁底部宽1.05、前后进深0.54米,火膛两侧环形窑壁由下至上逐渐往外侧收分。火膛底部置五道单层窑砖,做为窑算,窑算五列窑砖间的空间与火门的下通风口相通。

Y1内和窑外堆积出土的产品以青白瓷为主,釉多呈青灰色,还兼烧少量青瓷,器类以碗为大宗,还有少量的钵、盏、炉、罐、器盖和壶等,均轮制成型。产品多素面,另有少量纹饰为算梳纹、算点纹、刻划直线纹、卷草纹、网格纹等,见于碗、钵、炉内外壁和部分器盖等器。时代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

西发掘区仅揭露一座龙窑窑底局部残迹(Y2)。出土瓷器以青白瓷为主,釉多呈青灰和青白色,少量呈白色,釉色莹润,亦见白中泛黄,现小开片冰裂纹。器类主要有碗、盘、碟、洗等,均为芒口器,多矮圈足,足底平坦浅凹,产品模制成型,器形较规整。胎呈灰白,胎质细腻。产品多素面,少量纹饰为模印荷花、莲瓣纹、竖条纹和栅栏纹等。造型和纹饰等与德化屈斗宫窑址同类产品相似或相同。

出土窑具有垫钵、托座、支圈、陶制模具等。装烧方法,盘和口径较大的碗、碟类器以支圈组合窑具覆烧,洗和口径较小的碗碟类器采用对口烧。时代为元代。

古松柏山窑的青白瓷属于宋元时代福建青白瓷的闽

南区系,产品特征和工艺与德化窑相似,受景德镇窑工艺技术的影响较大。古松柏山窑址的产品除了满足本地需求,还有相当数量出口到海外,窑址发掘揭露的窑炉和产品为全面研究外销瓷和宋元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的手工业、海外贸易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陈明忠)

(一四)福清苍霞宋代窑址和瓦窑

该窑址福清市音西镇苍霞村西南约500米的毛蟹山东坡,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发现宋代窑址的堆积层,出土大量青釉灰白胎的瓷片、瓷器和陶器,器形种类丰富,有四系罐、执壶、平底罐、碾磨器、陶佛手、脊饰、陶球、陶提梁、网坠、陶拍、支座、器盖、花盆、急须、瓷枕、碟、盘、窑具、筒瓦、瓦当等。瓷器以青釉灰白胎粗瓷为主,即以日用青瓷为大宗产品。

瓦窑被宋代窑址堆积层叠压,形状为椭圆形,砖砌窑壁,保存高0.3—0.5米,前部有窑门和火膛,中间窑室,底有火道通往左、右、后三个烟囱。产品为板瓦,长28、宽26厘米。(林聿亮)

(一五)三明大田瓷寮山清代陶窑

该窑址位于大田县吴山乡和洋村东南,2006年7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三明市文管办、大田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两座窑炉Y1和Y2。Y2被Y1叠压,未清理,故形状不明。Y1为阶级式龙

窑,窑头和窑前段均遭破坏,残存部分平面呈长条形。水平残长10.6、斜残长10.9米,窑壁以残砖错缝顺向平铺。窑中段宽1.7~1.8米,底呈阶梯状;后段宽1.4~1.6米,底为斜坡式,前部坡度约10°,后部仅2°~3°。窑尾残存六个出烟孔。仅于北壁发现一座窑门,门道呈长条形,两侧各残存砖或砖石混砌护门道墙。窑炉两侧残存石块垒砌的护窑墙和柱顶石、柱洞等遗迹。

窑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和窑具。陶器部分内外施青绿釉,器形有盆、罐、缸、坛、壶、水注等。装烧工艺较为简单,多明火裸烧;器物大多一次拉胚轮制成型。

福建地区明清窑址经考古发掘的数量很少,尤其是陶窑。瓷寮山陶窑的发掘有助于了解清代至近代的窑业技术及本地区商品经济关系。(羊泽林)

四. 广东省

2006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发掘先秦遗址(墓地)3处,西汉至清代遗址(墓地)4处,取得重要收获。其中,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我所还完成了河北新乐市内营遗址的发掘等工作。

(一)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古椰贝丘遗址发现于1986年。1996年,北京大学、暨

南大学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重新进行了调查。2006年9月,为配合广明高速公路建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经过近4个月的田野工作,发掘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珍贵资料,填补了广东考古的多项空白。

该遗址现存面积约40000平方米。发掘区位于遗址北部,发掘基点坐标N2539839.172、E483824.222、Z9.769。在

鲤鱼岗西南面地势相对低洼的水田中,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里不仅有保存完整的文化层,而且出土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动植物遗存。

据初步研究,古椰贝丘遗址距今约4500年,在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处于曲江石峡文化与东莞村头商代遗存之间,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商以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空白,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自身具有早晚衔接、连续发展的4段。

第1段出土夹砂绳纹陶釜、镂孔泥质陶圈足盘、石砧、木块、果核、动物骨骼等遗物。

第2段出土小口泥质陶罐、夹砂陶釜、泥质陶钵、泥质陶釜形钵、镂孔泥质陶圈足盘、骨骼(玦、簪、锥)、木器、稻谷、果壳、果核、树叶、竹片、腐植物碎屑、动物骨骼、小贝壳(直径1~3厘米)、小石螺等遗物。

第3段出土夹砂绳纹陶釜、泥质陶圈足盘、泥质小口直领陶罐、动物骨骼、大贝壳(直径7~9厘米)等遗物。

第4段出土陶釜、陶罐、石铤、石斧、石网坠、石拍、石铍等遗物。

发掘揭露的主要遗迹有柱洞、灰坑及活动面(踩踏面)等。

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有橄榄、南酸枣、榛果、坚果和瓜类种子等,动物骨骼有野猪、鹿、牛、狗、亚洲象、龟、鳖、硬骨鱼类等,为复原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食物结构及其经济的多样性和古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资料。遗址还出土了岭南地区时间最早、保存最好的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质工具。特别重要的是,遗址出土了多粒稻谷,在岭南史前遗址中更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岭南稻作农业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本次发掘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椰贝丘遗址采用了全坐标法布方,通过浮选、水选、柱状采样分析等多种田野发掘手段获取各种信息。2007年,该项发掘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二等奖。

(二) 惠阳窝尾坳遗址

窝尾坳遗址位于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黄洞大坪村,中心点坐标北纬22°57'51.9"、东经114°22'28.2"。遗址地处丘陵低岗地区,海拔高度60、相对高度12~20米,现存面积约3500平方米。为配合惠莞高速公路建设工程,2006年7~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北部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850平方米。

典型探方地层堆积分3层:第1层为表土层,第2~3层皆为商时期文化层。发现灰坑、柱洞等少量遗迹,柱洞排列不规则。

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

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粗砂陶胎色以黑及红灰褐色为主,胎质粗松,胎体薄碎,器表常饰绳纹和弦纹,可辨器类有尊、釜、罐等。夹细砂陶胎色灰褐,胎质稍好,可辨器类主要为圈足盘。泥质陶皆灰胎,胎质软硬不同,火候

高低各异,器表流行方格纹、曲折纹、交错条纹等,可辨器形有圈足盘、罐等。典型器类有夹粗砂大口尊、夹粗砂卷沿绳纹釜、泥质圆唇浅腹素面矮圈足盘、泥质方格纹或条纹折肩罐和泥质细方格纹广肩罐。

石器主要有梯形铤、有肩有段铤、凿、戈、柳叶形铍、T形环、砺石和石核、石料等。

窝尾坳遗址年代早于东莞村头遗址或与村头遗址最早年代相衔接。

(三) 高明马麻岭墓地

马麻岭墓地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上新村马麻岭西北坡。2006年1月,我所在广明高速公路西樵至更楼段进行考古调查时,采集到菱纹、方格纹等几何印纹陶片等遗物,经勘探确认此处应分布有同时期墓葬。同年9~10月,我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清理墓葬18座。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一般稍向内倾斜。墓葬规模较小,墓室长度多不及2.5米。墓室长宽比介于3:1至3.5:1之间,比较狭长。

除M4墓底尚残留少许黑板灰外,其余墓葬的葬具、尸骨均未保存。M13墓底发现腰坑1个,坑内随葬玉环、石器等。根据地形及随葬玉玦、管形串饰的摆放位置分析,墓葬头向皆向东。

马麻岭墓地有将陶器敲碎后弃置于填土中的葬俗。

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陶器多灰泥质陶,次为泥质橙红陶,器表常饰菱纹、弦纹、蓖点纹、方格纹、波浪纹、曲折纹、席纹、菱格钉纹等几何印纹及方格纹、菱纹、菱格纹和弦纹的组合纹饰,器类有豆、罐、簋、瓮、纺轮、鹰形器等。其中一件陶瓮高达84厘米,体形巨大。另有长方形青石礼器、石环、玉玦、玉环、玉管形串饰、原始瓷豆等。部分墓葬未见随葬品。

马麻岭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与博罗横岭山周时期墓葬基本相同,其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

(四) 东莞猪牯岭遗址

猪牯岭遗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柏洲边村猪牯岭北侧及西侧缓坡,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为配合莞深高速公路三期工程建设,2006年2~4月,我所对遗址北侧区域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1150平方米。

猪牯岭遗址主体堆积时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共清理该时期水井3口、灰坑8个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墙基槽、柱洞等遗迹。

出土遗物以陶器和原始瓷器为主。陶器基本为印纹硬陶,器表常饰方格纹、米字纹、方格对角线纹及弦纹与水波纹的组合纹饰等,部分器表可见酱紫色或红色陶衣。常见器类有鼎、釜、罐、瓮、杯、盒、器盖和器座等。原始瓷器数量较少,可辨器类有甗、杯、匜、器盖和钵等。另见砺石、残铜

刀、铜鼎足等。

(五) 韶关西河东岗岭墓地

东岗岭墓地位于韶关市武江区武江西岸的西河东岗岭。2006年7月~9月,为配合韶关市东岗岭经济适用房建设,我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墓葬20座,其中13座保存相对较好。

墓葬以长方形券顶单砖室墓为主,墓葬年代跨度极大,有东汉和东晋墓葬各1座、南朝墓葬4座、唐宋墓葬2座和明清墓葬2座,其余墓葬年代不详。

出土随葬品50件,主要有青瓷四耳罐、六耳罐、碗、钵、碟、陶釜、壶、鼎以及八角铜镜、银钗和铜币等。

M1规模较大、形制规整,保存完好。该墓为双室合葬墓,附设排水沟,墓室长5.82、宽2.10、高1.73米,前室券顶由东晋“永和元年”(345年)纪年砖砌结。

M9长5米,宽近2米,规模较大,随葬陶壶、陶鼎具有非常典型的东汉时代特点。

(六) 韶关小茶山墓地

小茶山墓地位于韶关市武江区重阳镇水口村。2006年4~6月,为配合武广客运专线建设,我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清理西晋、南朝、唐、宋及明清砖室墓61座,出土随葬品300多件。

小茶山为乐昌——韶关盆地台地丘陵区中的底缓岗地,毗邻武江,海拔70~80米。M1坐标为北纬24°54'05.2"、东经113°28'28.8"。

墓葬以长方形券顶单砖室墓最为常见,墓葬规模一般不大,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数量虽多寡有别,但多在数件至十余件之间。其中六朝和唐宋墓葬数量最多,常见随葬品有青瓷罐、碗、盘、碟等。

墓葬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之中,详情尚待时日。

(七) 新会炮台岗遗址

炮台岗遗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甜水村潭江入海口银洲湖西岸的二级台地上。为配合广东新会LNG电厂建设,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我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基点坐标北纬22°15'14.5"、东经113°04'09.5",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

探方地层堆积差别较大,部分探方堆积简单,破坏严重。典型探方地层堆积可分5层,除表土层外,皆为清代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发现大型建筑基址(编号“炮台岗1号基址”)1处和灰坑等遗迹。

炮台岗1号基址由壕沟、围墙、踏步、炮位、房基等组成。

壕沟平面呈半圆形,环绕于北、西和南围墙以外。经解剖,壕沟口宽6~8米,残深2米,距围墙约8~14米。

围墙平面略呈菱形,墙壁砖石混建,墙体中心夹筑夯土,外墙基砌筑护坡。围墙边长约36米,残高0.2~0.9米,墙内

院落面积1296平方米,北墙厚3米,东墙及南墙厚2.8米,西墙厚2.6米。西墙中部设门道1个,西墙低部砌设排水暗沟2条。

踏步2处,对称分布于围墙内侧的西北和东南角。踏步紧贴围墙内壁,砖砌或砖石合砌,西北角踏步残长5.6米、宽1.1米、残高0.2米,东南角踏步残长5.5米、宽1.15米、残高0.47米。

炮位分布于东围墙内侧,共有4个。炮位皆砖石混合垒砌,规格、间距略有差异。

围墙内发现房屋基址6处,平面皆呈长方形,编号F1~F6。

F1位于墙内院落的东部,座东向西,通面阔15.3米,进深5.7米,方向252°。4开间,从北向南依次编为F1-1~F1-4。F1-1砖砌墙基,墙体由瓦砾、灰浆、黏土等混合材料夯筑,外壁批挡,房内残存少量铺地砖,面阔3.7米,墙残高0.36米;其余各间建筑风格与F1-1相同,面阔依次为4.2、3.7和3.7米。

F2位于墙内院落北部,座北向南,建筑风格与F1相仿,通面阔13.4米,进深4.6米,方向162°。4开间,各间面阔自西向东分别为3.2、3.2、3.2和3.8米。

F3位于墙内院落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座南向北,建筑风格与F1相仿,通面阔12.8米,进深4.6米,方向344°。4开间,各间面阔皆3.2米。

F4紧贴南围墙内壁砌筑,座南向北,通面阔5米,进深1.7米,方向347°。残存墙体由砖、石夹杂蚝壳砌垒,2开间,各间面阔皆2.5米。

F5位于墙内院落东北角,座北向南,通面阔残存6.05米,残进深2米,方向165°。残存2开间。

F6位于墙内院落西南角,座南向北,通面阔残存7.85米,残进深4.3米,方向346°。残存3开间。

根据堆积层位和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上述6座房屋依建筑时代的早晚分3组,最早的一组为F5、F6,其次为F1、F2和F3,最晚为F4。炮位的建筑年代晚于第一组房屋,第二、三组房屋废弃年代则可能相同。

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

陶器有香炉、盏、盒、器盖、壶、碗、罐等日用器皿及长方形砖等建筑材料。

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主要器类有碗、杯、盘等。

其余器类有“乾隆通宝”和“熙宁通宝”铜钱、铜纽扣、铁砂弹等。

根据《新会县志》及《崖西志》的相关记载和炮台岗1号基址的地理位置、堆积层位、布局结构、建筑风格和包含遗物分析,炮台岗1号基址为清代崖西炮台旧址。3组建筑年代不同的房屋皆以兵营为主,壕沟、围墙、炮位和兵营的布局合理,构成了比较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

(各项发掘的主要收获均采编自项目领队或执行领队撰写的工作报告或考古年鉴专稿。)(邓宏文)

(八)广州市考古

2006年,广州的考古工作仍然以配合各项建设工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为主,工作范围除仍以广州传统历史城区及近郊为重点外,也随着基本建设工程扩展到较远的区市。本年度,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建设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计完成勘探面积450000余平方米,发掘面积近11500平方米,清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古墓葬208座,出土各类文物4250余件套,另外还清理码头、水井、灰坑、灰沟和房址等各类遗迹。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时代从先秦、两汉直至明清时期。

以下以考古遗存的时代为序对2006年度广州考古的主要收获进行综述。

1. 先秦时期

2006年,本所在广州东部的萝岗区和增城市发掘两处先秦遗址。

萝岗隔田山遗址地处广州科学城建设范围。配合广州科学城的建设,本所于2001年对工程建设范围进行文物调查,发现了数十处先秦文化遗存,隔田山遗址即属其中一处。遗址于2006年5-9月发掘,在山岗东北坡脚、山顶及南坡两个地点,发掘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清理的先秦遗存包括相当于中原商时期的墓葬3座及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3座墓葬均位于岗顶的小平台上,埋藏较浅,以陶器随葬,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以泥质陶居多。器类有高柄豆、圈底釜和圈足盘。从陶器的特征初步分析,3座墓葬的绝对年代大约距今3500~3200年,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中期偏晚。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于山岗东北坡脚和南坡坡麓,其中东北坡脚的堆积被宋代建筑基址叠压,根据发掘的情况判断面积约3000平方米,当为一处人类居址。山岗南坡近山顶的马鞍山山脊两侧,尤其是山脊南坡区域清理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灰坑、柱洞及文化层等堆积,出土有陶釜、罐、豆、支座、砺石、石镞,以及1件青铜斧和铸造青铜斧的残石范等遗物。根据发掘和调查的情况判断,遗址面积在两万平方米以上,属于一处较大型的聚落。另一处先秦遗址位于增城市新塘镇老虎岭。配合荔新公路工程进行的小规模发掘,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纹饰有方格纹、云纹、雷纹、席纹、菱纹、水波纹、米字纹、曲折纹、叶脉纹、菱格纹、圈点纹、复线方格交叉斜线(或加圆点)纹等,石器有镑、斧、刀、凿及砺石等,多磨制。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商时期。此次发掘未发现遗迹,受发掘面积所限,遗址的性质尚不明朗。

2. 两汉时期

两汉考古一直以来是广州考古的重点。2006年发掘多处两汉时期的建筑基址、灰坑、水井和墓葬等遗迹。

西汉前期即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存相当丰富。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广州目前正在进行的唯一一个主动考古发掘

项目,其发掘工作自1995年起至今已逾十年。2002年起,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联合组队对宫署遗址进行发掘,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2006年发掘面积490平方米,发掘区域位于原儿童公园北部。发掘区内文化层堆积情况与往年发掘情况相近,共有文化层13层,发现自近现代至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共计632个,以南越国宫城的北宫墙至为重要。

北宫墙位于发掘区北部,东西走向,清理出的部分长14.5米。宫墙被晚期遗存打破,受破坏严重,地表以上墙体无存,现仅存地下墙基槽部分。墙基槽往下渐收呈倒“凸”字形,用红黄色粘土杂少量瓦片分层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墙基槽底部北侧深下呈沟状,作用未明。墙基槽夯土层内出土的遗物多为细碎瓦片,瓦表面饰粗、细绳纹,里面饰突点纹。此外,还出土有少量表面饰方格纹为地,戳印圆形或方形几何图案的瓮罐类陶器残片和表面饰篦点纹的陶器盖以及碎石块等。2005年也曾发掘出南越国宫城北宫墙的一段,与此次发现的宫墙位置略有相错。南越国宫城北宫墙的发现,为确定南越国宫城的北界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座标,具有重大意义。

中山二路马棚岗中山大学北校区清理南越国时期的灰沟1条。沟平面呈长条形,西高东低,长14.6、宽0.9~2.99,最深1.2米。沟中有4个坑,时代与沟相近。沟壁、底面有烧结的红烧土、灰烱硬面。出土遗物有陶釜、罐、甗、壶的残片,较多绳纹瓦片,以及铁块、碗、网坠、铜印章、半两铜钱、铜箭镞、铜块、铜片等。从遗迹结构和出土遗物判断,该灰沟可能与烧造冶炼有关。

中山一路东山口和农林上横路均发掘出南越国时期的水井。其中东山口清理南越国时期水井7眼。井口直径多达2米以上。出土物大量陶罐,多为敛口,尖圆唇或卷唇,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两个半圆形耳,器表饰小方格纹。有一口井(编号J27)有陶井圈,直壁、圈底。井圈壁沿有几道绳索磨勒的凹槽,可断定这是井口沿的井圈。井里还有带榫卯的木构件,可能与井口的井台有关。在井中填土里还出有三重菱格纹方砖、粗绳纹板瓦、云树纹瓦当、夹砂陶釜、纺轮和几块扇形井砖等,具有典型的南越国时期特征。

黄埔区南海神庙发掘南越国时期遗存,出土陶釜、陶罐、陶三足盒、陶碗、陶小杯、兽骨等遗物,陶器纹饰以复线对角方格纹(变形米字纹)为主纹,通常与细方格纹组合,部分遗物的年代可早至战国。这是首次在珠江岸边发现南越国时期遗存,也是广州地区经考古发掘的最东端的一处南越国时期遗存。

南越国时期的墓葬数量不少。东风东路金色家园、沙河顶艺术苑、中山二路中山大学北校区等地均有发现。其中金色家园工地发掘西汉墓30座,年代集中在南越国时期。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29座有椁。有椁墓

可分底铺小石墓、立柱式椁室墓及井椁式椁室墓三类。墓向无规律,基本上依山势而造。4座底铺小石墓中有1座带斜坡墓道、2座设腰坑。随葬品多为几何印纹硬陶瓮、罐、甗、小盒,具有鲜明的越文化风格。个别墓出铜矛等兵器或陶纺轮等生产工具。4座立柱式椁室墓以往发现较少。其特点是墓室两侧各立3根木柱,两两对称。墓底及四围未发现板灰痕,推测只在柱顶架梁铺板,构成立柱式椁室。墓内随葬品以地方色彩浓厚的陶器为主,个别墓出鼎、壶等具汉文化特点的仿铜陶礼器。井椁式椁室墓数量最多,达21座。墓壁平直,墓室长宽比约2:1。椁室由枕木、底板、壁板、盖板组合而成。椁外四周用沙或土填实。棺具多偏于一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墓出铜钱、铜镜、铁制的生产工具或漆木器。少的五、六件,多的四十余件。汉越风格的器物共存。鼎、盒、壶、钺等仿铜陶礼器多为软陶,质地疏松;瓮、罐、甗、小盒等仿日常用品多为硬陶,质地坚硬,器身多饰有方格纹、水波纹及戳印,有的还施薄釉。

沙河顶艺术苑发掘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深不足30厘米。棺位底部铺一层小石。后部出陶甗1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精美。该墓年代当为南越国时期。

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两座南越国时期土坑墓,推测为夫妻同坟异穴合葬。两墓各有棺槨,已朽。随葬陶鼎、壶、罐、瓮、孟、盆、釜等器物。此类葬式在以往发掘中极为少见。

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众多。恒福路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银行疗养院发掘西汉中期墓2座,其中一座大型木椁墓(编号M46),墓室长6米、宽4.84~6米、残存深6.1米,墓向175度。由墓道、封门、横前室和主室组成,前、后室之间有门相通。主室呈长方形,两具木棺在主室中部,棺内铺垫布纹,棺外髹红漆,清晰可见,还有柿蒂纹鎏金铜泡钉。从木棺的朽痕看应是夫妇合葬墓。西侧棺出土鎏金铜削,铜鸕杖首、剑、镜、带钩、印章等;东侧棺有铜胭脂盒、眉刷、碗、灯、镜、玉佩、水晶、玛瑙、玉等珠形串饰等。该墓随葬遗物150多件套,铜器达54件,数量多、种类齐、纹饰精,特别引人注目,主要器形有鼎、盒、提梁壶、温酒樽、三足釜、甗、瓶、熏、蘸炉、卮、洗、碗、灯、镜、削、剑、矛、戟、鸕杖首及印章等。大多数有纹饰,有龙纹、凤(鸟)纹、蟠虺纹、云草纹、柿蒂纹等,以模铸、凿凿等工艺装饰。这批铜器保存较好,为近年来广州考古发掘少见。陶器主要有瓮、罐、四耳罐、鼎、盒、壶、钺、盆、提筒、温酒樽、豆形灯及仓、屋、灶、井等,四耳罐数量最多,达24件。这些陶器多为泥质灰色硬陶,胎质细腻,火候较高,器表多施薄釉,呈黄褐色,或局部釉较厚而呈黄绿色。另外,还出土有金珠、水晶珠、玛瑙珠、玉珠、狮形琥珀串饰。墓中还出土一枚方形瓦钮铜印章,篆刻“陈顺和印”。当为墓主人私印。此墓随葬器物众多,制造精美,是广州目前发现铜器数量仅次于南越王墓汉墓,表明墓主身份较高,地位显赫。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此墓属西汉中晚期。

沙河顶艺术苑发掘1座长方形竖穴木椁墓(编号M3),方向正南。斜坡式墓道,墓道东侧壁有柱洞,墓道以原坑土夹灰绿泥和细沙回填。墓室分前后室,底部平齐,不分级。墓室内棺槨均已腐朽,但朽痕清晰可见。前室长2.1、宽2.6米,前部填细沙,后部原坑土回填。后室长5.6、宽3.6米。以原坑土回填。棺位位于后室中部偏左。后室底部两条纵向枕沟直通前室。随葬器物集中在后室西部,以陶器为大宗,铜器仅在后室后部随葬铜镜一面,朽碎严重。陶器有鼎、瓮、直身罐、罐、钺、壶、仓、盒、灯等。前室随葬灶、井和提筒。此外,在后室前部及棺位两侧残留许多漆痕,可辨盒、耳杯等器形,且数量不少。从陶器的种类及形制判断,该墓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这是近年来广州发掘西汉中期墓中形制较大的一例。

此外在麓湖公园、农林上路、中山大学北校区等地都发掘出西汉中晚期墓葬。麓湖公园M8属西汉中期,棺槨均腐朽无存。随葬遗物均为陶器,有罐、四耳罐、壶、孟、瓮、纺轮、匏壶等,以罐和壶居多。出土的陶匏壶具有典型的西汉中期特征,是判断墓葬时代的重要依据。

东汉墓数量也不少。东风东路金色家园工地发掘东汉墓15座。仅1座为土坑墓,其余14座均为砖室墓。多数遭盗扰,有的连底砖都被撬取。依棺室的数目,可分单室、双室及三室等三种类型。2座单室墓并列,墓形基本一致,应为夫妻异穴合葬,每墓为单侧带耳室,妻墓被盗,夫墓保存完好,出土四乳禽兽纹铜镜、铁剑、黛砚及陶鼎、壶、罐、簋、盒等日常用具及屋、仓、井、灶等模型明器。1座三室墓为砖木合构,规模较大。双隅墓壁,左、中、右三室并列于横前堂之后。三室长度相等,为4.25米,右、中室同宽,为1.16米,左室略窄。前室横宽5.5、纵长1.85米,底横铺五块长条木板,前壁正中有木板封门,门外接斜坡墓道。该墓惨遭严重盗扰,顶部已毁,墓内随葬品无存。

农林上路发掘一座东汉前期土坑墓(编号M6),分前后室。后室被一口直径近2米、深度超过4米的五代水井打破。出土陶壶、直身罐、灶等器物,其中出土一件陶俑座灯造型较为别致,为一胡人单手托灯,胡人面部及身体各部位刻划栩栩如生。另外还出土了成串“五铢”铜钱、铁环首刀和铜镜等,均不同程度锈蚀。

麓湖公园M7残深仅40厘米,葬具无存,但器物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有井、灶、灯、魁、碗、盒、罐、提筒、屋等,其中1件陶魁和11件陶碗组成的一套餐具富有特色。另有铜钱、铜带钩及琉璃珠、铁器等。其年代当属东汉前期。

海珠区官洲岛发掘一处较大的两汉墓群。官洲岛位于广州的东南部,为一面积约1.8平方公里的小岛,东南邻广州大学城。第一期考古发掘清理古墓葬28座,其中砖室墓20座、土坑墓8座。出土文物包括青铜器、银器、铁器、陶器及水晶玛瑙制作的装饰品,共计500余件套。其中一些器物,如陶羊形容器、陶镇墓俑等为广州地区以往考古发掘

少见。这批古墓葬的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晚至东汉时期。

3. 三国晋南朝时期

广州地区发掘的三国墓葬数量极少,2006年度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一座砖室墓M1,初步断在三国时期。墓室东西长6.7、前室最宽3.15、深1米,由甬室、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东部。甬室与后室为券顶,前室为穹窿顶。随葬器物以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物组合有鼎、簋、壶、罐、三足釜、碗、卮、灯、薰炉、温酒樽、屋、仓、灶、井、铜碗、铜钱等。该墓出土1件敞口折腹青釉罐,颇有特色。晋南朝墓葬相当丰富。麓湖公园、东风东路金色家园、中山二路中山大学北校区、东山口等地共发掘晋南朝墓葬30余座。

麓湖公园发掘4座晋南朝墓。M1被8座清墓和一座唐墓打破,但砖室结构尚存,墓内随葬器物大部分保存较好,前室出土青瓷洗、钵、盂、碗等,后室出土钵、碗和滑石猪。其年代在东晋中晚期。M2属南朝晚期,券顶已无存,长10.9、宽2.16~4.60米。由墓道、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甬道前部有方形渗井,前室两侧有耳室,过道以九级台阶与前后室相连,后室以五层砖铺底。M4结构与M2相似,年代相近。M9为东晋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讲究,有墓道。墓坑全长8.4、宽2.52~2.76米。墓室由封门、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砌祭台。单重券顶,甬道和后室均结砌承券。后室以青灰砖纵向错缝平铺底部,前室和甬道均以“人”字形铺底。该墓被严重盗扰,仅在前室出土青瓷碗、罐、钵等器物。这4座晋南朝墓葬虽受盗扰,但其结构保存较完整,为广州地区六朝墓葬的形制和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资料。

东风东路金色家园发掘15座晋南朝墓,均为砖室墓。以中小型墓为主,长度不超过7米。墓内随葬品不多,以青釉瓷器为主,器型有碗、钵、盒、盆、盘、双耳罐、四耳罐等,多数墓随葬成对的滑石猪,个别墓随葬铜镜、金指环等。其中一座晋墓采用了大量东汉残砖构筑墓室,墓砖上有模印的“永初元年造”铭文,也有压印的掌纹及刻划的各类符号。1座双室墓形制特别,由2个分别有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的互相对称的中字形墓室并列组成,前室有过道相通。甬道内侧加2道承券,底部正中设方形渗水井;前室两侧掏设券拱形壁龛,龛下以特制砖砌成壶门;后室高出前室九级台阶,正中有砖筑棺床,后壁亦设壁龛及壶门。该墓结构规整,制作精工,突出表现在排水系统的铺设之上。建墓时预先设计底铺三层砖,每层铺法不同,排水沟埋设在前室上二层底砖之间,由后室两侧侧壁之下,通向甬道之渗水井,渗水井之间也有排水沟贯通,这便使墓内所有的积水,通过左室之渗水井,流向其前方挖设的排水沟,排往墓外。墓内渗水井里出土有青瓷六耳罐及双耳盆,前室及壁龛中出土7件青釉小杯,后室出土铜镜1枚、滑石猪2对。其出土的青瓷六耳罐,腹下部收束,底部外撇,据此推定该墓年代约在南朝晚期。

中山二路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11座晋南朝墓,有长度在4米以内的小型单室墓,也有较大的“吕”字形双室墓,墓室长8~10米。“吕”字形墓由墓道、砖砌排水沟、甬室、前室、耳室、过道、后室组成。墓葬出土随葬品基本为青釉瓷器,有少量酱釉陶器和石、铜、金器等。器类有鸡首壶、碗、钵、杯、盘、盂、罐、博山炉、灯、瓶、砚台、笔插、狮形莲花座塑像、佛塔模型及铜器盖、铜棺钉、金薄片。南朝时期的墓葬以M21为代表。墓室前室两侧有对称台龛式耳室,同时砌出桃形窗与建筑斗拱等形式,后室设有棺床,甬室与过道间多设有一二道闸口,闸门可能为木质,已全朽。出土青釉佛塔模型明器、净瓶、狮形莲花座塑像、饼底四管笔插等器物,釉层保存相当完好,为以往发掘罕见。

4. 隋唐五代时期

由于隋代时间短,在广州城区内的遗址发掘中很难找出隋代的文化堆积层,也未发现明确为隋时期的遗存。

唐代的遗存有墓葬和水井等。沙河顶和东风东路发掘唐墓8座,均为小型砖室墓,受破坏严重。一般内分前后室,前室中部砌方形渗水井。出土开元通宝铜钱、青釉碗、小罐等器物。

东山口发掘唐井2眼。其中一口土井(编号J18)出土大量黑釉六耳汲水罐以及釉陶碗。发现一串铜钱,约400枚,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乾元重宝始铸于唐高宗乾元元年(758),其铸行时间很短,为该井的废弃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

南汉是岭南地区以广州为都的第二个地方政权,近年来发现的这一时期考古遗存日益丰富。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三座大型南汉宫殿建筑基址,保存较为完好。每座宫殿台基的周边均用砖包砌,台基之间有砖铺通道。受发掘面积所限,这三座建筑的建筑规模和布局尚不明晰,有待下一步发掘全面揭露究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南汉国宫殿的建筑规模十分宏大。

东山口发掘南汉水井18眼。分布密集,有的水井相距仅1~2米。基本上都是土井,仅1座砌砖壁,直径一般为1米左右。出土遗物以生活用品居多,如青釉罐、碗、盘、灯、陶釜等,同时还有砖、瓦等建筑构件。绝大部分水井内都出有“乾亨重宝”铅钱,有的更是上百枚地成串出土。此外,还出土一批较完整的瓷器,大部分饰青釉,釉层均匀,莹润光亮,有的还有细小冰裂纹。除此以外,还发现南汉灰坑5个,多呈椭圆形,坑壁陡直,圆底,有一些灰坑可能是废弃的或未挖成的小水井。填土呈黑灰色,质松,出土物多是生活用品,如青釉碗、盘、罐、壶等。这批南汉时期的水井数量众多,水井内出土的一批陶瓷器,因大多与铅钱共出,年代明确,可以作为南汉陶瓷器的标型器,为南汉墓葬和遗址的断代分期研究提供了标尺。

5. 宋代

本年度宋代的考古发现以南海神庙的宋代建筑基址和萝岗隔田山南宋村落遗址规模较大。

南海神庙的西侧清理出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出土一批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是目前与南海神庙有直接关系年代最早的遗迹。第一组基址为东西向长廊形建筑。已揭露部分面积约1000平方米。垫土共3层,厚约0.5米~1.1米。建筑基础礅墩在垫土上修筑。东西有23个礅墩;南北有三行。目前已知共有69个礅墩,分布东西长达92米(未到尽头),南北宽约11米。第二组基址位于稍北的台地上。在已发掘385的平方米范围内清理礅墩23个,筑法与第一组接近。礅墩大小不同,分布间距疏密各异,可能有不同功能和期别。

萝岗隔田山遗址的南宋村落面积较大,主要清理出建筑基址的基础部分,居住房屋、院落及户外的活动场的垫筑层清晰可见,分区明显,属于一处较大规模的古居址。

市区及近郊多个地方都发掘出宋代水井和灰坑等遗迹发现。东山口发掘宋代灰坑3个、水井10眼。水井以土壁为主,只有两座井壁砌砖,水井大小、深浅不一,小的直径仅0.66米,大的可达1.8米。出土青瓷执壶、瓜棱壶、洗、盘、盏、碗、釉陶四耳罐、陶纺轮、灯等。灰坑多椭圆形,出土物以青瓷碗、盘等生活用品居多。

广州地区宋代的墓葬历来发掘很少。金色家园发掘宋墓2座,皆为小圆土坑,内置青瓷魂瓶。反映了宋代广州流行火葬的习俗。

6. 明清时期

在广州城区内发掘的明清时期文化层堆积普遍较厚,出土遗物以青花瓷器为主,遗迹主要有水井和房基,但受晚期人类活动破坏严重。南海神庙发掘的明清码头遗址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码头遗址长约120米,大致南北向,由埠头、道路和小桥构成。埠头位于南端,略呈长方形,台基南北长17、东西面宽5.5,现存高1米左右。全部用长条形石块砌筑。南面砌有九级台阶,北侧接道路。道路为长条形,长90多米,宽4.4~4.5米。道路为夯筑土芯,路面呈龟背形,正中铺石板,两侧为土面,以碎石铺垫。道路的两侧壁有两种不同做法:南北两端,即接码头和靠近小桥的地方砌筑石块包边;中间的一段则用木挡板。侧壁外填以石块和泥土作护坡。道路的北段有一座小桥,桥洞砌成弧形,宽3米许,桥面原为平铺石板,后被拆毁。

明清码头和道路位于南海神庙南门外,以花岗岩石铺砌。清代码头和道路已揭露南北长20余米,分为埠头和道路两部分。“五板石”道路面宽1.9米,向北达至牌坊,通往庙内。道路分南北段,南段以花岗岩铺砌,北段用红砂岩砌筑,二者之间有阶级承接。埠头踏阶保存较完整,东西宽9.6米,有九级踏阶,两侧彻石。清代石板路及其垫土的下面,还有另一组道路基础。是用红砂岩石块在东西两侧砌筑路基,比清代的花岗岩五板石路面要宽。大量碎砖瓦以及一些青花瓷片和陶器残件,可推断为明代晚期。

南海神庙西廓的西侧,清理一座清代建筑基址,发掘

面积440平方米。从文献记载的方位看,当系清代南海神庙“东佛西玄”之西玄凝真观的遗址,由院墙和殿堂两部分组成。平面布局大致长方形,坐北向南,殿堂建筑中轴线由南向北有石台阶、山门、天井等。山门的东、西两侧各有偏房一间,天井的两侧分别为东廊和西廊,外围还有东路建筑和西路建筑等。天井后部及东、西路建筑的边界因未清理,结构不明。

东山口发掘明井1眼。圆形,井壁用东汉、唐、宋、明代砖及红砂岩结砌。出土釉陶四耳罐、三耳罐、壶,青花瓷碗等。其中青花瓷碗保存完好,外壁绘仙鹤祥云,底部书减笔“富贵佳年”吉祥语,碗心绘一“王”字云纹。从器型、釉色判断,该碗可能是嘉庆年间的遗物。

正式发掘的明清墓葬很少。东风东路金色家园工地发掘的明清墓均为长方形土坑墓,长2.0~2.5、宽0.6~1米,多数随葬5个酱釉小罐,罐内放置一小陶羊,反映了当时的随葬习俗。

7. 其它

2006年1~2月,配合“中共三大”旧址的保护工程,本所对旧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的建筑基址保存基本完整,除墙基之外还残存局部红阶砖地面。平面包括主体建筑与北边的侧院,其中主体建筑基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此次发掘的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调查及相关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为中共三大会址的保护与展示奠定了科学基础。

回顾2006年度广州的考古工作,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基本建设的密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抢救性考古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增加。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各时期的考古资料,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通过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也促使我们对广州地区各时期地下文物资源的分布和埋藏情况进一步了解,这为今后继续开展主动或抢救性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

(易西兵)

(九) 深圳咸头岭遗址

咸头岭遗址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咸头岭村,是坐落在大鹏湾畔二、三级沙堤上的沙丘遗址。该遗址1985、1989、1997和2004年进行过四次发掘。2006年2~4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在遗址西北部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共布探方18个,发掘面积555平方米,五次发掘的面积共近2300平方米。

2006年咸头岭遗址发掘的遗存主要包含新石器 and 商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掘最为重要。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主要有灶及大面积的红烧土面等,出土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泥质陶中有大量的白陶、彩陶和少量的磨光黑陶,器类有罐、杯、盘、豆、钵、釜等;石器有锛、拍、砧、饼、砺石等。商时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主要有罐、釜、尊等;石器有锛、锛、砺石等。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制,可以把此次咸头岭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分为四个阶段。

段 夹砂陶所饰绳纹很细,夹砂陶釜均为卷沿。泥质彩陶为浅黄色胎,纹饰以红褐色条纹为主,有的在压印纹中填彩。见少量磨光黑陶。泥质弧腹圈足杯为大敞口;彩陶壶颈部高而直;泥质圈足器的圈足或口沿部分多饰很细的曲线划纹,镂孔较小。圈足盘、豆的盘腹部较深,圈足外斜;白陶纹较常见,多饰复杂的压印纹。

段 夹砂陶饰细绳纹,夹砂陶釜为卷沿,泥质彩陶为浅黄色胎,器表上红褐彩纹饰除条纹处,由曲线构成的纹饰很多,还见连续的点状纹;有少量磨光墨陶;泥质圈足器上的镂孔较大;圈足盘、豆的盘部变浅;泥质弧腹圈足杯为小敞口,彩陶壶的颈部较低而外斜;白陶常见,多饰复杂的压印纹。

段 夹砂陶多饰粗绳纹,夹砂陶釜多为折沿,也有少量盘口;泥质彩陶主要为浅红色胎,器表饰较潦草的红色条纹和曲线纹;泥质圈足器上镂孔均很小,且圈足上多有划纹;圈足盘的圈足较大而直;白陶较少,多为素面,少量有简单的压印纹。

段 夹砂陶多饰粗绳纹,有的口沿部还见贝划纹、压印纹和戳印纹。夹砂陶釜为折沿;少见彩陶,除泥质浅红胎上饰红彩外,也见夹砂陶饰红彩,白陶鲜见。

商时期的夹砂陶多饰粗绳纹,少量饰菱格纹;夹砂陶釜多折沿,也见盘口;泥质陶多为灰色,也有浅黄色,饰有雷纹、菱格纹、曲折纹、重圈纹和方格纹等。这些出土器物的特征与环珠江口地区一些年代确定的商时期遗址的出土器物特征一致。

咸头岭遗址新石器时代 段的年代上限,碳十四测定为距今近 7000 年(经树轮校正); 段的年代,根据 2004、2006 年发掘的木炭标本碳十四测定大约距今 6800~6400

年前后; 段出土器物与深圳大黄沙遗址出土器物特点一致,年代应该相同,大黄沙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定为 6255±260 年(经树轮校正); 段的年代推测应在距今 6000 年前后。

咸头岭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和年代研究,为环珠江口地区相关遗址的分期、断年奠定了基础,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树立了一个重要标尺。咸头岭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环珠江口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其 段遗物是目前这一地区所发现的有准确年代的遗物。从已有资料来看,咸头岭遗址与环珠江口地区同时期的其他相关遗址比较,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器物制作工艺水平最高,而且 、 段的遗物在环珠江口地区目前发现的其他 20 多个相关遗址中少见,这可能表明咸头岭遗址是一个中心聚落遗址,因此它是深入认识环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

咸头岭遗址 段出土的白陶和彩陶已经很成熟,而从 段至 段却显示出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白陶和彩陶的出现,目前在广东地区找不到比咸头岭遗址 段更晚的。我国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见于湘西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同出的还有彩绘和填彩陶器,高庙文化的年代距今 7800~6800 年(《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咸头岭遗址白陶上一些复杂的压印纹、戳印纹、刻划纹等,在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中可以找到相似者,推测咸头岭遗址的白陶和彩陶受到湘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另外,在洞庭湖区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中也有精美的白陶和彩陶,咸头岭遗址白陶上的一些纹饰也有与之类似的,那么咸头岭文化与这些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相信通过对咸头岭遗址发掘材料的系统整理和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湖南等地相关遗址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到解决。本次发现被评为 200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 梧州木铎冲遗址

木铎冲遗址位于梧州市长洲区长洲镇龙华村山坡上,浔江的左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距市区约 15 公里。面积约 4 万平方米。为配合洛湛铁路梧州段工程建设,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梧州市博物馆于 2006 年 7~9 月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为 1260 平方米。发现古墓葬三座,出土文化遗物 200 余件。

发掘分 A、B 两个区,两个区的地层堆积大致相同。即堆积的上部为近现代文化层,下部为旧石器文化层。此次发现的三座墓葬分别编号为 M1、M2 和 M3。其中 M1 和 M3 为唐墓,M2 为明墓。

M1 为一座竖穴土坑墓。墓坑呈长方形,长 2.2、宽 0.9、深 0.74 米,方向 150°。墓内尸骨无存。随葬品仅 1 件带盖

青瓷罐。该罐施青黄釉,卷沿鼓腹,四耳,为唐代常见器物。因此,该墓的年代应为唐代。

M2 为砖室墓。地表无封土堆,未发现墓道。墓室长方形,南北向,长 2.4、宽 1.1、高 1.05 米。墓室前端口外壁顶部置放五个小陶罐。墓室内发现明代铜钱 13 枚、棺钉(铁钉) 5 颗、人牙 3 枚、残肋骨一段。在墓室后端还发现 5 片青瓦。根据墓葬形制、出土的陶罐和铜钱判断,该墓应为明代墓。

M3 属于土坑墓。墓室为长方形,南北向,长 2.4、宽 1.34、残深 0.9 米。共出土了 22 件随葬品,包括金器、银器、铜器、瓷器、石器等,种类有金发钗、银碗、银勺、铜镜、瓷罐、陶俑、滑石猪等。陶俑置于墓室底部两侧,为穿带服饰的人身兽头,高近 30 厘米,呈站立姿势;在墓室的后端两边各有一个怪兽。金银铜器发现于墓室底部的中北部,一

对金发钗呈“V”字形斜立着;一个银碗和两个银勺叠压在一起;银勺的旁边还有一面铜镜。这些银器和铜镜原先可能置于木盒内,因为周围发现有残留朽木。在墓室南端出土一对滑小猪。瓷罐位于墓室的北端,与金银器之间有一侧立的陶砖相隔,且此砖是该墓中发现的唯一一块砖。根据墓葬出土物判断,该墓应为唐代墓。

此次发掘除在墓葬中出土的文化遗物外,在旧石器地层中出土的文化遗物只有石制品,种类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石器原料均为砾石,以石英岩、砂岩为主,单面加工,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且以砍砸器为主,石器个体较小,磨蚀和风化均不明显。根据地层特征和出土遗物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通过发掘发现,木铎冲遗址的红土地层分为原生地层和次生地层,原生地层属于基岩风化层,没有经过搬运;次生地层是基岩风化层被侵蚀搬运后在低处形成的第二次堆积。石器均发现于次生堆积层的第二、第三层。因此,木铎冲遗址不是位于河流形成的阶地之上,而是位于基岩风化层之上,遗址地层堆积属于坡积物。虽然出土石器的地层为此生地层,但绝大多数石器没有搬运冲磨痕迹,表明基本上是原地埋藏的。

此次出土的石器虽然数量不多,但结合地表采集的部分看,基本上能够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总的来看,这些石器制作比较精细,器型较小,工具种类少,缺乏手镐和手斧,和百色盆地网纹红土地层出土的石器存在较大的差别。

此次发掘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了3座历史时期的古墓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M2墓室前端外壁镶嵌陶罐的做法独特,在岭南地区未曾发现过。M3是迄今为止广西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土坑墓,其随葬品不仅丰富,而且相当一部分在两广的同期墓葬中属于首次出土的。这为研究唐代岭南地区的葬俗、服饰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谢光茂 周学斌)

(二) 百色大梅遗址

大梅遗址位于位于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桂明村大梅屯东北侧,右江的南岸。面积约0.5平方公里。为配合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建设,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7月底~2006年1月中旬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分为A、B、C、D、E五个区,总共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揭露出柱洞群、石器制作场等一批遗迹,出土文化遗物10000多件。

其中A区位于右江南岸的第二级台地。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下挖深度一般为1.5米;为了解决阶地序列问题,对其中的两个探方(AT502和AT602)下挖到砾石层,深达12米。地层堆积一般可分为5层。其中第一、二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三、四层为旧石器文化层。第五层以下未发现任

何文化遗物或玻璃陨石等。

在发掘区的中部和西部,发现有一批柱洞,开口在二层底三层面上,打破第三层。柱洞一般为圆口直壁,口径多在15厘米左右,深15~20厘米不等。洞内未见任何遗物。这些柱洞分布无明显规律。在发掘区的中部,还发现有6个石堆,其位于二层底三层面上。石堆一般由五六个砾石堆成,圆形,平面直径在20厘米左右。这些石堆相距3~5米,分布无明显规律。

A区第三、四层出土的文化遗物均为石制品,总共有300多件。石器均为打制而成,未见磨制石器。第三层出土的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石器大小并存,且小的占多数;石制品有明显的风化现象。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手镐仅个别。第四层出土的石制品几乎都是尺寸较大的石器,石片、断块等很少。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石制品无明显的风化。根据地层和出土遗物初步推测,A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发现于二层底三层面的柱洞和石堆,属于历史时期。出自第三层的石制品,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自第四层的石制品,其总体面貌与上层的石制品有明显区别,且地层也不一样,年代应比上一层的早,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

B区位于右江南岸的第三级台地。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下挖深度一般为1.6米,最深达4.2米。B区地层堆积由上而下可分为5层,其中第一、二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三、四、五层为旧石器文化层。

本区发现有石器制作场、柱洞、沟渠、灶坑、烧土面等遗迹。柱洞、沟渠、灶坑等发现于二层底三层面上,打破第三层。柱洞几乎在整个发掘区都有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有两排平行排列的柱洞,东西向贯穿发掘区两边;两排柱洞相距约50厘米,柱洞间距近50厘米。所有柱洞平面均呈圆形,剖面多为“U”字形,但成排柱洞的剖面则近似“V”形。沟渠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西南角,共有6条,形状不规则,排列无序,长约200、口宽25、深20厘米。在发掘区中南部还发现一个灶坑,平面呈“U”形,坑底保留有大量炭碎,灶身周边还有红烧土。

在b层发现一个石器制造场,面积约700平方米,连续分布于发掘区的东部和西南部。石器制造场内发现大量制作石器的工具和不同制作阶段的产品,包括砾石、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片等,成品只有砍砸器、刮削器,除一件用砾石直接磨刃而成的石凿(?)、一件研磨器外,未见其他磨制石器。制作场内还发现许多成堆的石制品,主要是断块和碎片。在石器制作场的东北部,还发现两处可能是用火的遗迹——烧土面。每处径约30厘米。

B区第三至第五层出土的文化遗物均为石制品,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出自石器制作场。不同地层出土的石制品明显不同。a层出土的石制品经受明显风

化,除大量打制石器外,尚有个别局部磨制石器。b层出土的石制品也有不同程度的风化,但石器均为打制而成,未见磨制石器。第四层出土的石制品和A区第四层出土的基本一样,即石制品几乎都是尺寸较大的石器,石片、断块等很少。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石制品无明显的风化。第五层的石制品和第四层的相似。

根据地层和出土遗物初步推测,A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第一期:发现于二层底三层面的柱洞、沟渠、灶坑,属于历史时期。第二期:出自a层的石器制作场和用火遗迹,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第三期:出自b层的石制品,年代应比上一层的早,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出自第四层的石制品,年代与A区第四层相当,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第五期:出自第五层的石制品,年代应早于第四层的石制品,能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但晚于典型网纹红土中出土的手斧和玻璃陨石的年代。

C区位于D区东南侧的斜坡上,和B区隔着一凹地,相距不到50米。发掘面积1375平方米,下挖深度一般为1.2米,最深达3.2米。地层堆积由上而下可分为5层,其中第一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二、三、四层为旧石器文化层。第五层以下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本区发现6座古墓葬,分布于发掘区中北部。无封土堆。墓坑长方形竖穴,大小一般为长160、宽70、深60厘米。人骨已腐朽无存。几乎未见随葬品,仅在M1、M2发现清代铜钱若干。墓葬年代可能为清代。

C区二至四层出土的文化遗物均为石制品,总共为200多件。其中出自第二、三层的石制品,具有不同程度的风化痕迹。而出自第四层的石制品则没有这种现象。石制品种类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等。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等,不见手斧。

根据地层和石制品面貌初步推测,出自第二、三层的石制品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而出自第四层的石制品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D区位于大梅遗址西北部的一个地势较高且较平坦的台地上,属于第四级阶地,海拔约147米。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下挖深度一般为1.2米,最深达3.4米。地层堆积由上而下可以分为7层,其中第一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二至第七层为旧石器文化层。

出土各类石制品200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手镐、石片、断块、石核等,不见手斧和玻璃陨石。工具类型以砍砸器为主,次为刮削器,手镐很少。

根据地层和遗物初步推测,这些出自不同地层的石制品可能有早晚之分,即出自第二至四层的石制品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而出自第五、七层的石制品应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E区位于C区南侧一个地势相对较低的小台地上。发

掘面积375平方米,下挖深度一般为1.2米。地层堆积由上而下可以分为三层,其中第一为近现代文化层,第二为旧石器文化层。第三层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此次E区的发掘共获得各类石制品15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种类,石器打制而成,器形只有砍砸器一种。

E区的文化遗物均出自第二层,而此层明显属于次生堆积,文化遗物非原地埋藏。但考虑到这些遗物全是打制石器,其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

大梅遗址是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群中重要的遗址之一,也是百色盆地考古发掘中揭露面积最大的一个遗址。通过科学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石器制造场。此次在B区发现的石器制造场,揭露面积700平方米,呈连片分布。制造场内分布着成千上万的石制品,包括原料、制作工具、不同制作阶段的产品及废料等,反映出石器制作的各个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制造场内发现许多“石堆”,多由断块、碎片组成,“石堆”直径大小多在50厘米以内,石制品岩性单一,往往只有一种岩性,表明是一个石器加工点,代表一个作业者的工作位置。制造场内的石制品许多都能拼合,而且不少能拼合的石制品紧挨在一起,表明制造场内的石制品属于原地埋藏。象这样规模大、石制品丰富、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在华南地区属于首次发现。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石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2. 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用火遗迹。在B区石器制造场范围内发现两处烧土面,属于用火遗迹。作为旧石器时代露天遗址的用火遗迹,在广西也是少见的。

3. 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晚阶段的文化遗物。此次在大梅遗址A、B、C、D四个区不同的地层中均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这些遗物是有早晚之分的,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长期以来,对百色盆地旧石器研究结果认为百色旧石器只有一期,即距今约80万年前,没有更早或更晚的遗存。尽管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百色盆地旧石器应有早晚之分,但也没有直接证据。此次对大梅遗址的科学发掘,在不同阶地和不同地层中出土的遗物不可能属于同一时期的,显然存在早晚不同阶段。因此,大梅遗址的发掘对于解决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分期问题将是一个突破。

4. 获得一批有助于解决百色盆地阶地序列问题的第一手资料。百色盆地右江河谷的阶地序列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但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由于阶地的划分与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年代及分期问题有直接关系,此次对大梅遗址的发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做工作。在不同高程的台地进行发掘,以了解各台地地层堆积情况以及是否都有旧石器文化遗存,同时还邀请有关专家到现场指导。

通过这些工作,已获得一批科学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解决百色盆地阶地序列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

(谢光茂 覃芳 杨清平)

(三) 田阳那赖遗址

那赖遗址位于田阳县田州镇兴城村那赖屯至那坡镇六合村碌碧屯之间的山包上,地势平缓,高出附近田地约50米,彼此连成一片,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2005年7月至2006年1月,为配合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的建设,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柳州市文物考古队对田阳那赖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分布面、石器加工点和用火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玻璃陨石。遗址至少包含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早期,从地层的情况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可能还可以区分早晚。在网纹红土层下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分布面,在这个面上发现有大量的石制品与玻璃陨石共存,其中有四件手斧与玻璃陨石共存。在第三层面上发现了面积约30平方米的石片、石核等密集分布区,有不少石片可拼合,还筛出了一些石屑细片,初步推测该分布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加工地点。在三层面还发现了用火遗迹。出土的石制品有两千多件,有制作精美的手斧、手镐,还有大石片、薄刃斧、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核、石片和断块、砾石等。玻璃陨石有300余件,大多是细小的碎片,也有椭圆形等较大的颗粒。该遗址是百色盆地中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韦江)

(四) 平南相思洲遗址

相思洲为浔江上游的一个狭长的江心岛屿,位于平南县界乡界村,东北距离平南县城约16公里。整个洲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600米,面积约1.5平方公里。洲顶高出河面二三十米,洲面地势平坦。洲上住着陈、胡二姓人家,人口约一千二百人。枯水期,洲的北面可与对岸陆路相通;雨季,只能靠舟楫过往。洲上以旱地为主,竹林荫翳。相思洲遗址就位于相思洲的西部偏南位置,紧临浔江,属于河旁台地遗址,遗址面积约7000平方米。

该遗址是1984年玉林地区文物培训班对平南范围的浔江两岸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经派员对该遗址进行过复查,发现大量的用河滩砾石打制的石器及少数磨制石器。

为配合长洲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9月至12月派专业技术人员会同平南县博物馆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遗址的中部偏南,往东距村庄最近的房子约150米,往南距河岸约50米。北边一条机耕路由东往西穿过。此次发掘分A、B、C三个小区,三个小区相距在10米以内。总计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该遗址地层关系清楚,部分发掘区堆积较厚,除村民种地和南部部分被现代墓打破而遭到轻微的破坏外,保存比较完整。从发掘情况看,A区仅有一层文化层,表土层下直接就是文化层。B区可分四个文化层,堆积的厚度超过170厘米。

A、B、C三个区在层面均发现了由大量的砾石、断块、石片、相当数量的磨制石锛、砍砸器、砾石以及少量陶片等组成的一个自然和文化遗物分布面。下面以A区为例加以说明。A区层面遗物分布比较密集,在45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分布3654件遗物,平均密度达到每平方米8件。遗物分布并不均匀,不是所有探方平均分布,有相对集中分布的迹象,在AT1、AT2、AT3、AT4、AT6、AT16等方分布比较集中,例如AT2在25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达505件,密度达到每平方米20件之多。遗物的分布多数无规律可寻,各种砾石、断块、磨制石锛、砍砸器、砾石、石片以及陶片夹杂分布。在石质遗物中以砾石、断块、石片为大宗,陶片很少,且均十分破碎。砍砸器多以细砂岩为主的扁平砾石一端或一侧单向打击而成,制作简单。石锛以通体磨制为主,粉砂岩居多,石质较软,有的剥蚀严重,大部分个体较小。

此次发掘发现了不少文化遗物,包括砾石、断块、石片以及相当数量的磨制石锛、砍砸器、砾石、陶器残片等。石器均为砾石石器,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其中打制石器占多数,大部分为单面加工的砍砸器,且个体比较大。磨制石器主要为石锛。砍砸器只见于晚期地层中。陶器残片主要以灰黑色、灰色、红色、红褐色为主,陶质包括夹砂和泥质两种。大部分火候较高。许多陶胎很厚,有的厚度达3厘米以上。器类主要为罐(釜)类,多为圈底器,不见三足器。早期地层中以高领侈口或稍敞口器为主,器型普遍较厚重,晚期地层高领器相对减少,新出现了敞口矮束颈的器型,器型相对变薄。纹饰主要为粗绳纹、中绳纹、篮纹等。

从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分析,时代最早可能达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从地层堆积和所发现的遗物看,该遗址可以分为连续发展的早晚两个时期。

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此次发掘发现了至少两个时期连续发展的文化遗存,为解决浔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发现了大面积的石质遗物分布面,为弄清该类现象的性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3. 发现打制石器在晚期地层大量存在而在早期地层基本不见的现象,为探索当时人类对工具的选择及其运用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杨清平)

(五) 桂平上塔、油榨遗址

上塔遗址位于桂平市寻旺乡上塔村西南,浔江右岸的一级阶地上,遗址沿江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长约90、宽

约30米,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遗址除近河岸边自然崩塌和上世纪中期人为修水渠部分被破坏外,大部分保存较好。油榨遗址位于上塔遗址西南约150米,以前的调查资料将其与上塔视为同一遗址,此次发掘时,经勘探、发掘,发现两处遗址并不相连,而且文化面貌也不相同,应为两处不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为配合长洲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2006年9月12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两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1900平方米。

上塔遗址的地层堆积较薄且简单,厚度30~100厘米不等,可分为三层,层为表土层,层为唐宋层,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大部分只有两层,表土层下只有一层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油榨遗址可分为四层,层为表土层,层为宋代层,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宋代地层中出有少量的陶瓷片和铜钱等遗物。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包含大量的砾石、断块、制作石器的石料、石片和石锤、砾石、石器毛坯、半成品和石器、陶片等。

两处遗址中的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包括石锤、砾石、石器毛坯、半成品和石器千余件,以磨制的石锛为主,少量石斧。石器多用天然砾石仅磨出刃部而成,少数经过琢打成一定的形状后再通体磨制。陶片的数量较少,全部是夹砂陶,砂粒较细且多为泥土中的自然砂。陶色以褐色陶为主,包括灰褐、红褐和黑褐色,少量红陶、灰黄陶、灰黑陶。器表都饰绳纹,以中绳纹为主。由于陶片均为碎片,没有完整器,从出土的部分口沿和器底看,陶器主要是敞口、高领、束颈、圜底或敞口、短直颈、圜底的釜罐类。

从遗物分析,两处遗址略有不同,上塔遗址中的陶片很少,陶色以灰黑、灰黄为主,纹饰以中绳纹为主,纹饰较浅,器形以敞口、高领、圜底的釜、罐为主。油榨遗址陶片很多,陶色以红褐、褐、红为主,纹饰多为深而粗的粗绳纹,器形以敞口、沿微外折、束颈、圜底的釜、罐类为主。从浔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总的来看,上塔和油榨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略早于后者。(李珍)

(六) 桂平长冲根遗址

长冲根遗址位于广西桂平市石嘴镇必岭村长冲根屯西北约100米的浔江冲积平原,属于一级河岸台地。该遗址于1983年文物普查发现。目前遗址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40米,西距河岸约6米,东面为机耕路。

遗址共划分、、、、四个发掘区,该遗址的地层堆积主要在区,也是该遗址的中心分布区。

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遗迹、遗物的特征,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堆积分为早、晚两段。

早段单位有区的4b、4c层及其出土的遗迹。出土大量的陶片,总共出土陶片13000多片,约占遗址出土陶片总数的70%,均为夹砂陶,有粗、细砂之分,以粗砂为主要,砂的颗粒大小不一,多为石英颗粒,少量为石灰岩颗粒;陶

色有红陶、红褐、灰褐、灰陶、灰白、灰黑四类,所占比例分别为18.9%、28.6%、19.2%、10.3%、9.3%、13.7%;红陶系普遍偏灰,灰陶系则较浅。陶器纹饰单一,有绳纹、篮纹两类,主要为粗绳纹,有少量中绳纹。陶器质地较差且疏松,火候较低,表皮剥蚀严重。陶器的制作方法为泥片贴筑,部分陶器的颈部和底部多厚重。器类单一,均为圜底器。器形简单,多为圆唇敞口的高领釜或罐,也见少量圆唇敞口的折沿的釜或罐,部分器物的口部或腹部有钻孔现象。石制品的岩性有石英砂岩、长石岩、硅质岩、泥质岩、砂岩、火成岩、页岩,其中石英砂岩、长石岩、硅质岩、砂岩为常用,石制品的类别有磨制和打制两大类,所有石质类工具中以石锤占绝对多数,其次为石砧、垫打器、砍砸器、斧、镑;磨制石器常见器形有斧、镑、砾石,以砾石和镑为主,斧和镑一般通体磨光,数量不多,共17件左右,有部分半成品或毛坯;打制石器主要为砍砸器,总共出土近20件,砍砸器一般为单面加工,制作技术简单粗糙,不是十分典型,既有石核砍砸器,也有石片砍砸器。除以上两类外,还见有利用自然石块不同形状直接使用的石锤、石砧、垫打器等石器加工工具,其中石锤数量最多,约占全部石器的90%以上,既有完整的石锤,也见有石锤断块;石砧、垫打器也不少,同时也有大量的加工石器产生的废料,如断块、石片、碎片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数量最少,直接利用自然石块作为工具占绝对多数。

该段所见遗迹主要为用火遗迹和多处石器加工地点,用火遗迹分布于区T06北隔梁,为4b层下开口,共发现两堆红烧土,已经结块,呈红褐色,红烧土周边有一圈浅浅的灰烬。石器加工地点分布于区东面的探方。其中以区T01b层出土的最典型,中间为一长条形大石砧,围绕石砧旁边有原料、断块、石锤、砾石等石器原料、废料及加工工具。

晚段单位有区的4a层及其出土的遗迹、区的第4层。所出土的陶器数量较早段锐减,其中区4a层共出土5300多片,仅占区地层中出土陶片总数的30%,均为夹砂陶,有粗、细之分,以粗砂为主要,砂的颗粒大小不一,多为石英颗粒,少量为石灰岩颗粒;陶色有红陶、红褐、灰褐、灰、灰白、灰黑五类,所占比例分别为21%、21.4%、19.2%、10.4%、14.6%、13.4%,红陶较早段比例略增加,而红褐陶则大幅减少。陶器纹饰单一,有绳纹、篮纹两类,主要为粗绳纹。陶器质地和制作方法与早段基本一致,区别不大,有少量陶器的颈部和底部厚重,多数陶器颈部和底部较均匀。器类单一,均为圜底器;器形简单,多为圆唇敞口的高领的釜或罐,圆唇敞口的折沿的釜或罐数量较早段有所增加,器物的口部或腹部钻孔现象在本段基本不见。石制品的岩性、种类、器形与早段基本一致,但砍砸器数量有所增加,共39件;磨制石器略为减少,共15件,一般通体磨光。石器加工后产生的废料如断块、石片、碎片远较早段多,而且

在该段的石器工具总量也较早段多。

该段遗迹较多,均在Ⅰ区发现,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等。其中柱洞、灰坑均为4a层下开口。柱洞共发现4个,均为圆形口、直壁、圜底,四个柱洞平面大致成半圆形。灰坑发现1个,为H1,口部近椭圆形,南北长2.18米,东西宽1.8米,深1.7米,斜壁,平底,底近长方形,长1.84米,宽0.86米。窖穴内填土共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灰褐色土,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炭屑,出有夹砂陶片和较多石制品,厚约0.4~0.44米;中层为黄褐色土,包含有少量炭屑,出有夹砂陶片和较多石制品,厚约0.4~0.84米;下层为灰褐色花土,较疏松,底部有一层炭灰,出有夹砂陶片和较多石制品,厚约0.48~0.84米。在H1周边发现有多处疑似的柱洞,在坑内填土的一个柱洞还出土1件石锛。该段所见的石器加工点有多处,分布于多数探方中,一般以石砧为中心,周边散布有原料、断快、碎片、垫打器、砺石、半成品或毛坯等部分。

长冲根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叠压关系明确,所见出土的文化遗存早晚关系清楚,体现二者文化的差异和共性:差异主要体现在早段出土大量的陶器,集中成堆出现,陶器中红褐陶所占比例突出,器形以敞口高领为主,少量敞口折沿,陶器的颈部或底部厚重者比例较大,常见的陶器的颈部或腹部有人工钻孔现象;而晚段石制品数量大量出现,陶器出土数量锐减,红褐陶所占比例锐减,红陶比例增加,器形仍以敞口高领为主,敞口折沿比例有所增加,陶器的颈部或底部厚重比例较小,陶器的颈部或腹部基本不见的有人工钻孔现象,所出土的陶器零散分布,石制品中的砍砸器数量急剧增多。共性是二者出土的陶器质地、纹饰风格、造型均相似,差别不大,石制品的类型也基本一致,以石锤为主,还有石砧、垫打器、砺石、石斧、石锛、砍砸器等,石器原料的岩性、选料的特征相同,另外还残留有大量的断块、石片、碎片等。二者存在的差异和共性表明早晚两段所出土的文化遗物当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各发展阶段的功能和社会作用。

长冲根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总体特征与广西象州南沙湾遗址关系密切,但与同属浔江流域且相距不远的桂平大塘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组合风格存在较大差异,如大塘城遗址出土大量的花边、锯齿、卷沿的陶器和大量使用砍砸器风格不见于长冲根遗址,表明二者的文化来源和发展时间可能不同。另外,从早段出土的陶器特征来看,其风格类似于邕宁顶蛳山遗址第四期出土的陶器,而与顶蛳山遗址第三期不同,而且比顶蛳山遗址第四期的更原始,因此,长冲根遗址的年代上限可能介于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三期和第四期间,绝对年代约距今七千年左右。

除了在新石器时代堆积中发现的文化遗物外,还在第2、3层中出土了一批通体磨光的石铍石器,为该遗址的另外重要发现,这些石铍石器没发现完整器,均为使用后剩

余的刀部残段,而且不见于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同比桂平浔江流域一带同时发掘的或过去调查发现的多处遗址中也未见发现,比较特殊。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这些石铍石器却与在广东粤西、粤北的石峡文化出土的石铍风格类似,因此,初步认定该类石器可能是受到石峡文化西渐的影响而产生,因此该遗址晚段的相对年代当超过5000年,绝对年代约距今6000年。(何安益)

(七) 桂平大塘城遗址

大塘城遗址位于广西桂平市寻旺乡先锋村大塘城西面的浔江冲积平原,黔江和郁江在此处汇入浔江,地势较为平坦开阔。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50米,面积达15000平方米,防洪堤和村间小路自南向北从遗址中部穿过。遗址高出河面约10米左右,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崩塌较为严重。2006年6月至11月,为完成桂平市大塘城遗址发掘研究课题和长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涉及考古项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塘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汉代及明清时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本次发掘依地形将遗址分为三个发掘区,总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

遗址堆积分为四层,各探方深浅厚薄不匀。其中第一、二层为近现代堆积;第三、四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根据地层堆积和遗迹、遗物的特征,可将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

一期前段:本期以遗址第四层及其下遗迹为代表,均为棕红色沙粘土堆积,出土大量石器和陶片。遗迹主要有灰坑、柱洞及房址。灰坑18个,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几种,均开口于四层下,打破生土,填土为棕红色沙粘土,包含有较多陶片、石器及断块。柱洞200个,均开口于四层下,打破生土,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几种,多为直壁平底,内填棕红色沙粘土,其中除三处共43个柱洞排列稍微有规律,可能为房址外,其余大部分柱洞排列较为零乱,无一定规律。

遗物为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560余件,以打制石器为主,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等,及大量的石核、石片、砾石、断块及砾石石片等。砍砸器多达250余件,多用紫褐色细粒石英砂岩打制而成,制作方法以侧面单向连续打制刃部为主,端部打制者不多,器身多呈横长条形,刃缘打制较宽,部分砍砸器在两端或一端形成一个尖。此外还发现有少量采用剥片方式制作的砍砸器,此类石器一般采用圆形或椭圆形砾石由一侧(或端)向另一侧(或端)一次性打下一块较大的石片,然后在石片劈裂面边缘稍经修整制作而成,其打击点和放射线均较为清楚。遗址中发现数千片此类石料石片,当为打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刮削器94件,多数采用石片稍经修整制作而成,也有不少利用小块砾石在端部或侧面打制刃部而成。磨制石器的类型主要有斧、锛、凿及其毛坯和半成

品,出土69件;器型以斧、镑为主,多为梯形或长方形,以通体磨制居多。

陶片数量较多,仅第四层就出土陶片近2万片,绝大部分为夹细沙陶,陶土稍经淘洗,陶色有红陶、红褐陶、黄褐陶、褐陶及黑褐陶,以红陶为主,黄褐陶次之,灰黑陶最少。纹饰有粗绳纹、附加堆纹、篮纹、乳钉纹及锯齿状花边纹。以粗绳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及锯齿状花边纹,最少为乳钉纹,此外还发现两面对穿孔陶片。虽然遗址出土较多陶器口沿,但由于未见有完整器,器型不能完全判断,但从陶片看,可能均为圜底器。陶器有折沿、卷沿、直领、敞口几种,以折沿居多,绝大多数唇较尖,且多饰锯齿状花边。此外不少陶器颈部或腹部饰有附加堆纹,上压锯齿纹。

一期后段:本期以遗址第三层及其下遗迹为代表。黄褐色土堆积,与第四层相比土质土色稍显纯净。本期遗迹以柱洞为主,共发现柱洞44个,填土均为黄褐色沙粘土,底壁均不甚规整,排列无一定规律。灰坑仅发现一个。

遗物为陶片和石器两种。出土石器240件,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器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磨制石器器型主要有斧、镑、凿及毛坯和半成品。与前段相似,后段也发现大量的砾石、断块及砾石片等废料。与前段相比,在石器方面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别石器数量的变化上,其制作技术及石器特征与前段相比并无太大差别。但在陶器方面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灰黑陶的增多。本期共出土陶片1500多片,均为夹细沙陶,陶色以灰黑陶为主,红陶比前段大幅度减少,而褐陶的比例有所上升。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其次为篮纹,附加堆纹少见,不见锯齿状花边纹。

第二期发现墓葬8座。其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斜坡墓道墓葬各4座,除两座较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见棺槨痕迹外,其余墓葬均为一棺一槨,其中4座底部有枕木沟,3座棺底铺炭,两座墓壁、底部有燃烧烘烤痕迹。在形制方面以M3001最为特殊,该墓发掘前地表仍保留有直径24.2、高近1.8米的馒头状封土堆。墓室开口在土堆顶部以下0.7米处,底部打破生土,前端有墓道,墓道两侧各有两个对称方坑,比墓道底部低约0.4米,坑中部有木柱朽痕,当为墓内木架防护构件一类的设施。除墓道一端外,墓室其余三面均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顶部置放一层大块的卵石。这是广西首次新发现的墓葬形式。8座墓葬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基本器物组合为陶瓮、陶罐、陶壶、陶灯及铁剑,铜器出土较少,仅个别墓葬出土有铜釜、铜碗、铜熏炉、铜灯及昭明镜等。模型明器基本不见。

第三期遗存均位于一层或二层下,以遗迹为主,遗物较少发现。本期遗迹以柱洞和灰坑为主,另发现一座墓葬。其中柱洞292个,排列较为凌乱,其内基本不见朽木痕迹。这一带地处两江交汇处,水运极为便利,这些柱洞可能为当时居住的一些遗迹。灰坑共发现23个,灰沟3条,坑4

个,本期遗物发现较少,仅见少量较碎的陶瓷片。

从遗物看,大塘城遗址第一期前段以夹细沙红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有部分附加堆纹、篮纹及乳钉纹;口沿以折沿为主,有部分敞口、直领和卷沿,沿部多饰锯齿状花边,颈部或腹部饰有锯齿状附加堆纹。石器以打制为主,尤以砍砸器居多,磨制石器多通体磨制。综合起来看,大塘城遗址与属于贝丘遗址的横县秋江和象州南沙湾遗址关系较为密切,在器型方面,大塘城遗址出土的直领或敞口器与秋江遗址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而遗址中比较常见的折沿器在南沙湾遗址中也有较多发现;在装饰风格上,均以粗绳纹为主,而颈部或腹部饰锯齿状附加堆纹、唇部饰锯齿状花边的装饰手法分别与秋江和南沙湾遗址发现的同类器相同。三处遗址的石器虽然也存在共同点,如磨制石器均通体磨制,但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大塘城遗址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不多,不见蚌器及骨器。一期后段与前段相比,主要体现在不同石器类别数量及陶系的变化上。从石器看,与前段相比,磨制石器数量有所上升,打制石器比例有所下降;在陶器方面,一期后段主要以灰黑陶为主,少见锯齿状花边装饰口沿,但在时间上基本上还是连续的,大塘城遗址第一期时代应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前段时间比后段早。第二期墓葬从形制及随葬器物特征看,与广西其它地区汉墓并无大的差别,在随葬品组合上以陶瓮、陶罐、陶壶、陶灯及铁剑为主,基本不见合浦及其它地区东汉中期墓中常见的陶井、陶仓、陶灶等模型明器,因此,其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第三期由于出土器物较少,但从遗址中发现的青花瓷碎片及墓葬的特征看,其时代应在明清时期。

大塘城遗址是浔江流域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独具特色的石器和陶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构建广西史前文化序列和研究其经济形态及与贝丘遗址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大量汉墓的发掘在桂平也是首次还是第一次在桂平发掘大量的汉墓,并出土大量器物,为研究广西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新材料。

(林强)

(八) 柳州灵泉寺建筑遗址

为配合柳州市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2006年8月~10月,柳州市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会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灵泉寺东南80米处的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为500平方米。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清理,揭露地下遗址约300平方,共清理出灵泉寺三期建筑遗迹:第一期约为唐代,第二期约为北宋末期至南宋中期,第三期约为明代中期。由于原柳州市飞羚皮件厂址坐落在灵泉寺遗址上,因此遗址的完整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唐代遗迹主要为柱洞,由于受到后期建筑的影响,通过清理发掘,发现唐代柱洞5个,分布在建筑基址的中部。柱洞形制为圆形、直壁、弧状底,口径约34~35厘米,深40厘米。根据柱洞分布状况可推测,唐代灵泉寺应为面阔三

间,进深两间的建筑规模。文化遗物有唐代碑刻一方,残缺,长36厘米、宽24厘米,残存有“……州……置寺……各赐寺……”等字样,虽然该碑刻损坏较为严重,但从残存字迹来看,信息丰富。此外,还发现唐代“开元通宝”钱币2枚,其中一枚,背面有“洛”字铭文,瓦当约10件,均饰莲子纹,制作略显朴拙、厚重,具有明显唐代中晚期的时代特征。

宋代建筑遗迹为本次发掘的主要成果,主要有大面积的铺砖地面、柱洞、火塘、天井和排水沟等。

铺砖地面为南北走向,长20.6米,宽8.2米,面积近170平方米。地面为青砖错缝砌成,青砖规格为 $23.5\times 11.5\times 4$ 厘米。地面东侧用卷草纹花砖砌边,花砖规格为 $30\times 30\times 4$ 厘米,花砖多残缺。

根据此次发掘的青砖地面看,宋代灵泉寺是以天井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建筑,目前发现的宋代灵泉寺建筑遗址是在唐代建筑基础上进行扩建而成。目前发现的宋代柱洞均分布在天井右侧,共12个,均为圆口,直壁、平底,底部有砖块或瓦片,柱洞直径25~35厘米,深27~30厘米。根据柱网可推测天井右侧的建筑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由于天井左侧目前尚未发掘,推测在天井的左侧也应该存在同样的建筑布局。如果推测属实,那么宋代灵泉寺建筑则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规模。

天井位于遗址铺砖地面的北部,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长3.9米,宽2.14米,深0.20米,边缘用青砖围砌而成。

排水沟位于铺砖地面的北部西侧,残长420,宽20米,深30厘米。该水沟两侧为长方形花砖砌成,花砖规格为 $33\times 20\times 4.5$ 厘米。花砖上饰“回”纹,图案较为精美,图案均朝向水沟内侧。水沟内填灰黄色粘土,较疏松,填土底部有似火烧痕迹。

火塘两个,分布在地面南部,1号火塘平面形状近椭圆形、直壁、平底,长径140厘米、短径110、深40厘米。火塘底部及四壁有厚约6厘米的烧土层,塘内填充灰黑色粘土,包含大量瓦砾、砖块等,结构疏松,无其他遗物出土。2号火塘较小,形制为圆口,直壁、平底,直径为35、深20厘米,底部和四壁有厚约3厘米的烧土层,内部填充物质同于1号火塘。

砾石堆积均分布在发掘区西部,共7处,分两列呈南北分布。砾石堆积均呈近方形,略高出地面,边长一般为150~100厘米,为直径0.09~0.12米的石英岩砾石堆积而成。

围墙墙基处于遗址西南角,由铺砖地面向西延伸,残长270、宽70、厚40厘米。墙基由内、外侧结构组成,外侧为一排小青瓦竖向堆积而成。内侧上部为石板铺设,石板呈长方形,长一般为30~60厘米,宽40、厚约5~6厘米,下部为青砖砌成,呈阶梯状,青砖同与地面砖。由于该墙基连

接灵泉寺遗址地面,推测其可能为灵泉寺遗址的围墙。

宋代遗物有建筑构件、瓷器、钱币、铜镜等。建筑构件由瓦当、滴水、板瓦、筒瓦等。其中瓦当和滴水为主,瓦当种类约有十种之多,有莲花纹、莲花“卐”字纹、菊花纹、莲子纹等,其中以莲花“卐”字纹最多,该种瓦当制作规整,纹饰精美,是佛教建筑最明显,用意最深刻的构件之一。滴水多残缺,主要纹饰有草叶纹和缠枝纹两种,制作规整,造型精美。

遗址出土最多的为宋代的青瓷片,釉色有青瓷釉、酱釉、黑釉及窑变釉等,种类有碗、盏、杯、盘、罐、壶等,样式较多,制作精致。从器物特征及饰釉工艺来看,多数器物是产自柳州本地,即柳城窑,少量来自外地,如桂林永福窑和兴安窑等。

钱币共发现10枚,有“圣宋元宝”、“祥符通宝”、“元丰通宝”、“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其余钱币或铭文不全或字迹模糊,难以确认。

铜镜1件,残缺,面径约40、厚约0.5厘米,背面有“天宁”二字,略有腐蚀。

明代遗迹主要为柱洞,共6个,形制为圆口、直壁、平底,直径约为15~20厘米,深约14~18厘米,底部有瓦片等,遗物有钱币“洪武通宝”一枚。

据史料记载,灵泉寺(原大云寺),始建于武则天载初元年,《旧唐书·则天后》说:“载初元年(689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圣言神皇(武则天)受命之事,制颁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唐元和十二年(817年)柳宗元修复大云寺并撰有《柳州复大云寺记》说:“大云寺焚而不复且百年”《柳州府志》。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大云寺易名为灵泉寺。“乃始大作门堂楼阁,凭轩俯视殿宇而壮之,以为广右(今广西)第一。”崇宁中又改为“天宁万寿禅寺。”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又易名为“报恩光孝禅寺”(今为灵泉寺)。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曾重修灵泉寺,张翀有《募修灵泉寺小引》记事,后屡废屡建。

通过此次清理出来的灵泉寺遗址三个时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我们对唐、宋及明三个时期柳州灵泉寺遗址在建筑规模,建筑形制及宗教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这也反映出柳州灵泉寺在历史上的盛衰演变。

灵泉寺遗址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弥补了柳州历史上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的文化空白,还对研究柳州唐宋及明代佛教的发展情况,佛教建筑和佛教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同时,灵泉寺遗址的发现也是近年广西考古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广西唐宋时期佛教建筑研究的空白,也具有广西唐宋佛教建筑遗址研究中的标尺作用。对今后广西唐宋时期佛教建筑遗址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熊昭明)

六. 贵州省

贵州2006年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全年共完成30项,其中考古调查18项,发掘12项,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 乌江流域彭水电站贵州沿河境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群

为配合乌江彭水电站工程建设,2006年5月至2007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电站水淹区贵州沿河县境抢救性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群7处,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窑址、灰坑、墓葬、沟和石器加工场所等大量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大量遗物,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7处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河县北部的洪渡镇和黑獭乡,隔江与重庆市酉阳县为邻。其中洪渡中锥堡、黑獭大河嘴、李家坪、神坝等遗址地层堆积较厚,遗迹和和遗物较丰富,作了较大面积发掘。

中锥堡遗址 遗址位于洪渡镇镇政府南侧乌江与洪渡河交汇处二级阶地上,由于流水侵蚀,形成一个东部略宽的长条形小土丘,面积仅约3000余平方米,发掘区选择在遗址地层堆积较厚的偏东部分,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地层堆积由中部向四周倾斜,最厚处近2米,地层分5层,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二、三层为汉代层,第四层为商周时期地层,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址1座、灰坑5个;商周时期灰坑32个、沟2条;汉墓1座、灰坑4个、沟1条;明墓1座、明清时期灰坑2个。在该遗址的文化堆积中,以商周时期遗迹和出土物最为丰富也最有特征,遗迹以两条呈弧状的长沟为主体,灰坑大多分布在沟两侧,沟内和灰坑填土均为灰黑色,包含大量陶片、动物碎骨和石制品,填土中未见红烧土颗粒和炭屑等。出土遗物不同时期有明显差异,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均为夹粗砂陶,陶色主要是褐陶和黄陶,火候低,许多散成泥状无法提取,纹饰主要是绳纹和交错绳纹,器类可辨者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和钵等。商周时期地层和遗迹中出土物有大量陶器、石器、磨制骨器、动物碎骨和少量青铜器。陶器除夹砂陶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陶陶色主要是灰黑色,少量灰褐色,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划纹、戳刺纹、圆点纹和附加堆纹,器类有折沿罐、卷沿罐、尖底杯、尖底盏、陶网坠、高柄豆等;石器数量特别多,种类丰富,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砾石、石器半成品和磨石等。磨制石器近300件,有锛、斧、刀、凿、石网坠、纺轮和石饰品等;磨制骨器主要有骨针和骨锥;此外地层和遗迹中还出土有大量动物碎骨,动物种类主要有猪、牛、鹿等。汉代地层和遗迹中出土物有陶罐、陶碗、半两钱、残板瓦、瓦当和少量石器。

大河嘴遗址 位于黑獭乡大溪村西约400米乌江南

岸二级台地上,西侧紧邻李家坪遗址,海拔308米。由于遗址位于乌江与其支流(大溪)交汇处,受长期水流冲刷,形成东西向狭长条状。本次发掘依地形情况将发掘区分为区和区。两区相距约150米,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文化层以区较厚,约1米,分为4层,其中3、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遗迹主要开口于3层下。两区共清理房址5座、灰坑5个、窑址2座、墓葬1座、沟1条,此外还有大量的零散柱洞。房址均长方形地面建筑,破坏严重,已无居住面,残留柱洞和火塘,面积10平方米左右。窑址由于位于断壁上,窑门已部分被毁坏,窑室圆形,底部弧状,窑壁胶结面厚10至20厘米,火塘位于窑室前端比窑窑略低。窑内出土大量石块和陶片,可辨器形有杯、罐、豆、碗等。灰坑主要为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墓葬为圆角竖穴土墓,葬式仰身曲肢,无随葬器。该遗址出土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磨制石器有的通体磨光,有的仅磨刃部,器形主要是斧和锛。陶器均碎片,几乎不能复原,以夹砂陶为主,但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陶色以灰褐陶、黄褐陶为最多,纹饰主要是粗细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戳刺纹、圆点纹等,器形可辨者有折沿罐、卷沿罐、有领罐、尖底杯、尖底盏、高杯豆、船形杯等。

李家坪遗址 位于大河嘴遗址区西约200米的二级台地上,海拔292米。行政隶属于沿河县黑獭乡大群村李家坪组。由于流水切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土丘,地势呈坡状。此次发掘共布探方34个,发掘面积850平方米。地层厚约1米至1.5米,共分5层,第4、5层为商周时期地层。清理墓葬6座、灰坑19座、烧土胶结面7个。墓葬开口于4层下,打破5层,其中5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但上肢内曲于腹部,方向朝向乌江水流方向,与后世头朝坡顶的葬法明显不同。一座为婴儿墓葬,系灰坑葬,一幼儿骨架置入一圆形小坑内。6座墓葬皆无随葬品。人骨保存较好。灰坑大小形状各异,出土物较少,部分灰坑底部垫有一层红烧土。红烧土烧结面上部大多被破坏,仅存底器,形状以圆形为多,可能系火塘之类。出土遗物有大量残碎陶片、少量磨制石器、铜器。陶片大多为红褐夹砂陶,少量为泥质灰陶;陶片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其中可辨识器形有尖底器、圈底器、圈足器、花边口沿红褐夹砂陶罐。石器分为燧石石器和砾石石器,燧石石器全部为通体磨光,但器形用途皆不可辨。砾石石器皆为石斧,仅刃部磨光。李家坪遗址未发现房址,而清理出6座墓葬,推测可能为当时的墓葬区,而非居住区。

神渡坝遗址 紧邻李家坪遗址,行政区属虎头村神坝组。该遗址地层堆积由上自下依次为耕土、近现代层、战国文化层、商周文化层。主体堆积为战国至商周时期。此次发掘清理灰坑6座,房址2座,以及大量的柱洞。房址被晚期

地层破坏严重,仅残留四周的柱洞,居住面已不存。房址结构、建造方式等已难以判明。灰坑形状大小各异,皆为战国至商周时期,灰坑内出土陶片皆很少,有的仅一二片,多系夹砂红褐、灰褐陶,纹饰多绳纹或素面。出土遗物主要是残碎的陶片,多为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泥质陶很少,纹饰以绳纹居多。可辨器形者有花边口沿夹砂红褐陶罐、陶豆、网坠等。石器仅2件,皆打制石器,打击点明确,系砾石打片而成,似为刮削器一类。

此外我们还对黑獭堡遗址、木甲岭遗址、小河口遗址等进行了部分发掘,遗址地层堆积深浅不一,但均以商周时期地层和遗迹为主,清理的遗迹和出土物也同上述遗址相同,均系同一时期相同文化的遗存。

沿河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贵州考古的重要发现,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

1. 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黑獭堡、大河嘴、李家坪、木甲岭、神渡坝、小河口等遗址基本上紧密相连,有的甚至只隔一条冲沟。这些遗址海拔高度基本相同,地层堆积较厚,清理的遗迹种类多,出土遗物丰富,有利于全面了解当时人类群体的聚落构成特点。

2. 洪渡中锥堡遗址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及汉代地层的揭露和遗迹现象的清理,有助于建立乌江流域考古遗存的时代发展序列。而该遗址群以商周时期为主的文化堆积,不仅进一步填补贵州商周时期考古材料的不足,还为研究乌江中下游地区古文化与乌江上游乌蒙山区古文化之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3. 从出土遗物看,该遗址群与重庆酉阳清泉邹家坝、涪陵涪溪口、忠县哨棚嘴等遗址的出土物基本相同,它们同长江流域峡江地区古文化遗存应属同一文化系统,是峡江地区古文化往乌江流域发展的结果,说明乌江流域自古就成为贵州高原地区与外地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4. 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小平底罐、尖底杯、尖底盏、高杯豆等遗物系成都十二桥文化典型器物,表明贵州北部地区古文化在发展中受十二桥文化和早期巴蜀文化的较大影响,扩大了十二桥文化和早期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

(二) 沿河洪渡汉墓、宋明墓群

为配合彭水水电站工程建设,贵州考古所联合贵州省博物馆对分布在沿河县洪渡镇周围一带汉墓、宋明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汉墓12座,宋墓2座,明墓33座。

汉墓主要位于洪渡镇南侧洪渡河与乌江交汇处南岸陡坡上的金竹林、樊家土和四方石一带。墓葬分石室墓、砖室墓和土坑墓三种,多为带甬道单室墓,少数墓葬有后室。砖室墓墓砖与洪渡汉窑址群出土汉砖相同,表明系该地窑址烧造。墓葬多被盗,残存随葬品有陶器、铜铁器、俑像冥器和钱币。陶器有陶罐、陶盆、陶杯等,俑像冥器有人物俑、动物俑、镇墓俑等,铜铁器有耳杯、铜镜、泡钉、环首刀等,钱币主要是东汉五铢。

宋明墓主要分布有镇政府以北的李家田至斜岩一带。墓室用巨大条石砌筑,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几种,最多达6室。部分墓内有雕刻图案,内容有连枝花草、团花、人物、野鹿含芝、仿木建筑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罐、买地券、铜镜、手指圈、发簪等。

(三) 南北盘江流域龙滩水电站水淹区遗址群

龙滩水电站坝址位于广西境内,但淹没区延伸至贵州境内的南北盘江,2006年,为配合工程建设,我所对电站淹没区进行了数次复查,发现新石器时代、战国秦汉时期直到宋明时期遗址13处,并对其中的羊里遗址、洒亭遗址和小庙山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

羊里遗址位于罗甸县红水河镇旁,遗址破坏严重,已基本上无文化层和遗迹,但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石制品和少量陶片。石制品有有疤砾石、石核、石片和石器,还出土双肩石铤、石斧等磨制石器。陶片数量少,均夹砂陶,陶色主要是褐色,纹饰主要为绳纹,由于细碎,器形难辨。该遗址虽然地层被扰乱,但从出土的石器和陶片分析,其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洒亭遗址位于罗甸县红水河镇红河村洒亭村民组南侧的一个山包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地层较薄,地层分2层,文化层主要在第二层。清理遗迹有房址1座,灰坑13个。出土有双肩石斧、骨椎、陶网坠和瓷片,其中陶网坠数量较多。从出土瓷片和釉陶观察,遗址年代大致在宋明时期。

小庙山墓群位于罗甸县红水河镇红河村小马场组西桑郎河与红水河交汇处的庙山,墓地规模颇大,墓地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墓葬410座。依民族学调查确认,是一处典型的布依族岑姓家族墓地。由于墓葬时代较晚,主要是清代早期至民国,甚至夹杂有不少现代墓。因而该墓地的田野工作主要围绕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进行民族考古工作,对发掘墓葬人骨进行了性别、年龄和身高等体质人类学研究,结合墓地布局对布依族墓地选址、风水观念、丧葬习俗,祖先崇拜等进行了综合考察。

(四) 荔波水南水族石板墓的清理

水族是贵州的一个世居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南部的三都、荔波两县境内,水南石板墓群位于贵州荔波玉屏镇水南村一组寨子南侧约200米处的半山坡上,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该墓地石板墓上的石板风化严重,图案脱落,且多数杆栏式结构建筑的墓上石室出现了倾斜或坍塌等现象,给保护带来了很大困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11-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水南石板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收获颇丰。

墓群分布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有300余座墓葬,以乱石堆砌而成的封土墓为主,墓葬之间排列较规整,多数乱石墓按南北向呈排分布,而两层杆栏式和一层石室墓则零散分布于其间,交错分布

此次共发掘墓葬9座,其中两层仿杆栏式石室墓1座

(M3)、一层仿杆栏式石室墓1座(M25)、一层非杆栏式石室墓2座(M7、M26)、乱石堆砌的长方形墓5座(M35、M36、M37、M38、M40);出土文物4件,主要为银质的发簪和耳环等。同时,还对周边地区水族墓葬进行了广泛调查,并结合民族志和民俗学资料对水族的丧葬习俗、葬仪特点、墓葬结构、雕刻题材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取得显著成果。被清理的墓葬还全部进行了修得,做到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有机结合。通过发掘,获得下列认识:

1. 墓葬时代多在清嘉庆至咸丰年间。系潘姓家族墓地,墓葬排列较规整,墓与墓之间有依亲疏、辈份不同排列,墓向多在 $90^{\circ}\sim 120^{\circ}$ 之间。

2. 墓葬结构分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地下部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多数墓葬有葬具,皆为木棺。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内又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双手平行放于身体两侧,另一种为双手搭于骨盆之上;有部分墓葬的头骨两侧是有覆盖的板瓦作为枕头,此亦为其中一种葬俗。只有少数墓葬有随葬品,皆为装饰品,种类有银质的发簪和耳环,就其摆放位置来看,此随葬品应是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戴于头上的。有的墓葬在石室后面立有石人、石鱼,借用民族学材料,其寓意有两种:第一种认为系“后继有人”,后立有几石人,即代表其有后代多少

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其后立石人有一种殉葬的意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不能用生者殉葬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代替品,而石人则为其最好的选择;石室后立石人,应只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并不代表财富之分。

3. 地上部分主要是用凿刻平整,石面上充满各类雕刻题材的大石板砌成一层或两层仿杆栏式建筑,浮雕动物图案包含有麒麟、龙、虎、鹤和鱼等,鱼作为墓上最常用的装饰,代表水族对鱼的崇拜,而麒麟、龙、虎和鹤皆为吉祥的动物。部分墓葬墓碑上有文字,其文字形态与现存水书文字基本一致,推测其应为水书,这就为水族文字的研究提供了较早材料。

荔波水南石板墓的发掘,是贵州近年来民族考古较重要的收获。该项目入围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4项候选项目,进京参评引起广泛关注。

总之,2006年贵州在流域考古和民族墓葬考古方面有了一些突破,通过对乌江、南北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使贵州几条主要河流的文化面貌逐渐明晰,为今后建立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时代发展序列提供了基础,也为贵州不同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同周围邻省之间文化的影响与交流提供了可比资料。

(张合荣)

七. 湖南省

(一)辰溪台坎大地史前贝丘遗址

2006年7月~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坎大地遗址西北距辰溪县城约70公里,地属辰溪县仙人湾乡仙人湾村。遗址位于梅溪与沅水交汇处的二、三级台地上,海拔高程131米至146米,现存文化堆积厚约25厘米至56厘米,坡积贝丘厚度15厘米到90厘米不等。这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大沅潭电站工程建设所发掘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勘探面积450平方米。出土了一批本质上能与高庙文化遗址“艺术神器”彼此辉映或相得益彰的细砂白陶、夹砂褐陶残片和可修复器物群,以及石器、骨器等人类文化遗物;动物骸骨则包括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两大门类。

遗址文化堆积包含早晚两个部分。下部堆积的年代上限为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早期,夹砂褐陶占绝对多数,罕见泥质陶;盛行以刻划、剔刺、戳印、篦点等装饰技法有机组合而成的凤鸟、兽面,以及凤、兽合一的元神徽,器腹一般拍印绳纹;陶器组合为宽凹缘或宽弧缘釜、凹缘或弧缘罐、盘口罐、折缘罐、高领罐、薄胎曲壁小罐、曲壁钵等,白陶簋、盘虽为数不多,但浅浮雕式的主题装饰极度华美。下部晚段堆积的器类组合及其造型风格与松溪口下层类型趋近,薄胎曲壁钵、曲壁小罐、高领罐等早段典型器趋于消亡,代之以凹缘弧鼓颈罐、大口筒形罐、折缘侈口弧壁钵等新生或变革类器型,装饰主题趋于抽象与几何化。上

部堆积的文化面貌大变,泥质磨光陶跃居首位,夹砂陶与夹蚌陶的数量大致相近;红陶绝多,灰陶与黑陶的数量又互为伯仲;素面或陶衣所占比率超过绳纹,剔刺篦点、镂刻等装饰技法处于显著的从属地位;缘部向内折转的钵、豆、卷缘、凹缘及瓦棱纹缘面的釜均具代表意义,其总体文化特征很显然越出了本地固有的文化系统而更趋近于洞庭湖区的同期文化体系。但上部堆积内的白陶装饰主题,仍与高庙文化一脉相承。

通过本次的发掘我们还发现,在生活区和生活垃圾堆积区出土的陶器以釜为主,次之为碗,罐极少见,且装饰技法相对简约,艺术主题通常局限于凤头或其变体图形;而在该区域以外以特殊坑状堆积体现的同期遗存内,陶器组合则呈现出罐绝多,曲壁钵、曲壁小罐次之,白陶簋、盘为辅,釜极罕见,而且诸器器肩以上无不施加以剔刺篦点等复合技法精细勾勒的全局型凤鸟、兽面及凤、兽合一的元神徽的相反格局。这种同一遗址内不同区域的同期陶器在类型、装饰等方面的显著差别,应该说为史前陶器大系中生活实用器与祭器神器的界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实例。

(吴顺东)

(二)辰溪溪口史前贝丘遗址

2006年4月~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溪口遗址位于柿溪与沅水交汇处的二、三级阶地上,东西绵长约95米,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海拔高程129米至132米,

A、B二区分别高出沅水水平面9.8米和12.5米。文化堆积厚约35~112厘米,贝丘堆积厚18~98厘米。遗址西北距辰溪县城约23公里,所在地归属柿溪口乡溪口村第三村民小组,现地貌为桔园和菜土。为配合辰溪大沅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相关市县文物部门的大力协作与支持下,自2006年4月28日开始,对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半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面积约350平方米。出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次之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有少量骨器。总体文化面貌与高庙遗址上部堆积的早、中期遗存相近。

遗址内的最早文化遗存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器物为具有澧水文化类群石器制作特征的砍斫器;最晚遗存为东周时期,出土有宽平沿弧鼓肩钵个体:以上两期遗存均零散不成体系。

作为遗址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下部堆积早段以火候较高的粗砂褐陶和薄胎夹沙褐陶为主,可辨器类与器型甚少,仅见小圆唇侈口钵、方唇直口钵、侈口罐等少量标本,夹砂陶多饰乱绳纹,泥质陶器表经打磨并饰红色陶衣,所见石器属于中小型石片刮削器及细小石片石器工业范畴;其时代与洞庭湖区的汤家岗文化晚期大致相当。下部堆积晚段的陶器多见低火候夹砂红褐陶,器类、器型、纹饰多能在中部堆积内找到其大体对应的后续发展标本,石器组合主要包括大小石片、石球和石锤,并见磨制石斧;时代相当于大溪文化早期。

中部堆积属于遗址现存的主体堆积,贝丘形态,遗物丰富。陶器以红陶为主,内红外黑(褐)陶系亦引人注目,并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和少量夹蚌或夹炭黑胎陶,偶见泥质白陶和泥质灰陶,火候普遍较低,胎质疏松,盛行红衣,黑皮陶占一定比例,凸点装饰极度普遍,而剔刻、镂雕、戳印并行,辅以篦点装饰手法,圆形镂孔与方形、新月形戳印及条带或曲折状剔刻的相应组合,构成该期圈足器座上的纹饰主流,某些陶罐肩腹可见绳纹、凸点纹或剔刻式网格纹。代表性器物有凹缘或弧缘有领罐、凹缘或弧缘束颈罐、盘口罐、大口罐、曲颈罐、凹缘釜、圆底钵、折腹圈足盘、瓮口圈足盘、喇叭形矮柄豆、兽蹄状支座等,不见三足器;石器仍为包括大小石片、石球、石锤及磨制石斧的主流组合。时代相当于大溪早、中期。

上部堆积中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堆积不厚,遗物不丰,在为数不多的陶器碎片中可以辨识器形的仅有瓮口或直口钵、罐,以及窄缘侈口釜等,石器的类型及其风格与中部堆积大同小异。

(吴顺东)

(三) 鸡叫城聚落群调查与试掘

2006年12月20日~2007年1月26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鸡叫城聚落群分布在湖南省澧县澧南乡以鸡叫城遗址为中心的复兴、文家、河北、新坪等行政村。鸡叫

城遗址在1978年发现,当时仅列为一处文物点。1980年代文物普查列为新石器时代城址。90年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距鸡叫城遗址西南16公里处的城头山遗址进行多次发掘,通过城头山的工作,意识到鸡叫城的始筑年代及其筑造方法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998年冬解剖了鸡叫城西城墙,并对城墙、护城河及城内进行了调查勘探和测绘。结果表明,鸡叫城作为一个聚落,在屈家岭文化中期以前就已形成,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第一次筑城。第二次筑城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圈以内面积15万平方米。另外,1998年的发掘表明,一期城墙的内坡之下,还有一条早期聚落壕沟。

本次工作首先在鸡叫城靠西城墙的城内布55米探方4个(其中一个探方与98年发掘的T8部分重合),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城内的文化堆积,并对98年所发现的早期壕沟继续清理,了解与早期壕沟同时期或许更早时期的人类活动情况。与此同时,对鸡叫城周边地区进行初步调查,了解鸡叫城聚落群的分布情况。并选择鸡叫城周围若干遗址进行了试掘,了解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还开展了对鸡叫城聚落群的区域环境调查,以了解鸡叫城聚落之前的原生地貌和聚落兴起之后的环境演变情况,探讨其与鸡叫城聚落群的关系。在调查和试掘过程中全面采样、多范围地采集浮选和测试样本,尽可能提取更多的信息。

本次工作的主要收获是:1. 初步弄清鸡叫城靠西位置的地层堆积及其成因,这里的情况表明鸡叫城聚落最早出现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2. 局部清理了建城前一组大型木构遗迹。3. 发现了鸡叫城护城河以外的两重外围壕沟(连同早期壕沟、护城河,共有四壕二墙),一重外壕与护城河之间平均约200米,二重外壕距一重外壕平均约150米。4. 发现了与外壕相连的二条可能由人工开挖的沟渠。5. 在一重外壕和护城河之间发现5处遗址。6. 在一重外壕和二重外壕之间发现7处遗址。7. 在二重外壕外附近发现8处遗址。8. 初步判断早期壕沟、城墙、护城河、外壕、沟渠的建造大致先后发生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20余处遗址的时间序列从属于这样的年代范围。9. 在鸡叫城的西北和东北方向,发现有众多水道平行排列,并与引水渠、外壕、护城河相连,疑似古代水利设施,但具体年代不详。10. 对鸡叫城周边区域作景观考古学调查,取得初步成果,提取了多项环境信息样本。

本次工作虽然时间短,但发现了重要的考古信息,特别是鸡叫城外围的二重壕、沟渠和众多聚落,非常有规律地分布在鸡叫城周围,形成极为复杂城壕系统,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意义。(郭伟民)

(四) 石门县马鞍商代遗址

2006年4~7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常德市文物处石门县博物馆为配合石门皂市水库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常德市文物处及石门县博物馆等单位对石门马鞍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2100平方

米。

遗址位于澧水支流渚水右岸(南岸)一级台地,西距沿市乡政府约1千米。198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2米,堆积可分上、下两大层,分属于两个不同时期。上层为宋代文化层,发现了大量大型柱础、排水沟及房屋残迹,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下层为商代文化层,可区分数小层,系遗址主要遗存。下层绝大部分被宋代文化层叠压,所以保存较好。

商代遗存主要发现有:一是在湖南地区首次发现了商时期的聚落壕沟,为研究江南地区商时期聚落特征及其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二是发现了聚落内同时期的墓地,墓地被聚落壕沟一分为二,墓葬形制独特,绝大多数为长条形,形制接近“船形”,而且几乎每墓均有砾石与陶器伴出,含意深刻;三是出土了一大批不同于澧水流域以往发掘的同类遗址(如皂市遗址上层遗存)商代遗物,表明该遗址文化因素相当复杂。发掘证明,遗址内中原文化因素并不占多,而是以本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并有不少西南区域文化因素的渗入,从而为研究商文化的南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尹检顺 何赞)

(五)汨罗乌龟山楚墓

2006年6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汨罗市文物管理所。乌龟山楚墓位于汨罗市屈子祠镇双水村,1979年发现,1998年为配合移民建镇,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和汨罗市文物管理所曾在这里发掘过16座东周、南朝墓。2006年6月在配合武广客运专线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时对其中已被破坏的两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这两座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1为窄坑墓,残长2.45、宽1.46、残深3.2米,随葬器物为鼎、豆、壶、盒、匜、碟各一件。M2为宽坑墓,长3.3、宽2.2、残深5.2米。从清理时的痕迹来看,这是一座一棺一槨的墓,随葬器物基本上放在边箱中,为鼎、豆、壶、盒四套。另外在棺内还发现了一件琉璃璧。从器物形制及组合来看,这两座墓皆为战国晚期晚段的楚墓。

(高成林)

(六)临澧申鸣城调查与试掘

2006年11月~2007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澧县博物馆。申鸣城遗址位于临澧县新安镇与合口镇境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认为是一座战国楚城,可能与九里楚墓有关。2005年9—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澧县博物馆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在原来发现的城址外面可能还存在一个大城,故于本年度对之进行了勘探和试掘。

调查发现,上世纪发现的城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为南北向。目前只断断续续存在东、南两面城墙,其中东城墙残存于地面的部分大约长700米,南城墙残存于地面的部分大约长500米,城墙残宽12米左右,残高不超过2米。通过对东城墙的解剖发现,城墙修筑时不挖基槽,而是在当时的地面上先铺一层黄土将地面垫平,然后在其上用

版筑的方法筑出近6米宽的墙体,墙体的夯层十分明显,每层厚10厘米左右。墙体两侧用土堆筑出护坡,墙体与护坡之间的界线十分明显。护坡土经过简单夯筑,但无明显的夯层,其中外侧护坡较宽,约4米;内侧护坡较窄,约2米。城墙外侧没有发现护城河的痕迹。小城城墙的这种建筑方法,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湖南沅陵窑头古城以及石门古城堤等楚城的建筑方法基本一样,是典型的战国楚城墙的建筑方法。

据《直隶澧州志》和当地的家谱记载,在城址东北面的月堤寺一带有一条东西向的土堤,堤北面断断续续有一排池塘,1975年填塘为田时土堤被毁。通过详细的钻探发现,土堤除在月堤寺西侧保留了一小段外,已基本被完全毁掉。但在其北面发现一条十多米宽的与之平行的古河道;且在一个探孔距地表2.2米深处钻探出一块黑灰泥质红褐色的陶孟口沿。另外在蚂蝗堰一带,发现土堤有一个缺口与古河道相通。在钻探的基础上,我们对残存土堤进行了解剖,发现土堤系直接在当时的地表上人工堆土而成,经过简单夯筑,但无明显的夯层。在土堤的内侧堤角发现有叠压于其上的战国文化层。

通过本年度的钻探和试掘,基本上可以肯定在小城的北面有一道战国时期的东西向土堤,土堤外有一条古河道,但是否存在一个大城,尚有待今后的继续工作。

(高成林)

(七)里耶古城一号井并台遗迹

里耶古城一号井发现于2002年6月,以井内发现三万余枚秦代简牍而闻名于世。一号井除了井圈、井坑以外,在其上还有相应的井台遗迹,但当时只是对其局部进行过发掘,2006年4~5月间,为配合一号井的保护工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号井的全部井台遗迹进行了清理,从而对其全貌有了清楚的认识。

L12分布在一号井的东南部,并向北部延伸,是从东南部下井台取水的井道;K9位于一号井的西部,并向西部延伸,是从西面下井台取水的井道,它们都低于四周的地面约0.50米左右,明显是由人工挖成的。井道堆积物的剖面皆呈喇叭状,上部堆积是厚约0.35米的棕褐色层,其下为灰褐色土夹砾石层,土质疏松。与一号井上部覆盖的砾石堆积属于同一层位。根据地层关系,L12、K9叠压在层下,直接开凿于生土层上,由此也进一步落实了一号井的开口层位。

此外,在井台表面发现了43个柱洞(D1~D43),它们皆开口于层下,推测当为井亭一类的建筑遗迹。由于井台在高度上低于地面,这类建筑是必需的,而在一号井南、北部相应层位发现的二条水沟,应与排放井亭的散水有关。里耶城址一号井井圈形态独特,又有完整的井台、井道、井亭等遗迹,这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善、制作最精致的战国古井。

(柴焕波)

(八)炎陵县胡家坳东周时期遗址

2006年8~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遗址位于炎

陵县鹿原镇荆山村罗家组的胡家坳山包,为配合衡阳至炎陵高速公路建设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发掘区南部的文化堆积相对典型,可分四层: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包含少量近现代陶瓦片及明清瓷片;第3层灰褐色黏土,出有铁器残块、磨制石镞,可见夹砂黄、白、红陶,印纹硬陶,纹饰可见绳纹、方格纹等;第4层灰黑色黏土,出土物较少,可辨器形者少。文化堆积层下为深黄色网纹土。文化层堆积较薄,清理的遗迹现象有30个灰坑、3条灰沟、5座近代竖穴土坑墓;各探方都可见有较多的用火遗迹和柱洞,这些遗迹多出现于第3层面。从出土物特征可初步推定第3、4层堆积应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该遗址为研究湘东南地区东周时期居民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张兴国)

(九)长沙望城风篷岭西汉长沙国王后墓

2006年3月至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望城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市区西北望城县星城镇风篷岭发掘了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出土重要文物200余件(套)。

该墓东临湘江约2公里,发现时封土及墓坑上部已毁掉,现存海拔高度为43米,墓坑平面呈“中”字形,墓葬总长30.3米,宽14.6米,残深3.26米。墓道位于墓室北面,为斜坡台阶式,残长11米。

墓葬在发掘前发现两处盗洞,一为方形,一为椭圆形,长均在1~2米之间,从盗洞内遗留的青瓷碗等物推测所盗时代约在隋唐之际。

该墓葬采用“黄肠题凑”葬制,墓壁四周与外椁之间垒砌“题凑”木,每根“题凑”木长为80~100厘米,边长为20~40厘米,共叠置三层,紧贴“题凑”木内侧为外椁竖板;在墓室中央,有一周竖置木板,即内椁板,内外椁间又将墓室分为主室、东侧室、西侧室三部分,每个部分又由立板隔成前中后三个室,共计9间椁室。棺室位于主室南部,摆放二层漆绘套棺。每块顶板、底板东端均刻有数字序号。底板下为南北向七条枕木沟,沟内放置枕木。

该墓葬出土器物种类繁多,有金器、银器、青铜器、漆器、玉器、铁器、陶器、丝织品、水晶及石蜡制品等。金器有圆形金饼,共19件,光灿夺目,每件重250.5克,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鎏金器;银质装饰品1件;青铜器28件,有鼎、钟、壶、盘及灯等,在一件铜灯圈足边缘部发现有一圈铭文,内容为“铜簋一高二尺重廿二斤七两长沙元年造”,此外,还发现有163枚“五铢”铜钱;玉器4件(套),有金缕玉衣、玉璧及玉珪等。金缕玉衣已遭盗扰,清理出三十多片玉衣片及大量残碎金丝,玉璧两件,其中一件直径达28.3厘米;漆器60余件,有案、盘、耳杯、奩、盒及乐器等,多为黑地红花,装饰多为卷云纹或变形鸟兽纹及花草纹等,出土时花纹线条流畅、色泽鲜艳。另在三件漆盘上发现有红漆书写的“张姬(姬)榜槩”,在五件漆耳杯上发现有红漆

书写的“长沙王后家杯”等文字,字迹清楚,为汉隶,此外漆器上文字还有“厨”、“宜酒食”等;陶器9件,个别陶器上刻画有“中”字或其它符号;水晶珠5粒,呈玻璃透明状。此外,还有铁器、丝织、石蜡等。

风篷岭一号墓葬的发掘为确定西汉长沙王室墓地的分布提供了新的线索。该墓从出土文物、墓葬形制推测,该墓下葬年代的上限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8年),下限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墓主为西汉中晚期某位长沙王的王后。

该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在湖南地区少见,玉璧及青铜钟等均属湖南发现的同类器物中最大的器形。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为湖南的汉代考古增添了新的亮点。墓葬中室出土的铜灯圈足上有“长沙元年”铭文,表明了长沙国有自行纪年,这为研究当时的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纪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何旭红、黄朴华)

(一〇)衡东县衡炎高速路段东汉墓葬

2006年8~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衡阳至炎陵高速公路建设,先后在衡东县境内大浦镇、吴集镇等市镇进行考古勘察与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东汉墓葬19座。

此19座墓多分布于小山丘上,除M4、M7和M11形制不明外,其余16座均为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墓室长3.3~4.9米,宽1.0~2.2米,券顶均已坍塌,墓室用青灰色长方形砖铺砌而成,铺砌方法不一,部分墓砖侧面模印稻穗纹、菱形纹、方格纹、涡纹、鱼纹、车轮纹、几何纹等不同纹饰。出土器物共计60件,由于保存状况不佳,随葬器物多残碎,不少墓葬不见遗物出土,其中M1状况稍好。随葬器物多为陶器、硬陶器,如常见的陶罐、陶坛、陶釜、陶甑、陶铎壶、陶钵、陶碗、陶灶、陶窗、陶井、陶猪圈、陶鸡埕、纺轮等,少量青瓷青瓷双系罐、四系罐、青瓷钵,以及铁釜、铜铎壶等。这批墓葬为研究东汉时期湘东南地区中下阶层丧葬习俗及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信息。

(张兴国)

(一一)南上門山东汉南朝墓

2006年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衡南县文物局。上門山墓地位于衡南县向阳镇水口村的湘江边,2006年4月为配合武广客运专线建设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墓地范围较大,本次发掘仅清理了铁路施工范围内的四座墓。

四座墓皆为不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墓,发掘时券顶皆已被毁。其中M2、M3、M4三墓位于一处,M1单独位于一处。M1长3.5、宽1.9、残高1.7米,方向251°。该墓左右两侧的墓壁在距墓底0.7米处各向外错开约0.05米,形成一条极窄的台面。该墓随葬器物皆为印纹硬陶器,器类有罐、盂、铎壶等6件。M2、M3、M4方向一致,皆为282°。M2长3.6、宽1、残高1.1米,M3长4.1、宽1.7、残高0.5米,M4长3.2、宽1.2、残高0.8米,其中M3破坏比较严重,墓壁已基本被毁,铺底砖也所剩无几。三墓结构基本相同,皆在墓室后壁砌有两条加强墓壁的砖柱。M2、M4铺底砖皆为

两层,第一层为人字形,第二层为平行错缝。在第一层铺底砖下,从墓室中部开始砌排水沟。排水沟夹在第二层铺底砖中间,开口与第二层铺底砖平齐。M2、M4随葬器物基本一样,M2为一件青瓷盘口壶和三个瓷碗,M4为一件青瓷盘口壶和二件瓷碗。M3由于破坏比较严重,没有发现随葬品。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M1时代为东汉晚期,M2、M4时代为南朝晚期。M3虽然没有发现随葬器物,但从墓葬形制、位置等来看,它应与M2、M4同时。(高成林)

(一) 耒阳廖家山汉墓

2006年8-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耒阳市文物局。廖家山汉墓位于耒阳市余庆乡栗树村耒水的一条小支流旁,2006年4月为配合武广客运专线建设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墓地范围较大,包括廖家山等近十座小山头。本次发掘仅清理了铁路施工范围内的两座墓。

M1是一座带有石质墓门的大型多室砖墓,该墓座东朝西,长(不包括斜坡墓道)、宽均接近13米,由斜坡墓道、石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结构比较复杂,由三个并列的前室后室结构的穹窿顶砖室南北相连组成,其中中间的一列墓室与甬道相通,且整体向前(西)凸出1.6米,各个前室和前、后室之间有过道相通。北侧一个前室的东北角、南侧一个前室的东南角以及中间一个前室的东南、东北角皆设有一个长1.2、宽0.8、高0.15米的祭台。该墓比较注意排水的处理,整个墓葬由后室至前室、又至甬道逐层降低0.4米;从前室与甬道的结合处开始修砌截面为方形的排水沟,排水沟穿过石门、斜坡墓道一直伸向墓外。该墓穹窿顶的结构比较特殊,既不同于一般汉墓的四面起券的穹窿顶,也不同于六朝时期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而是首先从四角开始,用特制的平面呈梯形的砖内收起券,这样整个穹窿顶从外面看上去浑然一体,无丝毫接缝的痕迹。该墓曾多次被盗,随葬器物仅有一件青瓷碗和三枚已朽的钱币,另外在后室及祭台周围,发现大量漆器的痕迹。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的瓷碗来看,此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M2座东朝西,是一座带有甬道和耳室的前室后室结构墓,前室为方形,后室和耳室皆为长方形,耳室位于前室南侧。该墓长7.8、宽4.7米。此墓破坏比较严重,仅能看出后室、耳室皆为券顶。在前室的东南角和甬道南侧,各砌有一个高0.2米的长方形祭台。该墓也比较注意排水的处理,后室比前室高0.3米,但前室、耳室和甬道在一个平面上;在甬道下面,也修有截面为方形的排水沟。该墓随葬器物主要皆发现于耳室和前室,器类有仓、灶、井、罐、杯等;另外,在前室还发现有大量漆器的痕迹。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看,此墓时代也为东汉晚期。(高成林)

(一三) 冷水滩市高溪市镇老祖坡汉代墓葬

2006年5-6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老祖坡墓地位于冷水滩市高溪市镇小河口村的一处山岗上。为配合洛湛铁路南线基建工程,共发掘墓葬5座。分别为:

西汉墓1座,编号M5。墓室为土坑竖穴,无墓道,头朝

南。出土文物二十多件,见有八连弧纹铜镜、铜五铢钱、铁釜、琉璃鼻塞、陶鼎、三足釜壶、硬陶罐、硬陶钵等器类。硬陶罐上饰均有方格纹。

东汉墓4座,均为砖室墓,编号分别为M1、M2、M3、M4,头均朝北,墓道位于南端。其中M1-M3平面为长方形,M4为攒尖顶,并设有排水道。墓葬墙体均为单砖,使用黄泥作砌浆。墓底铺地有错缝横砌和斜砌两种作法。在M1的南端地面发现有砖砌的方形祭台,长0.6、宽0.5米左右。

四座墓中有三座严重被盗,出土器物共110多件,主要为硬陶器物。器类见有罐、钵、盆。器表多饰方格纹,明显具有越文化的遗风。另出有铁带钩和铁釜架等器具。

(贺刚)

(一四) 邵阳至永州高速公路墓葬发掘

2006年5-7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邵阳市文物处、永州市博物馆。为配合邵永高速公路建设,省考古所组织地县考古人员在邵阳县白仓镇附近发掘了一批东汉墓葬。墓葬位于白仓互通(K35-K35+400)范围内,海拔高程367.2-380.4米,为丘陵地貌。共发掘墓葬30座,分为砖室、土坑两种,依地势自下而上逐层排列,其砖室、土坑并处,分布较有规律。砖室墓葬顶部起券,平面呈凸字形,其结构上由封门砖、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多被盗。依形制分为三种:类:较常见,甬道较短,墓室为窄长方形,随葬品出于墓室内,单棺。类:甬道长且宽,墓室为近正方形,墓砖为自四角向中部起券顶,或由两侧向中间起券顶。随葬品多放于甬道前部。此类墓葬最多。类:有较厚封门砖,甬道(或为前室)长且宽,仅较墓室向内缩一砖,墓室为长方形。该种墓葬被盗严重,随葬品位置不明。土坑墓分为有、无墓道两种。土坑墓被盗极少,随葬品保存较好。本次发掘品中可修复器物共百余件,多为生活用具,器类中陶器居多,以麻布纹硬陶罐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灰陶鼎、盒、壶、钵、釜、仓、灶等。铜器有镜、手镯、铜钱,铁器有匕首、削等。

此次发掘反映出两个特点:砖室墓葬的形制结构略有不同,其墓砖纹饰多样,说明该地区砖室墓是不断发展的,其构造不断完善。随葬品以陶罐为主,器类单一,没有固定的器物组合,也说明了东汉时期该地较为封闭,与外面缺少文化上的交流,故长期没有太大的变化。

(袁伟)

(一五) 芝山区富家桥镇瓦岭汉代、南朝墓

墓地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芝山区富家桥镇青山桥村的一处山岭上,当地称其为瓦岭。2006年4-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洛湛铁路南线基建工程,共发掘墓葬7座。分别为:

西汉墓3座,均为土坑墓,编号M1、M2、M4。三墓分别残存有直径10-15米不等的封土堆,残高1.2-1.8米。皆为长方形竖穴,长3-3.5米左右,宽1.5米左右。三墓穴均很浅,墓口距墓底仅0.6米左右。头向东,其中M1西端有斜

坡墓道。

三座西汉墓中共出土文物 330 多件,其中 M1 出土“昭明”铜镜、铁环首刀、陶罐和陶纺轮;M2 出土琉璃串珠(312 颗)、铜铃、陶罐和陶釜;M3 出土铜弩机、铁剑和陶罐。陶器多为硬陶,饰拍印方格纹。据墓坑的构造以及陶罐、釜、纺轮和铁环首刀等器物的形态和装饰判断,这三座墓的墓主均为越人的后裔。

南朝墓 4 座,均为拱顶砖室墓,编号 M3、M5、M6、M7。其中 M3、M6 的平面结构为长方形,M5 为甲字形,M7 为亚字形。方向:均头西脚东。墓葬墙体均为单砖,墓底铺地砖有错缝横砌和斜砌两种作法。

四座墓均严重被盗,残存器物一共不到 20 件。各墓中均出有小瓷盏。其中 M3 出有四神兽纹铜镜;M5 出有对鸟花草纹铜镜、铁剪、铅钩针和瓷碗;M6 亦出有小瓷碗。

此外,在墓地附近(M7 南侧)清理了二座圆形木炭窑,直径一米左右,均有烟道,时代不明。(贺刚)

(一六)石门县阳泉汉、晋墓群

2006 年 8~12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常德市文物处、石门县博物馆。为配合石门县水库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常德市文物处及石门县博物馆等单位对石门阳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 135 座,出土文物千余件。

阳泉墓群位于澧水支流渫水左岸(北岸)的低矮丘陵上,海拔 110 米左右,由东向西依次包括屏湾堡、张家堡、崔家堡和胡家堡四处墓地,分别揭露墓葬 11、81、38 和 5 座。墓地相互毗邻,东西相距约 1 千米。

从现已发掘的 135 座墓葬分析其特点:1. 墓葬延续时间较长,时代跨越了西汉、新莽、东汉、晋等时期。其中,西汉墓葬揭露最多,全为土坑竖穴墓,而且排列有一定规律;西汉以后墓以砖室墓为主,形制各异。2. 土坑墓绝大多数为东西向,与南北向山势相左,可分小型无墓道、中型单墓道和大型双墓道三型。无墓道者有横向枕木沟和竖向枕木沟两亚型,单墓道者有凸字形和刀把形两亚型,双墓道者一般在墓道中间留有纵向生土薄隔墙,有的则墓道填土可截然分开或墓道底部高低不一。该类墓墓室接近方型,有两条匀称分布的纵向枕木沟,两排随葬器物依沟而布,每排均有一套或一套以上随葬器物,可能系一椁两棺的夫妻同穴合葬墓。3. 砖室墓可分单室无墓道、单室有墓道和多室墓三型。除两组多室墓为南北向外,余均为东西向。单室墓以带墓道的“刀把形”最具特色,双室墓一般为夫妻合葬墓,多室墓可能系家庭合葬墓。4. 从墓葬随葬品分析,该批墓葬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特征鲜明,内涵丰富。土坑墓常见鼎、壶(方壶)、盒、灶等软陶类,砖室墓则以釉陶、硬陶及陶俑为多。

总之,这批墓葬具有跨时较长、分布密集、方向独特、形制多样、内涵丰富等特点,这在澧水流域以往的汉、晋考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从而为研究澧水流域汉、晋时期的

墓葬分期及葬俗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尹检顺 张兴国)

(一七)茶陵县衡炎高速路段东汉及明代墓葬

2006 年 7-8 月~2007 年 1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衡阳至炎陵高速公路建设,先后在茶陵县境内大浦镇下东乡、马江镇、浣溪乡等地进行考古勘察与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东汉墓葬 5 座、明代墓葬 1 座。

5 座东汉墓葬按有无甬道可分两类:一类为“凸”字形甬道圈顶单室砖墓,共 4 座,圈顶均已坍塌,长 6 米、宽 2.2 米左右,其中两座在墓室及甬道的底砖下用两排墓砖铺设排水沟;另一类是没甬道的圈顶单室砖墓,仅 1 座,规格较其它 4 座小,长 3.6 米、宽 1.4 米、高 1.5 米,墓室及圈顶保存状况相对好,部分圈顶连通。出土器物共计 74 件,陶器有陶罐、陶钵、陶壶、陶纺轮、陶灯等,铁锤、铁釜、铁剑、铜钱、玉含、银耳环、银戒指等。保存较为完好的墓室及随葬器物为研究该地区东汉时期丧葬及社会习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2007 年 1 月在茶陵县浣溪乡抢救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清理前地表尚存同治七年重立的汉白玉墓碑。该墓为竖穴长方形土坑墓葬,填土为黄褐色粘土夹红岩石子。出土器物仅 6 件,分别为铜镜 1 面、银簪 1 件、青瓷碗 2 件以及陶罐 2 件。墓碑上记录了墓主的生平,刻有“大明封武略将军晋封武德将军段氏恩丰公之墓”。但墓主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显赫身份似乎和这一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不吻合。明嘉靖、清同治年间的《茶陵州志》并未见段姓将军的记载。(张兴国)

(一八)武广铁路岳阳段宋至明清墓葬

2006 年 6-7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湘市博物馆、岳阳县文物管理所、汨罗市文物管理所。为配合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在岳阳段的临湘、岳阳、汨罗等地清理了 30 多座宋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这批墓葬分布比较分散,一般位于小山的山坡上,方向随山体的变化而各不相同。其形制、规模基本一致,除汨罗划船村 M4、岳阳市康王砖厂 M1 等为长方形并列双室的夫妻合葬墓外,其余墓葬皆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宋墓一般皆有一至二个头龕或头台,有些墓葬的头龕还砌成仿木结构的斗拱形式。明清墓葬多没有铺底砖,有些墓葬甚至墓壁也不用砖,而是直接挖一个土坑,然后在土坑上修筑券顶。在汨罗划船村 M2 的发掘中还发现了墓祭的遗迹。墓祭遗迹包括照壁和祭台两部分。照壁直接建在墓室的入口上面,祭台正对着照壁,形制为砖砌的长方形小平台,其上放置碗、碟等。这批墓葬随葬品一般较少,有些墓葬甚至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随葬器物的种类有瓷罐、碗、铜镜、剪刀等,瓷罐、碗一般放在头龕中或头部,铜镜、剪刀等一般置于腰部。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岳阳地区宋至明清时期的历史、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高成林)

八. 湖北省

2006年,湖北省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十余项,文物保护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尽可能减少工程建设对文物的影响程度,在坚持围绕课题、突出重点的原则前提下,重点发掘了其中的50余处遗址和墓地,并系统收集反映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的信息,揭示出一批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重要遗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湖北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兹摘要介绍如次。

一

鄂西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非常丰富,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涉及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就达40余处。这里既有“郧县人”、“郧西人”等珍贵的人类化石材料,又有相关的石器工具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发展及其文化的理想区域之一。为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重点发掘郧县曲远河口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丹江口市双树遗址,所发掘的石制品地层明确,类型丰富,有石核、刮削器、砍砸器、手斧和手镐等,是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演变及人类生存行为模式的重要材料。

作为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通道,鄂西北地区对于理解中国早期文明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选择郧县青龙泉遗址、大寺遗址、郭家院遗址、郭家道子遗址、黑家院遗址、白鹤观遗址、丹江口市彭家院遗址等进行发掘。

青龙泉遗址位于郧县杨溪铺镇,面积约6.5万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厚,保存状况比较好。在25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共揭露新石器时代房址77座、祭祀坑2个、灰坑539个、灰沟20条、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19座、瓮棺50座。其中:长方形房址多属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圆形房址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多数房址室内存在灶和灶台;灰坑有圆形、袋状和锅底形三种形状,其袋状坑明显区别于江汉平原同时期的灰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仰身直肢葬,有的在盆骨下设置腰坑。出土的陶器、石器 etc 遗物量多类齐,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在鄂西北地区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轨迹。

大寺遗址位于郧县城关镇。在14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揭露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时期的早晚文化堆积。共清理房址13座、窖穴3个、灶1个、灰坑229个、灰沟5条、土坑墓29座、瓮棺11座。这里的遗迹分布密集,打破关系较为复杂,但大多数遗迹较为规整。其中: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最丰富,其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还有少量彩陶,器形多鼎、罐、尖底瓶、杯、彩绘碗钵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物比较丰富,其陶器以泥质黑陶为主,器形有罐、鼎、碗、斜壁杯、圈足杯等;石家河文化时

期的遗物相对较少,其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陶鼎、高领罐、杯、器盖等。

郭家院遗址位于郧县安阳镇。在6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壕沟1条、灰坑3个、房基3座、瓮棺2座。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比较丰富。其中,陶器多夹砂灰陶,饰弦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主要有红顶碗、折沿罐、高领罐、敛口罐、鼎、盆、杯和甑,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彭家院遗址位于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在19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清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灰坑21个、陶窑1座。陶器多见鼎、罐、盆、豆、圈足盘、钵、碗、杯、纺轮等,石器有斧、锛、铲、凿、研磨石等。其中,舌形鼎足、宽扁形鼎足、高柄豆等具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特征,为石家河文化的系统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同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安陆市博物馆联合对安陆市烟店镇王古溜遗址进行调查。该遗址地处涑水支流弯挡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面积约88万平方米。在遗址南部、弯挡河的北岸新发现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址。城址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城垣高出周围低地4~5米。其中:东垣、西垣部分利用了自然高岗;北垣系人工修筑,现存顶宽约1~1.5米、底宽约5~6米、高约2.5~3米;南部有现代村落,地表未发现城垣遗迹。东垣中间的缺口可能与城门有关。城垣北部现存的两个鱼塘以及城垣东部的低地可能为壕沟遗迹。城内东北、西北部有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台地,有大量红烧土堆积,似为居址所在。现场采集的陶片多灰陶和黑陶,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指窝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以鼎、罐、瓮、杯、盆、碗等为主,另有少量的石斧、石铲、石刀和彩陶纺轮等生产工具,具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特征,显示该古城的年代可能与此相当。王古溜古城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的分布范围,对研究该地区古城的形成、发展及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二

湖北夏商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发展序列尚有若干缺环,部分区域的文化面貌并不清楚,早期楚文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新发现的一批墓地、遗址或城址,为进一步完善该时期文化发展序列、深化楚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辽瓦店子遗址位于郧县柳陂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保存较好的重要遗址之一。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武汉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揭示出大量夏商周时期的房址、灰坑、墓葬、窑址、水井等遗迹,出土丰富的遗物,填补了汉水上游区域文化发展的空白。相当于夏时期的遗物以釜、鼎、罐、盘、盃、刻槽

盆等陶器为主,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也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商时期的遗存以鬲、假腹豆、大口尊等为主要器物组合,特征与典型商文化如出一辙,年代在二里冈上层-殷墟一期之间,反映了商文化对该地区的控制历程。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新出现一种以扁足鬲为特征的遗存,呈现出明显的自身特点。西周中期以后则与楚文化的特点相同。该遗址清晰的商周时期的文化演变关系为探讨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金罗家遗址位于麻城宋埠镇金罗家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武(汉)合(肥)铁路建设工程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揭示出一批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城。古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底宽约10米,残高3~4米。城外有城壕。这是湖北首次经科学发掘确认的西周古城。

在京广铁路改线工程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位于广水市杨寨镇的西边畈遗址和巷子口遗址。其中:对西边畈遗址发掘180平方米,共清理周代的灰坑11个、墓葬6座,陶器以鬲、罐、簋、豆、缸为主要组合;对巷子口遗址发掘300多平米,共揭露东周时期的灰坑12个、瓮棺1座,其灰坑分布密集,打破关系较复杂,平面形状主要以椭圆形为主,多为人工挖成,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鬲与豆占相当大的比例。是研究鄂东北地区周代文化面貌、特征及楚文化发展轨迹的新资料。

在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位于恩施市三岔乡的浑水河遗址。该遗址的地层堆积较简单,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陶器多夹砂褐陶,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仅见绳纹,器类以圈底器居多,有少量圈足器和平底器,可辨器形有罐、釜、碗、豆、盘、纺轮、网坠,另有石斧、铜镞、铜剑等。年代相当于东周时期,丰富了清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内涵。

薄家湾遗址位于丹江口市浪河镇,面积约4800平方米。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揭露出一批东周时期的灰坑、房子、窑址、水井等遗迹。其文化堆积比较简单,文化层厚10~60厘米。出土遗物多陶片,以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绳纹占绝对优势,器形有鬲、盂、罐、豆、盆、盒、鼎等。另有铁锤、铁斧、铜簇等。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属于楚文化的范畴。

孙郭湖遗址位于咸宁城区西北。在京广铁路改线工程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新发现城垣、壕沟和城楼等遗迹。城垣呈长方形,南北长173米,东西宽104米。南垣和西垣南段保存较好。对南垣的解剖显示,城垣由主垣和内外护坡构成。主垣宽4米,用黄色粘土板筑而成;内护坡宽10米,夯土杂乱,夯层斜向;外护坡宽6米,局部有平夯层。城楼位于南城垣西南部主垣和内护坡上,呈长方形,南北长4.36、东西宽2.8米,墙

厚0.7米,其东南部有筒、板瓦等废弃堆积。壕沟开口宽约20、底宽2.7、深3.7米。出土遗物主要有罐、盆、鬲等陶器,年代为战国时期。城楼遗迹在我省同时期城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乔家院墓地位于郧县五峰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首批控制性发掘项目之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发掘了其中的4座中型墓葬。4座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墓葬长度在5.35~6.5、宽在4.7~5.35、深在3~4.1米之间。尽管棺槨已朽,但其棺槨朽痕都极为清楚,从棺槨朽痕判定,皆为槨分三室(即头箱、边箱和棺室)的一棺一槨墓。随葬品都以青铜器为主,青铜器可分为礼器、兵器、工具和饰品几类。每座墓葬的青铜礼器组合一般为鼎2、缶2、簋2、盨缶1、盂1、盘1、匜1、勺1、匕1。除青铜器外,还见有陶器、玉器、骨器和石器。共出随葬品132件,其中青铜器71件。从器物的形制、花纹与风格等方面分析,它们属于春秋中晚期的楚墓。这是首次在鄂西北地区经科学发掘的高规格春秋时期楚墓。同时,发掘的4座春秋时期墓葬普遍发现有殉人葬俗,每墓殉一人,墓主与殉人在墓葬中的排列有着明显的尊卑和主从关系,殉人大多横置于墓主的足部,大多无随葬品,棺内无朱砂。这是继淅川下寺楚墓发掘后,在楚墓中所见比较集中的又一春秋时期楚国的殉人墓地,对研究春秋时期人殉制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泰山庙墓群位于丹江口市均县镇,由吉家院、秦家坡、龙脖、付家院、水牛坡、王家垭和三座山等多个独立的岗地构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首批控制性发掘项目之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的王家垭墓地(南部)、水牛坡墓地、吉家院墓地进行发掘,发掘东周墓葬118座、东周车马坑3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计约2000件。其中:

王家垭墓地(南部)的东周墓29座,均为土坑竖穴墓,规模较小,墓葬形制分为带斜坡墓道墓、带台基墓、带壁龛墓和普通土坑竖穴墓四类。随葬陶器以鼎、敦、壶为主。

水牛坡墓地的东周墓56座,均为小型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以鼎、敦、壶、豆、盘、匜组合为主,随葬青铜器多为兵器及车马器。

吉家院墓地的东周墓葬33座,车马坑3座。墓葬以处于墓地最高处的M48为核心有规律地分布。墓葬皆属战国时期楚墓,随葬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以鼎、敦、壶、豆和鬲、盂、罐、豆为主;前者组合中还有小口鼎、盨缶、簋、盘、匜等。青铜礼器有鼎、敦、壶、簋、方豆等,青铜兵器有剑、戈、矛、镞等,青铜车马器主要有轡、銜等。其中,M48墓口长12.5、宽11.6米,墓道长7.2、宽3.5米。五级台阶。一槨二棺。出土随葬品150余件,青铜礼器有鼎、敦、壶、簋等,另有青铜兵器剑、戈、矛、镞和车马器轡、銜等。玉饰有璧、璜、珠、管等,还发现有大量的金箔。

北泰山庙墓群东周墓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器类存在

自身特点,是鄂西北地区楚文化分区研究的典型材料。

牛场墓群位于丹江口市均县镇。在505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东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99座。墓向分南北和东西向。葬具均腐烂,仅存棺痕,可分辨出一棺一椁墓和单棺墓,其中多数带有壁龛,绝大多数壁龛位于人骨左侧。人骨保存极差,能看出的均为仰身直肢葬、曲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陶器组合有鬲、盂、罐、鼎、三足罐、鼎、敦、壶、豆、盘、匜、鼎、敦、壶等几种,反映出楚文化的地域特点。

陈坡遗址位于襄樊市襄阳区。在崔家营航电枢纽工程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陈坡遗址10号墓。10号墓为一东西向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方向88度。墓道位于墓口的东侧中部。墓口长20.2、宽18.2、深9.05米。七级台阶,台阶宽45~55厘米,台面均铺有一层黄色细砂,每级台阶高约70~80厘米,逐级斜内收,壁面较平整光滑。坑内填褐黄色五花土,并夹杂有许多灰色土,填土均经夯筑,夯窝有圆形和不规则方形,直径都在4厘米左右,夯层厚约42~48厘米,夯层面略内斜。填土中包含有东周时期的陶鼎足、高足、豆柄、罐口沿等。葬具腐朽无存,根据棺、椁朽痕判断,葬具应为一椁重棺,椁痕长5、宽4.2、高1.2米,椁室内可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三个部分。随葬器物近300件(套)。其中,青铜礼器有铜鼎31件(其中升鼎4件、盖鼎25件、大鼎2件)、簋6件、盒5件、方壶2件、缶2件、铺首壶2件、罍2件、鬲10件及尊、甗、豆、小口鼎、盃、鑑、盘、匜等,兵器有剑戈、戟、矛、殳、弩机、镞,车马器有车軛、马衔、泡、鈎等,玉石器有璧、佩、玦、璜、琮、带钩、斑指等,陶器有壶、罐、豆等。该墓属于战国中晚期的中型墓葬,其随葬器物丰富,器物组合关系齐全,形制清楚,为研究楚国中等贵族级别的礼乐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楚墓的分区、分类、分期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熊家冢墓地位于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为更好地保护利用其文化资源,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批复精神,熊家冢墓地考古队对熊家冢墓地的布局、部分排葬坑、车马坑进行勘探、发掘与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其一,基本弄清了墓地的总体布局。熊家冢墓地由主墓、陪葬墓、车马坑、排葬坑、祭祀坑、地面建筑等部分组成,规模宏大,规划缜密,布局保存比较完整。主墓位于墓地中部,墓口东西长68米,南北宽68~70米,墓坑深18米左右,东有长33米的斜坡墓道。陪葬墓位于主墓之北,长36米,宽30米,东边墓道长18米左右。车马坑共发现34座,其中1号车马坑长132米,宽12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车马坑之一;在1号车马坑之西,还发现了大小不一但排列有序的32座小型车马坑,其排列方式为目前东周墓地所仅见。在主墓南边分布92座排葬坑,共分4列、24排,其大小、规模、方向、间距基本一致;在陪葬墓的北边分布30余座排葬坑,其排列方式与主墓南边的排葬坑相似,只

是规模略小,数量略少。祭祀坑分布于主墓的南边、西边和北边,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一般开口边长(或直径)1米左右,深6~7米,目前已发现100多个。位于主墓南部的地面建筑已毁,仅存100多个柱洞。

其二,基本弄清了排葬坑的性质与功用。从发掘的16座排葬坑看,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4.7、宽3.3、深4.8米左右。葬具为一棺一椁,少量为单棺,每墓埋葬1人。随葬器物主要为随身佩带的一套(组)玉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为下葬制作的玉器,生前未曾使用。据出土玉器的造型、纹饰等特征分析,其年代属于战国时期,可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楚国殉葬墓。

其三,了解了车马坑的基本情况。对33号车马坑的清理表明,这是一座两马一车的小型车马坑,木车与马骨痕迹清晰可见。两马背向而卧,马头部除青铜马衔、骨质马镡、锡质节约外,还缀满了以两端有孔的椭圆形小玉片制成的玉饰;马身骨痕完好如初。木车遍体髹黑漆,车軛、车辖等部件为青铜所制,木质车轮、车轂、车衡、车舆等基本完整。

其四,对祭祀坑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清理的3个祭祀坑都埋葬祭祀时用的玉璧,是祭祀主墓的遗存。

其五,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目前出土文物已达583件(套),以玉质文物(包含水晶、玛瑙等)为主,也有少量铜器、锡器、陶器。这批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好,价值高。尤其是殉葬墓中出土的龙形玉佩、龙凤形玉佩、玉璧、玉璜、紫水晶珠等,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组玉佩更是难得的精品,对研究当时玉佩的使用、佩带方式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熊家冢墓地是我国目前所发掘的东周时期规模最大、规划最严谨、布局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无疑会推动楚文化研究向新的台阶迈进。

三

秦汉以降,湖北的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睡虎地墓地位于云梦城关镇。因铁路部门在路基桩基施工中破坏一座墓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进行抢救性清理。该墓编号M77,是一座西汉时期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棺椁保存较好,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陶器、漆器、竹器、铜器等,其中出自边箱的一件竹简内的西汉简牍特别引人注目。竹简内清理出来、并给予编号的简、牍有2100多枚,其中包括有一部分残、断者。此外还有大量无序的残断简牍。这批简牍初步看来约有20卷左右。完整的竹简长约30厘米,简上有上、中、下三道编绳,编绳大多还残存在简上。简文多以隶书书写在竹黄一面,墨迹清楚,书写工整。由于竹简出土时是置于竹筒内,因而基本上保存了竹简的原有编次。这批竹简内容丰富,包括历谱、算术、法律类、典籍类等,残断竹简中还有类似日书的内容。竹、木牍约有数十枚。部分牍上有编绳的痕迹,应是先捆束好了再

放入竹简内的,其间还掺杂有多枚与之等长的竹简。竹、木牍的长宽不一,最长的长约44厘米,最短的长约22厘米。牍的内容主要包括簿记类和官文书类。这是继云梦秦简之后在该地发现的又一批汉代简牍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方家山六朝墓地位于鄂州市司徒村。在鄂州市体育中心一期工程建设中,鄂州市博物馆抢救性发掘了十余座六朝砖室墓。这些墓葬分布密集,多朝东南向,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之分。平面形制可分为长方形、刀字形和凸字形,平面结构一般由墓室、甬道、封门、挡土墙、排水沟等组成。其中,M8、M9和M10的规模较大。M9之墓室长6米、宽2.3~2.5米,采用双层墙、双层券顶砌筑,内外使用部分花纹砖作装饰。墓室内设有方形祭台、简易棺床。M8、M9和M10的排水沟相互连接,反映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家族关系。出土的遗物种类较丰富,以六朝青瓷器为大宗,另有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石器、木器等。其中,孙氏龙虎铜镜纹饰精美逼真,其外有铭文一周:“孙氏作竟世少有苍龙在左白虎在右”。

该墓地在众多六朝墓中具有代表性,是研究鄂州地区六朝时期埋葬习俗、族葬制度的珍贵资料。

蔡家湾墓地位于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在(武)汉(山)高速公路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该墓地,新发现一座元代砖室墓。该墓平面形状近方形,墓门朝西,头向95°,为尖顶竖穴砖室墓,墓圻长310~320、宽300~320,墓室底至墓顶高130厘米。墓室分为北、中、南三室,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均为长方形竖穴,均在东壁头端设有三个壁龛。随葬品有陶瓶、陶罐、青瓷碗、青瓷豆、铁剪刀等。同时,在中室东墙发现一块刻有兔子形象的画像砖,在南室两壁龛之间发现一块刻有“至正九年己丑六月其年风调雨”字样的铭文砖。至正为元代顺帝年号,至正九年即1349年,该铭文砖是湖北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元代墓砖,为准确判断湖北元代墓葬的特征提供了重要标尺。

遇真宫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是世界文化遗

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重要的文物保护项目之一,必须使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对遇真宫保护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遇真宫之西宫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目的是尽可能明确其布局、建筑特点与内容,为遇真宫文物保护工作方案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整体揭露的方式,对西宫内南北长约126米、东西宽约76米的区域进行发掘,比较完整地揭示出西宫的建筑遗迹,基本明确了西宫建筑的布局、特点与内容。

西宫内发现的原建筑遗迹有房址13座、影壁3个、水井1处,道路、排水沟、院落若干。出土包括铜器、石器、陶器、铁器在内的110多件珍贵文物,既有生活上用的钱币(铜)、茶具(瓷)、砚台(石)等,也有宗教用的如铜镏金真武帝、铜灵官像、陶神像等,还有大量的建筑构件,时代从明代延续到清代。

遇真宫西宫的建筑遗迹大体上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建筑遗迹以石质构件为特征,建筑规范大气,布局有序。晚期建筑遗迹以砖质构件为特征,建筑比较凌乱简单。早期建筑主要由F1~F4构成的1号院落和由F6~F9构成的2号院落组成南北向对称布局,中间以F5连接。晚期建筑主要包括影壁2、影壁3、3号院落、4号院落等。

发掘所揭示的遇真宫西宫建筑规模庞大,遗迹丰富,遗迹之间的关系复杂,其建筑布局似乎由早期的布局规整、等级严格、用料讲究的皇家道观演变成晚期的一处随意改建、封闭性的普通的道观。同时,在早期建筑中,位于西宫南部的由F1~F4构成的1号院落之规模明显大于位于西宫北部的由F6~F9构成的2号院落,区别于传统建筑布局的模式。可以说,对遇真宫西宫的发掘填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提供了研究武当山古建筑历史的具体实例,也为科学保护遇真宫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准备了详实的资料。(本文据相关领队或项目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特此致谢!)

(孟华平)

九. 江西省

2006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严格遵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顺利地完成了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吉州窑考古调查与试掘项目,完成了景德镇南环公路、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武宁至吉水高速公路等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中的考古发掘任务,完成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德安宋代壁画墓的抢救性发掘项目,另外还首度对江西几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航空遥感考古工作,主要收获如下:

(一) 吉州窑考古调查与试掘

吉州窑遗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是江南地区一处闻名中外的综合性瓷窑遗址,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安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勘察和试掘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代表性的选择了窑门岭、小学、茅庵岭、本觉寺塔北、本觉寺塔南、猪婆石岭、下瓦窑岭、老街等8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试掘工作,共布12个探方,揭露面积410.8平方米,分别揭示龙窑遗迹2座、马蹄窑遗迹1座、灰坑11个、路面5处、地面(或天井遗迹)2处、墙基13条,出土了

一些瓷器和窑具标本。龙窑(F30)位于茅庵岭南面山坡上,坡度大约20度,方向南偏西32度。根据地层叠压和出土遗物推断该窑为南宋晚期专烧匣钵的龙窑。结合南宋蒋祈《陶记》记载的“陶工、匠工、土工之有其间,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非常细致的窑业分工。灰坑遗迹中与制瓷相关的有F5和F11,F5位于本觉寺塔南部,坑口呈椭圆形,上大下小,斜壁,圜底。包含物有黑釉、白釉、青白瓷片,器形有碗、盏、碟、杯等。根据其形状结构及出土物推测应是南宋时期制瓷作坊中陈腐池;F11位于猪婆石岭西北部,坑口呈圆形,弧壁,壁上涂抹三合土,底填埋近圆形的青石一块。根据其形状结构、位置及包含物推测,应为南宋时期作坊内搁置擂釉缸的遗迹;所揭示的路面遗迹有用匣钵、长条形青灰砖以及鹅卵石、沙土砌成三种,时代分属民国、明清及宋元时期。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物,参考《窑岭肖氏族谱》中的宋代永和地图,推测路面(F48)是宋元时期瓷器街的一段,路面(F44)是清代永和老街的街道路面,该街道建筑在宋元时期永和镇的鸳鸯街上;地面或天井遗迹(F2),则可能是民国时期本觉寺寺庙的地面或散水的天井遗迹。所出瓷器标本种类较多,纹饰丰富,造型独特,主要有晚唐五代的青釉瓷,器类有碗、盏、盘、执壶等;北宋时期的青白釉瓷,器类有碗、杯、炉、台盏、盏托、盏、小罐、粉盒和器盖等;宋元时期的白釉瓷、黑釉瓷、彩绘瓷、绿釉瓷及各类瓷塑等,白釉瓷的器类有碗、钵、杯、炉、台盏、盏托、盏、小罐、粉盒和器盖等。黑釉瓷的器类有罐、梅瓶、壶、炉、碗、盏、碟、钵、盆、粉盒等。彩绘瓷的器类有瓶、罐、炉、枕、盆、洗、壶、钵、盒、鸟食罐等。绿釉瓷的器类有钵、盏托、炉、枕、盆、碗、盏、碟、长颈瓶以及建筑构件筒瓦、房屋模型等,其中绿釉绣墩是以往不见的器型,填补了绿釉瓷器的空白。瓷塑种类很多,有人像类、神像类、动物类以及文玩类等。此外还采集和出土匣钵、支圈、垫饼、铁削刀等窑具。通过对吉州窑遗址的勘探、试掘和出土资料的研究,我们取得了以下成果:确定了吉州窑址是一处古代瓷窑和聚落相混的综合性遗址;基本了解了吉州窑址的分布范围及窑址各时期遗存的组成和分布情况;明确了吉州窑遗址各区域的功能,对宋元时期的古镇、街道、窑业堆积以及手工作坊遗迹的分布更为清楚;大量的瓷器标本,特别是作为吉州窑典型代表产品黑釉瓷和绿釉瓷的出土,极大的丰富了原有的标本,赋予了吉州窑更丰富的内涵,使我们对吉州窑瓷业烧造发展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吉州窑瓷器发展史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基础。

(二) 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

1. 景德镇南外环公路

景德镇南外环公路途经景德镇南河南岸,自西向东在昌江区竟成镇小岗嘴村道塘里、银坑村铜锣山、浮梁县湘湖镇盈田村凤凰山发现了古窑址。2006年2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汇同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浮梁县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铜锣山窑址,位于景德镇市昌江区竟成镇银坑村委银坑小学后山叶家坞西侧铜锣山的山坡上,散布残瓷碎片及窑具,面积近千平方米,是一处宋代主烧青白瓷的重要窑场。此次发掘面积459平方米。发掘揭露出的遗迹有作坊和练泥池各一处,出土了一批青釉、青白釉、黑釉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青白釉瓷占出土物的绝大部分,可复原的器物达数百件。从残存的作坊墙体来看,它是由废弃匣钵和残青砖垒砌而成,从结构布局和出土物分析,应为简易建筑,但具有练泥、施釉等功能。出土标本可分为日常用器、制瓷工具和窑具。瓷器有青瓷、黑瓷和青白瓷,青白瓷占绝大多数,偶见青釉和黑釉瓷。青釉瓷器的器类有壶和碗;黑釉瓷器的器类仅有盏;青白釉瓷器的器类有瓶、花浇、钵、碗、盘、碟、水盂、盏、盏托、酒台、杯、器盖等。制瓷工具中青白釉瓷质工具有轴顶帽、荡箍。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垫钵、火照、支钉、垫圈、垫饼等。

道塘里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竟成镇小港嘴村委东南山林场道塘里五显庙前东北面的山坡上,现有数处保存较好的窑包,龙窑遗迹清晰,地表可见碗、盘、盏、酒台等瓷器及匣钵、垫饼等窑具标本,窑业堆积十分丰富,最深可达8~10米,窑场面积共约6000多平方米,根据标本分析,初步认定是一处宋代主烧青白瓷的窑场。此次发掘面积共计800平方米,揭露龙窑窑炉遗迹一座、作坊遗迹二间,出土了一批青釉、酱釉、青白釉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青白釉瓷和匣钵窑具占出土物的绝大部分,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达数百件。龙窑遗迹坐西北朝东南,方向南偏东27度。整体呈长条形,先沿山体挖出形状,东西两侧再砌窑墙。长13.25、宽2.6~2.8、残高1.65米。龙窑由排水暗沟、窑前工作室、火门、火膛、窑床、排烟室等几部分组成。作坊遗迹两间相连,编号分别为F1、F2。其中F1保留较好,它是一座由夯筑土墙和片石墙组成,平面呈长方形,片石墙具有挡土功用。出土瓷器标本非常丰富,有青釉、酱釉和青白釉瓷。青釉瓷数量最少,器类有执壶、花浇、碾磨、碾轮和扁担形小碟等。酱釉瓷器略多,器类有执壶、碗、盏、盘、高足杯、碟、炉等。青白釉瓷器最多,占出土物的绝大部分,器类除了有执壶、花浇、钵、碗、盘、碟、水盂、盏、盏托、酒台子、杯、器盖、佛像等生活用具外,还有轴顶帽、荡箍等制瓷工具。

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瓷器标本的特征来看,铜锣山窑址和道塘里窑址均是北宋早中期以烧造青白釉瓷为主,兼烧少量青釉、黑釉瓷器的窑址,其上限当在北宋早期,或可早到五代晚期,下限当在北宋中晚期,超不出南宋。它的发掘和研究对探索我国青白瓷的起源及其早期烧造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凤凰山窑址,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盈田村委山脚下自然村南面的凤凰山西北山坡上。表面散布残瓷碎片及窑具,面积近5千平方米,窑业堆积十分丰富,地表可见执壶、碗等瓷器标本及匣钵、垫饼等窑具标本。此次发掘面

积共计 658 平方米。揭露出龙窑遗迹一座,作坊遗迹一间,出土了青釉、酱釉瓷、青白釉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青白釉瓷占出土物的绝大部分,可复原的器物达数百件。龙窑遗迹整体呈长条形,长 21、宽 0.4~5、残高 0~1.35 米,方向北偏西 70 度。由窑前工作室、火门、火膛、窑床、窑尾出烟室、窑尾挡土墙等几部分组成。墙体采用砖坯和圆筒状匣钵混砌而成。作坊遗迹由两条废弃的匣钵墙组成,匣钵基本上是圆筒状,依地势先竖向置放,然后横向置放。出土遗物丰富,有酱釉、青釉、青白釉瓷器和窑具残片。酱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出土的数量较少,器形仅见执壶类。青白釉瓷器数量占绝大部分,器类有执壶、花浇、钵、碗、碟、器盖以及瓷塑狗等,其中执壶数量多,比例占到了 90%。从胎质上观察,青白釉瓷为佳,酱釉瓷次之,青釉瓷器最劣,原材料的利用十分充分。发掘结果表明,凤凰山窑址是一处北宋中晚期主要烧制青白釉执壶为主的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窑场,为我们研究景德镇地区宋代制瓷手工业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

2. 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

经调查,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途经了余江县城墙圈商代遗址和余干县刘家山唐代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所在 2006 年上半年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两个项目的发掘任务。

余江县城墙圈商代遗址位于余江县城北面约 20 公里的平定乡东面约 5 公里的邵家村南的圆形台地上,遗址面积约 4 万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鹰潭博物馆和余江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于 2006 年 4 至 6 月对余江城墙圈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共计 950 平方米。揭露遗迹有灰坑、灰沟、陶窑三类。陶窑顶部已残,直壁平底,底部平面呈圆形,壁经火烤形成厚约 0.05~0.07 米的烧结层。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青铜器。绝大部分为陶器,可辨器型有罐、釜、钵、碗、鼎、纺轮等。以灰色硬陶占绝大多数,次为红色硬陶,有少量的泥质陶。纹样见有云雷纹、斜线纹、复线方格纹、斜线方格纹、错乱线纹、大方格纹、波折纹、粗方格纹、不连续线纹、细方格纹、曲折纹、附加堆纹、复线回字纹、叶脉纹及数量众多的组合纹样,还有少量的刻划符号。在制陶工艺方面主要为泥条盘筑法,慢轮修整口沿。石器有砺石、石镑、石范等。均磨制,部分为坯料。另外在 G1 还出土了青铜刮削器碎片,发现有少量碳化稻谷。城墙圈遗址东距鹰潭角山商代窑址不到二十公里,同类器物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都以灰色硬陶为主,不见鬲,炊器以釜、甗形器为主,大型器物如罐,器内凹凸不平,纹饰以云雷纹和回字纹为多,器把作风也盛行。同时跟万年肖家山、斋山、送嫁山等地所出的器物也有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器物肩部的圆形贴饼。而器外附耳的风格则接近于婺源茅坦庄所出器物。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墙圈遗址属江西境内的万年文化类型,其时代约相当吴城三期,即商末周初。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

城墙圈遗址周边有土墙环绕,外有防御性质的濠沟遗迹,当属商代古城无疑,这是目前所知赣东北第一个早期城址,对研究南方地区的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刘家山唐代窑址位于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新屋郑家的刘家山上,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 年 3 月至 7 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余干县博物馆对处于公路红线范围内的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 670 平方米,揭露斜坡状阶梯式龙窑一座,灰坑一个,出土各类窑工具和青瓷器近万件。窑炉(06YHLY1)成长条形,由工作面、火膛、第一窑室、第二窑室和窑尾组成,窑室高差为 0.25 米,窑门和烟道不甚清晰。窑底保存有大量排列有序的各类支烧具,部分支烧具上刻有代表方位的“上”“中”“下”和表示数量的“千”等文字符。灰坑(06YHLH1)平面呈近圆形,上大下小,弧壁内收,平底。内出有大量支烧具和青釉褐彩瓷及月白色瓷片,其中带“贞元”纪年款的青釉贯耳罐即出土于此。出土标本主要有瓷器、窑具和少量陶器。瓷器釉色以青釉、酱褐釉为主,还有部分青釉褐彩、月白釉,器类有碗、盘、碟、盆、钵、罐、壶、缸、瓮、器盖、砚台、拍鼓、灯盏、网坠等。“贞元”纪年款瓷器的出土,为同时期出土物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标尺。瓷拍腰鼓原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它的出土不仅证明了赣地在唐代与西域文化交的史实,同时也与《太平广记》中记述的“洪州商胡事”相符。釉下褐彩瓷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对研究青花瓷的起源意义重大。斜坡阶梯状龙窑曾在广东、福建发现过,在江西尚属首次,且窑床内保存有大量的支烧具,对研究唐代的烧造工艺提供了科学依据。刘家山窑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余干境内无唐代窑址的空白,而且也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

3. 武宁至吉水高速公路

武宁至吉水高速公路途经修水山背新晚~商周遗址群的一部分和宜丰县秋形垌商周遗址,2006 年 7~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博物馆顺利完成了上述遗址的考古发掘任务。

修水山背遗址群位于修水上奉镇山背村,考古调查共发现太平山等 43 处遗址。新晚遗址都集中在山背村中部偏东位置,夹于两条溪水之间的小山包上,其余商周遗址则多分布在盆地周围边缘的小山丘上。2006 年 7 月至 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修水县博物馆、九江市博物馆对武宁至吉安高速公路穿越山背遗址沿线 2 公里范围内的 6 处商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基、灰沟、出土遗物有石料、石坯、石器、玉石料、玉石器和陶器,可复原陶瓷器 30 余件。简述如下,狮垌山商周遗址位于上奉镇山背村西约 500 米,上奉镇茶场东约 50 米之丘陵山岗上。整个遗址布方 19 个,面积 1900 平方米。出土残陶片数百余件,未见可复原陶器。陶片主要为泥质、夹沙等灰硬陶,纹样主要有方格

纹、篮纹、网结纹,及少量云雷纹、席纹等。石器出土亦较少,主要有镞、凿、刮削器、雕刻器等。从陶片的纹样和石器的型制特征来看与赣东北地区商周时期的出土物特征基本相同。太平山商周遗址位于上奉镇湖山村的西南约600米,上奉镇茶场东约50米之狭长丘陵台地上。整个遗址布方64个,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商周墓葬二座。出土了一批可复原陶器,器类主要为甗等。月光埡商周遗址位于山背村中南部边缘,是一个形似馒头的沙性土壤小山包。整个遗址布方22个,面积550平方米。揭露出遗迹有房址2个,祭祀坑1个,灰坑9个,灰沟2条,墓葬5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与玉器标本。陶器以泥质硬陶为主,泥质软陶次之,夹砂陶最少,陶色以灰陶最多,红陶其次。器物多为轮制。器形有大口尊、凹底罐、豆、各式鼎足、高足、圈足器、折肩器等。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其次还有网格纹、菱形纹、叶脉纹、曲折纹、波浪纹、席纹、绳纹、篮纹、方框交叉纹、方框米字纹等。石器分实用器和礼器。实用器有镞、镑、斧、刀、矛、铲、锥、凿、杵、球、砺石等。礼器有钺、琮、祖根、石芯等。玉器,有刀、环、玉块等。陶工具有纺轮模、支座、纺轮等。大岭上西周遗址位于山背村的中南部边缘。整个遗址布方37个,面积925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石器和陶器两类。石器分实用器和礼器两类。实用器有石斧、石镑、石刀、石镞、石铲、石戈、石杵、砺石等;礼器有石琮、石芯。陶器以泥质硬陶为主,泥质软陶次之,夹砂陶最少。陶色以灰陶最多,其它依次为红陶、黄褐陶、黑皮陶。器物多为轮制。器形有各式鼎足、高足、豆、罐口沿、折肩器等。纹饰以方格纹为主,有菱形纹、网结纹、篮纹、弦纹、点纹、编织纹、叶脉纹、刻划纹、绳纹等。凤形岭上西周遗址位于山背村中南部的边缘地带。整个遗址布方28个,面积700平方米。揭露出遗迹现象有西周时期的灰坑2个,祭祀坑1个。出土遗物有少量的石器和陶片。石器有实用器和礼器,实用器有斧、石球、网坠、刀、镞、砺石六类;礼器有石柱一种。陶器以泥灰陶为主,灰陶次之,夹砂陶最少。陶色以灰陶最多,其次为红陶,少量黑皮陶。器物多为轮制。可辨器形有鼎足、高足、罐口沿。纹饰有方格纹、刻划弦纹、曲折纹、篮纹、网结纹、菱形纹等。狮形埡商周遗址位于山背村桥头组西南约1000米的老牛窝大岭上,处在山背盆地的西南部。整个遗址布方110个,面积2750平方米。清理墓葬5座,灰坑10个,灰沟4条,出土石器500余件,可复原陶器30余件,陶片2000余件,玉石器30余件,石料100余件,石坯200余件,玉石料50余件。石器按功能可分为实用器和礼器两大类。实用器有刀、矛、戈、镞、斧、铲、梭、杵、凿、钻、雕刻器、刮削器、砭镰和砺石等。礼器有琮、钺、璧形器和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小型石碑。陶器有软陶和硬陶之分。软陶多为素面红砂陶,纹饰仅见方格纹;硬陶多为硬灰陶,纹饰较多,计有方格纹、回纹、绳纹、篮纹、波浪纹、编织纹、云雷纹、S形纹、附加堆纹、锯齿纹和弦纹等。以方格和回纹居多。玉石器以经过人类加工为标准,可分为玉石料、玉石坯

(半成品)和玉石料三类。按器类可分为玉琮、玉管和玉珠等。从上述六处商周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中石器、玉器占较大比重,既有坯料,也有成品,采制工艺程序几可一览无余。狮形埡、月光埡遗址各遗迹单位中叠压打破遗存较多,为背遗址商周时期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通过发掘,使我们对山背遗址原有的43处文物点的时空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山背遗址的聚落形成、发展和去向有了更多的了解。

宜丰秋形埡遗址位于宜丰县城北边约20公里的天宝乡辛联村一组东北约300米的几个小山岗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7月至9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宜丰县博物馆等单位对宜丰县天宝乡的秋形埡、晒网台商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秋形埡共布方49个,面积1225平方米;晒网台共布方66个,面积1650平方米。秋形埡遗址揭露遗迹单位14个,其中灰坑10座、灰沟1条、墓葬1座、残房基2座。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类。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直壁平底。灰沟平面形状长条形,西北—东南走向。残房基形状不明。晒网台遗址揭露遗迹单位11个,有灰坑和墓葬。其中灰坑10座、墓葬1座。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类。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直壁平底。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类,陶器有泥灰硬陶、泥灰软陶、泥红硬陶、泥红软陶、夹砂灰陶、泥黄软陶等,以泥灰硬陶的数量最多,次为泥灰软陶。纹样有云雷纹、方格纹、绳纹、米字纹、蕉叶纹、复线回字交叉纹、菱形方格纹等,以云雷纹和方格纹的数量最多。器类有罐、鼎、盆、鬲、甗或甗形器、尊、杯、器盖、碗、瓮、坛、钵、壶、釜、纹轮、豆、刀等。以罐的数量最多。器物多附耳,有内附耳也有外附耳,外附耳较多。个别器物带扳。器物制作多为泥条盘筑法,附耳、扳等附件采取捏塑后再粘到器物上的方法。陶器可复原器物有20余件。石器有簇、镑、铲、钻、刀、矛、刮削器、凿等。秋形埡、晒网台商周遗址文化堆积层较薄,地层堆积也比较简单,除上层有春秋时的遗物,如米字纹、蕉叶纹等陶片,下层均为商代文化堆积层。商代堆积中,器物组合大体为鼎、鬲、罐、釜、甗、豆。器物流行带耳伤风,既有包耳也有立耳,既有外附耳也有外附耳,这跟婺源茅坦庄商代遗址的装饰作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纹样以云雷纹为大宗,其实是方格纹和回字填线纹。既有跟吴城文化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少万年商代文化的因素,似乎更多的是吴城文化因素,但受到万年文化的强烈影响,事实上是中原文化和万年文化的结合体,也许这一带早期更多的是中原文化的影响,晚期则兼容并包。从这些因素及器物对比分析,其时代大体相对于吴城三期或偏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遗址的西部发现过商代青铜铙、青铜甬钟等乐器,该遗址是否是早期的一个古城邑或最少是一个重要的聚落,尚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去证实。

(三) 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

1. 南昌火车站东晋墓

该墓葬是在南昌火车站广场施工过程中发现的,位于广场的西侧,其北侧约15米处曾在1997年9月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东晋墓葬群。

墓葬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带耳室的券顶砖室墓,在南昌及江西两晋墓中不多见。墓葬长7.09、宽1.95米,方向65度,由前室、后室、甬道三部分组成。其中后室长4.83、高1.8米;前室低于后室0.05米,长0.9、高1.85米;甬道低于前室0.05米,长1.36、高1.9米。后室、甬道铺底砖作“人”字形,前室为三横一竖平砖铺底。甬道两侧耳室宽0.87、高0.57、进深0.52米,内以砖隔成上、中、下三层,平砖竖砌铺底。后室后壁耳室,宽0.93、高0.72、进深0.62米,内有一砖柱直托耳室券拱,其上一“丁”字形砖柱直托墓室券拱。耳室两端砌有砖柱,似灯台。此外,在甬道两端、前后室交接处、后室后壁皆砌有砖柱券拱。墓砖色泽青灰,侧饰网钱纹,长0.32、宽0.16、厚0.05米。后室放置一副保存完好的楠木质髹漆木棺。棺木平面呈长方形,截面呈倒梯形,高0.81、口长2.73、宽0.62、底长2.62、宽0.6米;棺盖长3.3、宽0.62米。棺内底有漆纹,上铺一长2.55、宽0.43、厚0.06米的垫板,并穿七个小孔。该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共计50余件。实用器多,冥器少。漆器共9件,器形有托盘、耳杯、勺、槁、匱、攒盒、砚台等。其中托盘2件、耳杯1件、槁2件、勺1件出土墓葬前室和甬道;匱1件、攒盒1件、砚台1件出自木棺内。耳杯、托盘、槁用红、黄、黑、灰、绿等色彩绘纹样,金黄色勾线;有人物、鱼、瑞兽、飞鸟、龙、凤等题材;耳杯的耳上、槁底分别有“黄得章上”和“口……上”等字样。为研究两晋时期的绘画、工艺技术、社会生活的风俗风貌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木器共24件,器形有梳、篦、发饰、发簪、几、盒、名刺、木构件等。其中名刺2件、几1件、盒1件、木构件7件,出在墓葬前室和甬道;梳1件、篦1件、发饰1件、发簪10件,出自木棺内。发簪上粘有毛发等遗物。名刺上墨书文字,其中1件字迹模糊,仅辨认出“口……再拜……弟……”,另1件较清楚,上书“鄱阳雷铎再拜,问起居,字仲处”字样。长2.47、宽3.2、厚0.7厘米。名刺格式先在开头处写明郡名、身份、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刺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字,堪称后世名片的远古祖先,名刺在墓葬中出土,为弄清墓主的身份提供了实物证据,对我国书法史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青瓷器12件,器形有洗、钵、四系罐、盘口壶、虎子、盏等。其中洗1件、钵4件、四系罐3件、盘口壶2件、虎子1件出在墓葬甬道、前室、前耳室、后室;盏1件出自木棺内。有一件钵的底部墨书“雷”字。这批青瓷器均为江西丰城洪州窑两晋时期的常见产品。虎子又称夜壶,其釉色青莹,堆塑、刻划工艺精湛,堪称洪州窑产品中的精品。铜器10件,器形有洗斗、兽足三足盆、圆纽矩形龙凤铜镜、延环五铢、大象当干铜钱等。其中墓葬甬道、耳室出洗斗1件、兽足三足盆1件、铜钱1枚;棺木内出铜镜1块、铜钱6枚。滑石猪2件,雕刻

精美,惟妙惟肖,出自棺木内。墨块1件,为松烟墨,系松烟经墨模压印成型,可直接用手把握在砚上研磨,不需另外置备研石。呈扁圆条状,并刻有花纹,出自棺内。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征看,该墓葬年代为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年代稍早于1997年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结合出土的墨书木名刺、底书“雷”字青瓷钵和青瓷虎子判断,基本可确认墓主为一男性贵族,鄱阳人,名雷铎字仲处。为研究南昌两晋时期雷姓家族的发展史提供了线索。同时,该墓出土的植物果核残渣、毛发、炭渣,使获取两晋时期的饮食、丧葬风俗、生活环境和疾病、医药卫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成为可能。出土的青瓷器、漆木器、墨块、滑石、铜器,数量较多,制作较精美,工艺水平较高,反映了两晋时期南昌及江西地区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一个侧面透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以南地区开始得到开发的历史史实。

2. 德安宋代壁画墓

位于江西省德安县聂桥镇芦溪村望夫山凤凰嘴。2006年5月,村民在开采石料时被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德安县博物馆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发掘资料表明,墓葬南北向凿山石为穴,穴壁直,长5.3、宽4米,墓口距地表约3.4米。墓为两座东西并列、耳室相通的长方形券顶砖砌单室墓,属同穴合葬。耳室宽0.15、高0.21、距墓底0.18米。墓室平砖铺底。墓前有长方形斜坡神道,长约4、宽约2.6米,斜坡平缓,坡度约16度,内填含石块的黄褐色五花土,质疏松。该墓早年被盗,但西侧墓室的彩绘壁画保存较好。壁画墓室长3.06、宽1.2、高1.6米,北、东、西三面和顶部为石灰浆抹面的彩画,四周充填石灰砂浆,坚固结实,形成一个厚重的石灰槁,对棺木、壁画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壁画彩绘在石灰浆面上,厚0.01米,面积约13平方米。其中东、西两壁彩画石灰底账层与砖墙粘接紧密牢固,表面平整,无明显裂痕、空鼓、掉块现象,保存状况相对稳定;顶部彩画保存状况较差;砖缝开裂严重,有空鼓、脱落、砖块错位等现象;北壁彩画已遭破坏。彩画均以铁线勾勒,再随类赋彩。主要有红、黑、蓝、赭黄等色彩,推测工艺为:先涂施石灰砂浆作为底账层,然后用石灰水抹面,表面可生成碳酸钙晶性,使其较为坚硬,为底色层,再在底色层之上用“干画法”即用调和好的颜料在干的(石灰)墙上作画,形成画面颜料层。内容分为导卫、武官、文侍、侍女和星相图等五类。东、西壁由北而南各分立九人,东壁题材主要为武官、文侍,西壁题材主要为侍女、导卫;顶部和拱肩部位题材为日月星相图。其中文臣武将、侍女随从等人物高度约1.1~1.15米,武将头戴幞帽,身着窄袖袍衫,手执宝剑;文臣头戴乌纱帽,身着圆领朝袍,双手捧笏;侍女头发呈对分式,分披两侧,高髻,上身外负披肩,下着漫足罗裙,体态丰盛。他们司职明确,恭候侍立,组成一个仪仗场面,虽未见主人见,而帅堂威势已溢于墙间。星相图由赤乌(太阳)、蟾蜍(月亮)、星辰、云朵

组成。全画布局规则,比例准确,手法洗练,形神兼备,墨彩古雅,浑若天成,是不可多得的宋人手笔,展示了宋代风俗画的概貌,入选2006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根据墓葬结构、彩画内容、笔法和出土的钱币、瓷片判断,该墓年代在北宋时期。宋代壁画墓在北方发现较多,南方却不多见。为此,我所邀请陕西省壁画保护专家赴现场制定了“揭取搬迁,实验室内修复,异地保存”的壁画保护方案,并成功予以了实施,这是江西宋代绘画保存成功的一例。

(四) 航空遥感考古

江西航空遥感考古于2006年11月正式开始起步了。航空遥感考古是利用地学遥感手段获得田野考古信息、并结合田野考古方法、经验和成果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进行考古研究的一门学科。航空遥感考古不仅可以利用居高俯瞰和视域宽广的优势寻觅古代人类直接暴露在地表部分的遗存,而且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勘察地下遗存和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荒废、在平地很难观察的地上遗存。为了了解大型遗址的结构布局和保存状况,使研究工作得以进一步的深入,并为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打下基础,我所成功的将航空遥感考古技术首次引入到了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次航空遥感考古的对象是新干大洋洲牛头城遗址、吉安县吉州窑窑址、泰和县白口汉城城址等3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观察航拍照片,我们可以了解到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泰和县白口古城遗址保存较为完好,古城的布局、结构非常清晰,照片也清楚地反映了遗址的保护现状;吉安县吉州窑遗址基本上被现代建筑和道路包围、分割,窑址的地表破坏较为严重,但还存在5处保存较好的窑包。同时,吉州窑址遥感照片清楚地反映出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的永和镇保存较为完好,为下一步对永和古镇的保护,对研究吉州窑窑址的生产、交易、运输等情况有一定的帮助;新干牛城遗址和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全貌也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我省将参照历史文献及上个世纪不同阶段留下的航空照片,对该处文物遗址的原貌、内部结构、城址走向、城市布局等进行最大限度地还原保护。这次航空遥感考古成功拍摄的遥感照片对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主动性课题发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等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拓宽了江西文物考古勘察和研究的领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将做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樊昌生 王上海)

十. 江苏省

2006年江苏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均有重要考古发现。史前时期重要发现有溧阳神墩遗址、江阴南楼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存,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历史时期有邳州梁王城西周墓地、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和南京上坊六朝早期墓葬。

一. 史前时期

从“十五”到“十一五”期间,江苏史前考古制定了两大课题,即“黄淮地区史前聚落考古及其文明化进程”和“环太湖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六七年时间过去了,在苏北和苏南地区,两大课题都取得了才长足的进展,取得了重要收获。神墩遗址的发掘,是继2002年宜兴骆驼墩遗址、2003年宜兴西溪遗址发掘之后,太湖西部又一重要遗址。为进一步确立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以平底釜为中心的新文化类型——骆驼墩文化类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确立了太湖文化区和宁镇文化区的文化分界,对重新全面认识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分区和类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南楼遗址的发掘对于崧泽文化分布、聚落形态以及环太湖流域早期文明的形成将会有更新、更全面的认识。苏北地区梁王城遗址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房址、作坊、窑址等遗迹对研究大汶口文化时期黄淮地区的聚落形态和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

1. 溧阳神墩遗址

2004年12月、2005年12月~2006年7月,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常州市博物馆、溧阳市文管会对位于太湖西部

的溧阳市社渚镇孔村神墩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面积1002.5平方米。发现了距今7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时期相对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共清理墓葬252座,婴幼儿瓮棺葬16座,房址10座,灰坑90个,沟1条。同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墓葬9座、早商时期灰沟遗存1条、灰坑10个以及春秋时期的灰坑2个。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等文物和动物标本,填补了太湖西部古文化的空白,对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面貌特征、交流传播和变迁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神墩遗址现为平原地带高出四周地面1~2米的不规则条形土墩,东西约150多米,南北约200米,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南部和西南部被溧梅支河环绕,向东200米注入梅渚河并汇入溧阳、宜兴境内的南溪河流入太湖,向西经高淳胥河、固城湖、石臼湖可达长江,既构成了太湖水系的有机组合部分,也成为古代先民对外交流联系的便利通道。

发掘区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北部,文化层平均厚度为1.5~2米之间,主要遗存的年代跨度为距今7000~6000年左右,分为早、中、晚三大阶段,早期阶段遗存约为7000~6500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早期。中晚阶段遗存约为6400~6000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

早期阶段发现了釜、豆、罐、盆、钵、匜、盂、杯、甑、蒸钵、器盖、器座、支座、陶拍等大量陶器。陶系以夹细蚌末褐

陶和红陶为绝对主体,有一定数量的红衣陶、黑衣陶及零星的泥质陶、夹炭陶和夹砂陶。陶胎相对较为一致,细蚌屑的含量较高。胎质较为疏松,火候相对较低。相当多的陶器呈现外红内黑的状态。平底器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量三足器和圈足器,不见圆底器。纹饰简单,仅有少量锯齿纹、刻划纹、按捺纹、镂孔、凸棱等。釜手、把手、器耳的使用比较普遍。平底釜是最为重要的炊器,数量最多,形制也多种多样。主要有直口斜腹筒形釜、直口宽沿斜腹筒形釜、罐形釜、盆形釜、敛口釜、尊形釜等,口沿下常有四个或两个舌梯形对称釜手,因器形不同腰檐宽窄不等或无腰檐,有的腰檐外缘有凸纽、锯齿纹装饰或形成多角状。腰檐以上多施红衣,少量施黑衣。同时多层次大面积分布的密集柱洞和灰坑,可能与高出地面的立柱架梁铺板建屋的干栏式建筑关系密切,共同组成了一幅地势低平、水网稠密地区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另外在多个灰坑中淘洗发现的炭化稻米和红烧土块中夹带的水稻谷壳印痕以及少量的鹿、龟、鱼、鸟类动物遗存等对研究当时的稻作农业、食物结构、生计方式、生存环境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期阶段以墓葬区为代表,在公共墓地中共清理成人和青少年墓葬 252 座,分布非常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相当数量为浅坑和深坑填土掩埋,部分为平地堆土掩埋。瓮棺葬 16 座,散布于墓地的墓葬之间,一般用倒扣的釜作为葬具,里面残留有婴幼儿骨渣。墓地边缘还有两处狗的骨架。所有墓葬头向均向东或东略偏北、偏南,葬式以仰身直肢、屈肢和侧身直肢、曲肢、交肢为多,也有俯身的直肢、屈肢、交肢以及合葬墓、二次葬等,有的墓葬还用其它人体的尸骨随葬,如 M20 头下枕有股骨和腓骨。随葬品 331 件出土于 167 座墓葬中,陶器 247、石器 63、玉器 21 件,随葬 1~3 件的 150 座,4~8 件的 16 座。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比较平等,少量随葬品数量稍多的墓葬,出现了崇向石玉器的倾向。出土陶器中夹砂陶和泥质陶的数量增加,夹蚌末陶数量减少,以红陶为主,灰陶、褐陶、黑陶较少,少量陶器施红衣或黑衣。三足器的数量大量增加,足多呈扁条状,正面多有一条纵向凸脊,相当多的三足器的仅剩余足根,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圈足器有所增多,平底器相对减少,新见圆底器。器形有鼎、三足罐、三足釜、平底釜、罐、豆、盆、钵、壶、匜、器盖、纺轮、网坠等,纹饰主要有弦纹、刻划纹、水波纹、锯齿纹、附加堆贴、镂孔、凸棱等。一侧往往有一釜手或器耳。墓葬陶器的小型化和明器化倾向显著。瓮棺葬陶器器形相对较大,主要有侈口罐形平底(或三足平底)釜、直口筒形平底釜等。石器有穿孔石斧、镑、凿、圈形器、条形器等,制作精致,打磨光滑,有的无使用痕迹。出土玉器为璜、玦、管、坠等,质料既有与溧阳小梅岭玉矿相似的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也有玉髓、玛瑙、石英等。特别是 M20、M88 的 2 件玉璜出土于死者口中,为中国目前最早的口含敛尸玉器,开创了玉器神圣化和神秘化的先河。

晚期阶段发掘区域再次成为居住区,建筑形态演化为

红烧土地面建筑。出土陶器中泥质陶、夹砂陶继续增加,夹蚌陶继续减少,但夹蚌褐陶、红陶依然较多,夹炭陶少量存在。器形有鼎、釜、豆、罐、盆、钵、壶、盂、匜、甑、缸、炉、簋、蒸、簠、器盖、支座、纺轮等,鼎的数量大量增加,鼎足形态多种多样,釜的数量大量减少,新见厚胎夹砂大口深腹小平底缸、炉、簋等,并出现了向崧泽文化过渡的趋势。特别是灰坑中发现的三片刻纹白陶,花纹繁缛,纹饰精美,其原生地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地区仅见于安徽繁昌缪墩和浙江桐乡罗家角,此发现对地质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胥溪河(长江自芜湖开始往东经由高淳、溧阳、宜兴的入湖入海通道)的形成年代提供了考古学背景解释。证明远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还存在另一条自西往东的入湖入海通道作为长江的支流而存在,太湖西部地区溧阳神墩遗址的先民已利用这条水路要道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人群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和交流。

同时还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 9 座,出土了一批石钺、斧、镑、凿和陶鼎、豆、壶、罐、杯、匜、双鼻壶、高柄杯、大口缸等,陶质主要为泥质黑皮陶、灰陶、红陶和夹砂红陶等,纹饰为弦纹、篮纹、指甲纹、按捺纹、刻划纹和圆形、半月形、弧线三角形镂孔等。崧泽文化陶器的折腹、圈足底部三等分切割形成凹缺的风格继续存在,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双鼻壶开始出现,年代应为崧泽向良渚文化的过渡时期。大口深腹篮纹厚胎小平底缸承继了太湖西部悠久的历史传统,非常具有地域特色。另外发现的早商时期的灰沟和灰坑遗存也是太湖西部地区的首次发现。特别是灰沟经钻探东北-西南向贯穿整个遗址,分别与南面的溧梅支河和北面的低洼地相通,长约 170 多米、宽约 7.5 米、深约 1.8 米左右,最深处达到 2.7 米,可能是早商时期用于灌溉、走水或储水的水沟,废弃后成为倾倒垃圾的灰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主要有鼎、鬲、袋足甗、豆、盆、罐、觚、杯、尊、刻槽盆、鸭形壶、三足盘、器盖、纺轮等,陶质有夹砂陶、泥质陶和少量硬陶,纹饰中大量为绳纹、方格纹、梯格纹、叶脉纹、篮纹、云雷文、席纹、刻划纹、折线纹、凸棱、指捺纹、各种弦纹及组合纹饰等,比较有特点的是多种灰黑陶的浅盘敞(敛)口细柄豆,往往形成多道弦纹或竹节状柄,甚至形成凸节柄,石器有镑、斧、凿、半月形石刀、犁、镞等,既与太湖东部地区的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早期湖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强烈的自身特色,填补了本地区早商时期古文化的空白。

神墩遗址地处宁镇低山丘陵和宜溧山地向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发掘为进一步确立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以平底釜为中心的新文化类型——骆驼墩文化类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确立了太湖文化区和宁镇文化区的文化分界,对重新全面认识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分区和类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目前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马家浜文化的新类型以太湖西部的宜兴、溧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延

伸,呈C形板块环绕着太湖西部,与太湖东部以桐乡罗家角、嘉兴马家浜等以圈底釜为主要特征的环太湖东部板块,形成了东西对立,相互作用,交相辉映的格局。进入马家浜文化晚期,随着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的异军突起,北阴阳营文化以及古丹阳湖流域的高淳薛城文化类型对环太湖西部的冲击、影响和渗透显著加强,环太湖西部的文化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太湖流域东西并立的格局遭到破坏,东西板块的融合性逐渐加强,但文化传统长期延续,差异性继续存在,为环太湖流域统一性日益增强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角色。

2. 江阴南楼遗址

南楼遗址位于江苏江阴市青阳镇顾家村,20世纪70年代在平整顾家村东北乌龟墩时曾发现有磨制石器;1976年1月开挖革新河时,于南楼村北的遗址范围内又发现泥井9口,井中出土陶鼎、罐、壶等器物60余件,故命名为南楼遗址。今年初当地农民在遗址区大规模植树,遗址遭到很大的破坏。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与江阴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楼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田野考古工作从2月份开始,至5月底结束。

发掘区在顾家村北当地人称作“家后头”的一块高地上,其北为阴大河,东为低洼河地,南为顾家村旧址,西侧是青阳至峭岐的公路和70年代开挖的革新河。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

南楼遗址的地层堆积较浅,耕土层下即暴露各类遗迹,下层为生土层。通过此次发掘了解到该遗址可分商周、崧泽文化时期,其中清理商周时期灰坑10余座;崧泽文化时期墓葬25座、大型壕沟1条、房址4座以及各类灰坑等。

G1为纵贯南北的大型壕沟,宽度约5、清理长度40米。其北接阴大河,南面未发掘,但经过钻探发现其向东转弯后与东部低洼河地相连。G1深约0.9米,主要为灰土堆积,分上、下层。G1内出土各类陶器较多,可知器物有:各类盆型鼎、罐型鼎、豆、盆、罐、壶等,可复原的器物有:带扳盆、粗把敛口豆、敞口深腹盆、敛口束颈盆、小杯等。陶器轮制为主,部分黑皮陶胎壁极薄,反映出当时较高的轮制水平。陶质以夹草灰、蚌沫粗泥质红、褐陶居多,夹砂红陶、褐陶及泥质红陶次之,其他还有泥质灰陶、泥质橙红陶等。纹饰多以素面为主,部分粗泥质鼎、罐口沿下部都饰有宽带状弦纹,鼎足上有按窝、刻槽等痕迹,另见有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等,但数量较少;大部分器物上都涂抹有红色陶衣,部分泥质陶器表面所上红衣光亮如新,另有少量磨光黑皮陶。其中G1下层陶片数量较上层少;从G1剖面可以看出,下层属正常水流淤积,上层堆积明显是人为倾倒垃圾所致。从出土器物分析,G1上、下层年代较为接近。

南楼遗址墓葬大部分分布于G1东面,由南到北可分为3排,每排墓葬为东南—西北方向排列,部分墓葬存在

打破关系。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因上层距耕土层较浅,故有些墓葬保存情况较差,不少墓葬在耕土之下即见器物。其中M7-M9等墓坑较深者,能清理出棺木痕迹。M9葬具保存较好,2.3×1.15米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现存深度0.34米,棺置于墓坑内偏东部,长2.14、宽0.9、现存高度0.32米,沿棺内向下清理后发现朽塌的条状棺盖痕迹,从剖面上来看,棺底部近平,两端略弧,推测为长方形独木棺,随葬品仅见于棺内。

墓葬中人骨架保存大多较差,无法提取鉴定。仅可以牙齿、肢骨的方向来判断头像大多东北—西南向。墓葬内随葬品多南北向排放于墓主身侧,少量墓葬内随葬品摆放于头、身、脚各处。玉石器一般出土于墓主头、胸、腹处。

墓葬中所出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仅见鼎及部分罐。陶色有红、灰、褐等,大部分上有黑皮,少量器物上有红彩,但剥落较甚。纹饰以素面为主,另见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竹节状凸棱等装饰。器形有鼎、豆、壶、罐,部分墓葬见有觚形杯,而钵、器盖、纺轮数量不多。陶器制作大多为轮制,把、足等多为手制而成。陶器豆、罐、壶等形状多样且数量较多,鼎的形制各异,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由于大部分陶器烧成火候较低,质地疏松。

墓内随葬玉石器约100余件,其中玉器约占1/3。玉器形制有璜、块、镯、珠、环、璧、琕、晗、异型块及各类形状玉饰等。玉器均磨制精细,光洁度较好。其表面明显留有弧状的线切割痕迹,打孔多采取管钻、对钻等方法。玉质多受沁风化为白色(鸡骨白),从部分未风化处可观察,一类玉料原色为湖绿色,透光;另一类玉料受沁风化后为青黄黄色,不透光。肉眼观察,玉料均属于透闪石(真玉)料,未见玛瑙、滑石质等“彩石”类玉器。玉器穿孔处有明显光滑的单向磨损痕迹,表明此类玉饰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装饰。从器型上看,该遗址玉器种类较为丰富,其中M13出土的异型块为首次发现的崧泽玉器新器型;M7心型玉为琕,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M92出土口含一致。石器则以钺、斧、镑、凿为主。除部分石器石质较粗糙,风化较严重外,大多保存较好,磨制精细。从表面观察,多采用打制法初制成型,后再精磨、穿孔而成。其中M16出土石钺,整体扁平,大穿孔,有3道刃,为同时期所罕见。

G1西面为主要居住区,发现房屋遗址4座,揭露其中3座。其中F1、F2东西并排排列,F3在其南,呈“品”字形排列,各为直径约6米的圆形房址,保存相对较好。每座房址中部发现有呈方形布置的柱洞,墙基外围皆有排水沟环绕,推测应为地面式建筑。同时在F3基址内发现有圆形灶坑堆积。由于地表破坏较甚,门道、墙体及房屋活动面保存较差,但在房址内发现有夹芦苇杆的红烧土块,应是墙体残块。房址内出土陶片较少,且大多为残片,可辨器形仅有盆、罐等,陶质、器形多与G1内出土器物近似,故两者的使用年代应较相近。F4为长方形房址,位于G1东部,被部分墓葬所打破,保存较差,仅可见西部、南部墙基

浅沟及部分柱洞。

灰坑按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和不规则形,所出遗物以陶片为主。商周时期灰坑所出典型器物为:各类印纹硬陶罐、泥质印纹豆、绳纹鬲、绳纹刻槽盆等,印纹纹饰多为勾连云纹、回形方格纹、梯格纹、变形菱格纹、席纹等。崧泽文化时期如:泥质红陶盆、灰陶杯、敛口深腹平底盆,另有鼎、罐、壶、豆等。

南楼遗址商周时期遗存较少,且遗迹单一,现阶段无法对其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此次发掘以崧泽文化时期遗迹、遗物为主。从遗址布局看,以G1为界,墓葬多集中于G1东部,而房址多分布于西部。推测在一段时期之内,G1应为墓葬区与居住区的分界线,并可能承担一定的防卫功能。从发掘出土的器物来看,此时期内日用陶器与随葬陶器已开始有所区分,部分随葬陶器趋于小、精化发展,已明显具有明器性质。根据陶器出土器物形制、组合关系来看,南楼遗址的相对年代应为崧泽中、晚期。南楼遗址中房址、壕沟、墓葬的连贯性聚落,在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较为罕见。从遗址面积,以及现揭露房屋遗存规模、房址与壕沟的相互关系来看,南楼遗址应是一聚落中心的所在地。

3. 邳州梁王城遗址史前遗存

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西,南距邳州市区约37公里,京杭大运河中运河段从遗址的西部穿过。2004年由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以及邳州博物馆有关人员组成的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学主动的发掘,初步了解了遗址的文化堆积及文化内涵,确定了城址的文化性质。由于沂沭泗河洪水东调南下续建中运河扩大工程将会破坏掉遗址的西部,2006年由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以及邳州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

本次发掘地点在梁王城遗址“金銮殿”高台上,发掘工作从2006年3月至2007年4月20日,发掘面积共计2100平方米。

史前时期: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1处大型制陶作坊以及2座窑址。

该组遗存位于“金銮殿”高台的东北缘,开口于第9层堆积之下,已揭露出来的区域分布于T12、T15以及T3904内,继续向南延伸出探方外,从发掘情况看,该组遗存呈南北向分布,总面积约200平方米,制陶作坊编号为F17,2座窑址分别编号为Y1和Y2。

Y1和Y2位于F17的南部,均为双室窑。Y1除局部被后期破坏外,保存较完好,其平面形状略呈南北向长条形,由双火口、双火膛、

双窑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约2.5米,东西宽约1.4米,残高0.45米。火口南向,前有一半椭圆形浅坑与之相连,应是为方便烧陶而挖的小浅坑。东侧火口圆角梯形,上宽0.3、下宽0.26、高0.36米。西侧火口近圆角方形,宽0.34、高0.36米。从火口往里即是火膛,经过火膛分别进入

两个窑室。窑室平面形状均呈圆角长方形,左右对称,室内南北长约0.95、东西宽0.31~0.56米,面积约0.5平方米,两窑室之间有隔墙,窑顶已坍塌,两窑室内填满了倒塌以后的红烧土堆积,在西窑室底部发现一磨光黑陶残片。窑壁由于长期烧烤形成较为细密的红烧土层,厚0.02~0.11米,窑壁规整,其上部向内微收略呈弧顶状,以便于封窑。从Y1规模及其内发现的陶器残片可以推测该窑用于烧制一些小型的精致陶器。

Y2破坏严重,仅存双火膛下部及部分隔墙、窑室底面。整体形状呈椭圆形,东南西北向,窑门朝东南,窑前有一半椭圆形坑与之相接。残长3.3、宽1.44米,窑室残深0.2米。窑室为双室,两室左右对称。单窑室呈椭圆形,长2.1、宽0.6米。两室之间有隔墙,长1.6、宽0.3、高0.2米。窑壁由于烧烤形成较为致密的烧结面,窑壁厚0.1~0.3米。Y2内堆积为灰黑色土,夹红烧土颗粒及炭屑,出土少量夹砂红陶片,可辨器形有鸭嘴形鼎足等。

F17,在窑址的北面,仅存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基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5米,总面积约60平方米。在红烧土堆积面上发现有较多的柱洞,尤其是房址北部的两长排柱洞,排列规整有序,南排与北排间距约米,每排柱洞间距约米。由于两排柱洞间的空间较窄,在里面活动的余地很小,表明不是一般的居住址,由这两排柱洞支撑的应是凉干陶坯的台子,与制造陶器的建筑设施有关。与南面紧邻2座窑址属同一层面、同一时期。另外在房址的东南发现有一个小灶(Z2)和一条排水沟(G11),更加反映了F17成为制陶作坊其附属设施的完整性。经过解剖得知,F17是一处浅基槽式的建筑,在构筑房子之前,先将地表略微整平,挖一浅坑,填以红烧土堆积作为基础,然后在其上立柱搭建。发掘和钻探显示,在F17、Y1和Y2的东边紧临断崖,落差达6~7米,断崖下是一条大水沟,在水沟边建作坊,筑陶窑,便利制陶和烧陶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利于遗址的环境保护。

F17、Y1和Y2从层位关系和出土物看,应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在距F17不远的西边,有2004年发掘揭示出来的同属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房址F3、F8、F9、F10,红烧土道路L2以及儿童瓮棺葬M2-M7等遗迹,而且这些迹象均处于同一层面上,在80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T2、T6、T7、T8、T9、T12、T15、T3904等八个探方相连在一起)。在这不大的区域内有房址、作坊、道路、窑址、墓葬、水沟、灶、灰坑等众多不同功能的小单元,为我们呈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个小村落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和生产的情景,对研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布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梁王城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极为丰富,通过两次考古发掘,进一步廓清了对梁王城遗址文化堆积、文化内涵的认识,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房址、作坊、窑址以及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产力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 历史时期

苏北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空白多年来未有打破,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的发掘对研究东夷和西周文化以及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徐州地区东汉时期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是一批难得的资料。上坊孙吴墓是我国近年六朝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为研究当时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制瓷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邳州梁王城周代遗存

邳州梁王城周代遗存主要发现有西周墓地和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

西周墓地包括土坑竖穴墓26座,马坑5座、牛坑1座、狗坑1座,这些墓葬均位于发掘区的东部,各类墓葬较为集中的杂错在一起,且多出现叠压和打破关系。

在26座竖穴墓中,除M29、M40、M49外,其余墓葬方向基本一致,在85~135度之间,墓葬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长度在1.8~2.5米之间,宽度在0.5~0.8米之间。现以M25、M27、M31、M49为例介绍如下:

M25,位于T11的南部,开口于层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2.30米,宽0.68米,深1.1米,方向105度。头部两侧有棺痕宽0.34米,残长0.36米。墓内人骨架保存完整,葬式为仰身直肢,面向上,双手相对置于下腹部,人骨经鉴定为一成年男性。随葬品主要放在墓主的头部,有高1件、簋1件、罐1件。在墓底中西部有一个腰坑,坑内葬一只狗。

M27,位于T12的北部,开口于层下,墓口距地表约1.5米,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2.05米,南北宽0.5~0.6米,深0.65米,墓葬方向94°。底部近平,没有发现葬具,在墓葬东端,即墓主人头部有一熟土二层台,宽0.25米,高0.2米。墓内葬人骨架保存完好,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北,两手相对置于下腹,双脚并拢,经鉴定为一成年女性。随葬器物主要放在东端的二层台上,包括有簋、罐各1件,鬲、豆各2件。另外在墓主人左侧肱骨和尺骨之间发现有1件小陶器和2件水晶饰品,其中1件水晶饰品呈六棱状长条形,残长4厘米,饰品晶莹剔透,制作较为精细,另外1件呈片状,周边有修整疤痕,似刮削器。

M31,位于T12的东部,开口于层下,墓口距地表约1.65米,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97度,墓口东西长2.55米,南北宽0.75米,深0.35米,底部近平,没有发现葬具,亦没有二层台。墓内葬一人,人骨架保存较好,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南,两手相对置于下腹,在左侧肱骨上部发现朱砂痕迹。经鉴定,人骨为一壮年男性。墓主人身上佩戴有一海贝串饰,挂在脖子上,从头部经胸前直到下腹部,总长约0.7米,有约160枚海贝,两两相对,串在一起。在墓主人左侧肱骨附近发现有一圆形小陶器,形制略小,用途不明。除此之外,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主人头部,陶器共7件,包括有陶鬲1件,陶簋、陶豆、陶罐各2件,在这些

陶器内均发现有兽类小骨骼,经鉴定,有小猪下颌骨、鸡骨和鱼骨头等。

M31 墓主身上的贝串饰

M49,位于T3904的东南部,开口于层下,墓口距地表约2.2米,东西长1.95米,南北宽1~1.15米,墓口口底大小一致,底部近平,自口至底深约0.4米,墓底中央有一腰坑,呈圆角长方形,长0.85米,宽0.6米,深约0.2米。墓葬方向284度。该墓葬为夫妻合葬墓,没有发现葬具痕迹,两具人骨架保存较好,均为仰身直肢,经鉴定墓主左侧为一男性,右侧为一女性,两墓主人之间随葬有一狗骨架,狗头向着男性墓主人。墓底有腰坑,坑内亦随葬有一具狗骨架。未发现有其它随葬器物。

在发现的兽坑中,除S2为牛坑、S5为狗坑外,其余均为马坑,平面形状多近圆形。这些兽坑与西周墓葬混杂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埋葬规律。由于多数兽坑都遭到破坏,残缺不全,现以S1、S2为例介绍如下。

S1,马坑,位于T12的东南,开口于层下,是此次发掘兽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坑口距地表1.7米,平面形状呈椭圆形,长径长2.1米,短径长1.7米,坑较浅,底部不平,由西向东渐高,深0.1~0.45米,坑底铺有一草席作为葬具,草席的东北部保存尚好。在草席上葬有一马,马头向北,面向西,四肢稍屈,作漫步状。坑内无任何随葬品。

S2,牛坑,位于T15的东南,开口于层下,坑口距地表1.8米,平面形状近圆形,直径2.15米,深0.25~0.4米,方向50度,坑内填土呈深灰褐色,土质疏松,夹草木灰颗粒。坑底部垫有一层草木灰,上葬有一牛,牛头部被后期所破坏,残存有一只牛角,头部以下保存基本完整,前肢蜷曲于腹下,后肢伸直。在牛脖子的下方发现有一铜箭镞,很可能牛是被射死后在埋在这里的。

此次发现的墓葬均出现在和层面上,较为集中的分布在一个区域内,其间还夹杂有兽坑。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基本一致,规模均不大,有随葬器物的墓葬共12座,约占发现墓葬总数的40%。这些墓葬中,有的墓葬有熟土二层台如M27、M34,有的墓葬的墓底中央有长方形腰坑如M25、M49,有的墓葬人骨上撒有朱砂如M31、M43,而大多数墓葬的葬式为仰身直肢,双手相对或交叉在下腹之上,这些埋葬习俗与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发现的埋葬特点是一致的。从随葬器物看,M25的簋与张家坡SCCM173 6的簋形似,M25、M29以及M43的鬲和与张家坡H301的式鬲相似,M27和M31的簋与客省庄SCKM139 6的形似,M27和M31的豆介于客省庄SCKM145 2的式豆和张家坡SCCM157 3的式豆之间,M17的豆与张家坡SCCM453 1的式豆相似,说明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周晚期,而主要集中在早中期阶段,个别墓葬甚至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西周墓地的发掘填补了黄淮地区商周考古的空白。

本次发掘另一重要的收获就是初步揭示出梁王城春

秋战国古城的宫殿风貌,遗迹主要包括有大型夯土台基1座、大型石础建筑1座,分别编号为TJ1、F5。

大型夯土台基TJ1,开口于下,主要分布于T10~T15六个探方内,仅有很小部分进入到T7和T9当中。TJ1位于梁王城遗址“金銮殿”高台的东北部,由于遭后期的扰乱破坏,夯土台基上的建筑遗迹已不存在。台基保存状况不一,有的地方距地表1.5米,有的地方距地表仅0.4米,总体看,台基平面形状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约24米,南北宽近15米,四壁近直,现存最高处约1.4米,方向北偏东3度,总面积约360平方米。在夯土台基西边中部,夯土向西延伸出探方外,宽约2米,长度不清,推测该处夯土可能台阶或是回廊所在。

TJ1采用挖基坑和版筑相结合的办法修筑而成。发掘显示,在台基东西侧采用了挖浅基坑的做法,坑深约0.2米,在坑内对底面进行整平,略加夯实,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台基底部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另一方面又作为基槽使用,增加台基的坚固性。底部向上采用版筑的办法,层层向上夯筑,在台基东壁外侧发现有明显的木板痕迹。台基的夯层十分清晰,每层厚0.15~0.25米,现存夯土最厚的有八层,最薄的仅一层。整体上采用平夯的办法,夯面平整光滑,极为坚硬,局部夯窝明显,直径0.04~0.05米。夯土灰绿色,夹红烧土颗粒及碳屑等,土质结构紧密细腻,夯土内出土有陶片、骨头等,陶片均比较碎小,有绳纹筒瓦残片、绳纹灰陶残片、泥质灰陶残片及印纹硬陶片等。从夯土内出土的陶片看,台基的建筑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

大型石础建筑F5,位于T7及T9的西半部,2004年发掘时已完全揭露,现存排列整齐的11个石础坑。整体平面呈东西长方形,与TJ1的方向保持一致,其南侧紧邻TJ1,今年的发掘证明F5与TJ1均修筑于距地表约1.6米的层面上,两者关系密切,应该属于一个整体,F5应该是夯土台基TJ1的附属建筑。

夯土台基TJ1、大型石础建筑F5等遗迹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梁王城遗址城墙的建筑年代相同,也就是说这些遗迹与城墙是同一时期的遗存。2004年我们曾对城墙进行解剖和钻探,确认城址属于春秋战国时期,面积有100多万平方米。这么大的城池,其城内的宫殿规模必然不小。此次发掘出来的夯土台基TJ1的面积有360平方米,大型石础建筑F5的面积有120平方米,总面积有480平方米,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物其修筑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这组建筑遗存位于城内西部中间的高台上,比周围的平地高出许多。2005年我们对高台以外的平地进行了全面钻探,自地表以下2米左右基本上洪泛淤土。因此,从这组建筑的年代、规模以及地理位置,我们判定大型夯土TJ1和大型石础建筑F5是梁王城春秋战国城池的宫殿基址。

西周墓地的揭露为黄淮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及徐国史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春秋战国时

期宫殿基址的揭示对探讨梁王城城址的平面布局指明了方向。

2. 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

山头墓地位于邳州市戴庄镇山头村西,中运河东岸,东北有胜阳山和禹王山。2006年11月10日,在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洛马湖水资源控制工程邳州支河控制闸建设工地发现大量墓葬,接群众举报后邳州博物馆立即给工程部门下达了停工通知,随后南京博物院梁王城考古队对其施工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确定为一处东汉墓葬群。由于该文物点未在南水北调江苏段文物保护规划之内,经省文物局与水利厅相关部门反复协商,把山头墓地纳入南水北调文物保护规划之内进行考古抢救发掘。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2月1日,由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有关考古人员组成山头考古队对山头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共清理了东汉墓葬45座、明清墓葬3座,出土了绿釉陶器、瓷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 etc 文物共300多件。以下简要介绍东汉墓葬的考古抢救发掘情况。

本次发掘基本揭示了山头墓地的全貌。山头墓葬群开口于第 层灰褐土层下,距地面深约2.6米。墓地东西长80米,南北长82.5米,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发掘清理了5500平方米,共发现东汉墓葬45座,以及围绕墓地的隍壕1条。墓葬形制有土坑砖室墓、砖室券顶墓以及砖石混合结构墓三种,其中土坑砖室墓20座,砖室券顶墓18座,砖石混合结构墓7座,以砖石混合结构墓的规格最高。大多数墓葬带有斜坡墓道,墓道基本上都朝着正北方,墓主人则是头南脚北葬在其中。虽然多数墓葬在早期时已被破坏,但是个别保存完好的墓葬、所有的墓葬形制以及幸存的随葬品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M3,土坑砖室墓,未被扰乱,墓口距地表2.6米。平面呈梯形,方向95度。墓口长3.8~4、宽3.1~宽3米,墓深2.83米。墓室下半部四壁由长方形小青砖顺置错缝紧贴土坑平砌而成,北壁由于坍塌而向内鼓出。墓底西半部以小青砖纵向错缝平铺,东半部宽约0.7米的区域未铺青砖。小青砖长0.3、宽0.13、厚0.08米。墓主人骨保存较差,仅在墓底西南处发现若干段散乱的下肢骨。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墓底的北部,有陶壶7件,陶罐2件,陶盘、陶磨、陶仓、陶钵、陶灶、陶盆等各1件,在紧靠南壁处出土有1把铁剑,长0.89米,东西向放置,保存较完好。

M20,砖室券顶墓,被扰乱,墓口距地表2.6米,带斜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方向为正南北。墓道朝北,南宽北窄,壁面较直,墓道下口长3.32、北宽0.95、南宽1.1、深0~1.3米。封门已坍塌,可以看出是用小青砖横置错缝平砌而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拱形券顶大部已坍塌。拱顶残高0.35米,墓室长4.05、南宽2.34、北宽2.1、深1.3米。东、南、西壁用长方形小红砖或青砖顺置错缝平砌,墓底以方形砖横置平铺而成。墓主头骨和肢骨散乱于墓底西南部,出土

有铁棺钉,原应有木质葬具。在墓底南部出土有铜镜2枚、铜钱3枚,墓底北部出有陶仓、陶磨各1件。

M21, 砖石混合结构墓,被扰乱,墓口距地表2.6米。带双斜坡墓道,前后室,平面近长方形,方向7度。墓总长7.8、宽3.2米。双墓道均朝北,平面各为长方形,壁面较直。东墓道上口长2.16、宽0.7~0.92、深0~1.4米,西墓道上口长1.94、宽0.7、深0~1.04米。墓道与墓室间有石封门,东侧封门石竖置紧靠上部长条石,封石宽0.9、高1.22、厚0.2米。西侧墓门处封石直接压于上部长条石下,长1、高1.1、厚0.22米。墓室分前后两室:前室东西两壁长方形条形砖顺置错缝平砌,南北两壁以石板砌筑。前后室之间石板留有两门道,门道两侧立石下部各有一浮雕石羊。两门道之间的石板透雕一窗棂,窗宽0.52、高0.35米。东门道宽0.66、高1.1米,西门道宽0.24~0.32、高1.1米;后室底面高于前室0.1米,后室由东、西两个拱形券顶砖室组成,券顶上部已坍塌。东墓室长3.12、宽1.82、高1.6米,西墓室长3.3、宽1.1、高0.9米。东、南、西壁用长方形灰砖顺置错缝平砌,前墓室墓底灰砖顺置错缝平铺,后室横砖错缝平铺。墓砖向内一侧饰变形云纹,砖长0.36、宽0.16、厚0.08米。东墓室和西墓室均发现有零星人骨,人骨保存较差,从东墓室发现的盆骨分析,东墓室墓主为男性。在前室西部及西侧后室北部发现较大面积的漆皮,应该为木棺腐朽残留。随葬品主要放置于前室和两墓室的北部,出土有铜弩机、铜饰、陶猪圈、陶井、陶盘口壶、陶器盖、陶磨各1件,陶灶、陶甗、陶耳杯、石握、铜釭各2件,陶釜3件,陶罐6件,铜钱8枚。

在墓葬的周围发现有大型的隍壕,壕内为青灰淤土,较纯净,同样开口于层灰褐土下,将整个墓地环绕其中。在墓地的东南处有片较纯净的黄褐土将青灰淤土隔断,可能是墓地的出入口所在,出入口外宽内窄,外宽约13米,内宽约8米。从已揭露的隍壕及施工断面显示的青灰淤土堆积层推定,墓地隍壕大致为园角方形,隍壕宽约20米。

本次发掘基本揭示了山头东汉墓地的全貌,各墓葬间很少有打破关系,墓葬成排分布,初步分析有南北五排,每排墓葬数量基本在10座左右。大多数墓葬的墓道都朝向北方,相当一部分墓葬形制相同的墓葬成双靠在一起,例如土坑砖室墓M3和M9、M1和M2,砖室券顶墓M15和M16、M18和M19等。我们推测这种形制相同,空间上相邻的墓葬应是一夫一妻葬,当然这只是推测,还需要人骨性别的鉴定以及随葬品相对年代的分析。本次发掘于M40西侧发现有较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可能为祭祀遗迹。尤其是在墓地的周围发现有隍壕,在东南部发现有进出墓地的出入口,比较完整地揭示了这一片墓地。从墓葬的分布规律、形制结构、随葬品,以及墓地外围的大型隍壕,我们初步推测山头墓地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家族墓地。

山头墓地所在的徐州地区,以汉文化最为著名,历年来,发掘过多座诸侯王陵。但系统地发掘一个完整的墓地则是

第一次。因这片墓地后来被黄泛土所深埋于地下近3米,没有受到后世建筑的叠压和破坏,因此完整保留了东汉家族墓葬的墓园,在墓地核心区发现了因祭祀用火而烧成的红烧土遗迹。墓葬结构完整,分组明显,对研究东汉时期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东汉墓葬并不鲜见,但如此典型和完整的墓园很珍贵,尤其是隍壕,在东汉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此类设施在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中就有发现,在日本的古坟时代天皇的陵园外围就开挖一道或多道隍壕,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3. 南京上坊孙吴墓

2005年12月22日,南京南郊江宁区科学园管委会在上坊镇中下村道路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大型孙吴砖室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江宁区博物馆对整个发掘工作给予协助。发掘工作于2006年8月上旬结束。考古发掘表明,此墓规模罕见,结构独特,出土文物丰富精美,是我国六朝墓葬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墓葬位于江宁区上坊镇中下村孙家坟土岗的南麓,为土坑竖穴砖室结构。墓葬由封土、墓坑、斜坡墓道、排水沟和砖室等部分组成。发掘前封土、前室顶部及墓坑、排水沟上部填土被施工机械掘毁。

墓坑长21.5、宽14.4米,坑内填土经过夯打,其上部设有3层碎石用于防盗,层厚12~32厘米。墓道残长10.5、宽4.3米,墓道底部呈斜坡状,墓道内填土经过夯打。在距封门墙85厘米处,填有2层碎石带,相距20、层厚8~12厘米。排水沟从砖室内的甬道口铺地砖下,穿过石门、封门墙、斜坡墓道,一直向南延伸,经过勘探和平面揭露的长度有106米。在墓道内的部分偏于东侧,系在斜坡墓道底部开挖沟槽,底宽0.74米。沟槽两壁略内倾,其内填土纯净。沟槽底部直接砌筑于经过人工修整的山体岩面上,两侧用砖纵向平铺4层,上覆1层斜向侧立砖,中间留有宽18厘米的泻水孔。砖室长20.16、宽10.71米,由封门墙、石门、长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构成,前、后室两侧均有对称分布的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2个大壁龛。封门墙高大厚实,紧贴于甬道口外部,宽3.94、厚1.88、高3.44米。其内设一道石门,东侧门槛、门柱和部分门楣保存尚好,石门扇和西门柱等已被盗墓者砸碎移至甬道和前室。

甬道券顶,长5、内宽2.45、内高2.28米。前室方形,中部略鼓,南北内长4.48、东西内宽4.48、残高5米。前室东耳室内长2.49、内宽1.73、内高1.81米。前室西耳室内长2.5、内宽1.74、内高1.86米。前、后室之间的过道券顶,长1.77、内宽1.94、内高2.06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中部略向外弧凸,南北内长6.03、东西内宽4.56、残高4.04米。后室东耳室内长2.49、内宽1.8、内高1.91米。后室西耳室内长2.48、内宽1.77、内高1.91米。后室后壁底部有2个大壁龛。

墓葬前、后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甬道、过道及4个耳室均为券顶结构。墓壁均先以“三顺一丁”组砖砌砌底部裙墙,以上的券顶以顺砖平砌起券至顶,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则从中央向两侧斜砌成倒“人”字形结顶。前室顶部发现有巨型覆顶石,内面雕有精美的神兽纹。前、后室四隅中部嵌有石质兽首形圆雕,上部壁面有烟熏的痕迹,推测为摆放灯具的灯台。后室后部发现有3组6件石棺座,两端雕为虎首状。棺座上置木棺,棺板已朽散。墓底铺地砖2层,上层多为大方砖平铺,大方砖边长50厘米。部分墓砖上模印有纹饰,主要有钱纹、放射纹、十字纹、车轨纹等。此外,还在墓葬的东南方约30米的地方,发现一处与墓地相关的建筑遗迹,遗迹大部分已遭施工机械破坏。地层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及碎砖瓦块,清理灰坑3座。灰坑形状规整,平面呈椭圆形或近长方形,坑内出土大量碎砖瓦块,有残筒瓦、板瓦以及26枚人面纹瓦当等。人面纹瓦当图案精美,类型多样,是南京六朝墓葬考古的首次发现。尽管此墓早年曾遭严重盗掘,后室顶部坍塌,墓内满积淤土,但仍出土金、银、铜、铁、漆木、瓷、陶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70多件和600余枚铜钱。这些随葬品以残碎居多,同一器物碎片往往分布于墓内不同位置,然其中大部分能够修复成器。

出土文物中以青瓷器占大宗,是南京地区六朝墓葬中出土瓷器数量最多、器类最全的一座。绝大多数瓷器制作精美,多施青釉或青黄釉,按用途可分为多类:生活用器类,主要有罐、盘口壶、盏、钵、碗、盘、果盒、耳杯、熏篮、洗、唾壶、鏃斗、器盖等。仅罐类就有双领罐、双系罐、四系罐。其中2件钱纹罐器形硕大,肩腹部模印双圆圈十字钱纹,是同时期墓葬中最大的一件。生活用具类模型明器,主要有碓、簸箕、扫帚、杵、筛、斗、量、磨、灶、柱形器、辟邪形插器等。文房用具类模型明器,有毛笔、书刀,均刻画细致。牲畜

及其笼圈类模型明器,牲畜主要有马、牛、猪、羊、鸡等,笼圈类器分为有顶和无顶,以前者居多。牛车,出土4套,车厢和牛均施青釉,车轮和车轴未施釉。在车轮和车轴两端分别刻有“日”、“月”、“合”、“令”等,轮和轴刻文相合者,配为一套。人物俑,共20余件,有立侍俑、伎乐俑、跪坐俑、跪拜俑等。这些人物俑发髻、服饰多样,神态不一,或梳高髻,或戴小平冠,或衣大袖长袍,或穿半袖短衫,有的还刻饰有腰带。其中各类伎乐俑或抚琴,或击鼓,或吹奏,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似乎为一组轻歌曼舞的场景。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件人物俑,正襟危坐于榻上,双手拢于胸前,面容慈祥 and 善,在榻前置有一长条形案,显示出身份比较特殊。

金银器有环、珠、心形叶片、箔片、冥钱、带扣等。铜器有弩机、盘、鏃斗等。铁器有棺钉、饰件等。漆器多腐朽,可辨器形有器盖、奩盒等,均木胎,外髹黑漆,其上彩绘有色彩明快的婴戏、瑞兽、云气等图案,线条流畅,生动传神,为孙吴时期绘画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出土的铜钱,有半两、五铢、货泉、太平百钱、直百五铢、大泉当千等。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出土的铜钱及青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特点,可以推定此墓时代为孙吴晚期,而墓葬的规模、等级则表明墓主身份为当时高等级贵族,或为孙吴宗室。南京是孙吴都城建业所在地,迄今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孙吴墓葬,此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一座,其前室顶部的巨型覆顶石,前、后室四隅的兽首形石灯台,后室的大型虎首状石棺座等,都是这一时期同类墓葬设施的首次发现。出土的大量青瓷器釉色莹润,工艺精湛,不少模型明器如柱形器、毛笔、书刀、斗、量、干栏式鸡舍和用文字记号装配的牛车等是六朝墓葬考古中前所未见的新器形或现象。特别是一组瓷俑,是同时期单个墓葬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多制作精巧,人物形象刻画逼真,堪称十分珍贵的六朝瓷器艺术品。(林留根)

十一. 上海市

(一)嘉定区明代古墓

2006年6月8日,上海市嘉定博物馆接到报告,在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先农村的新农村建设工地内发现古墓,随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察看。据出土的2块墓志铭显示,该墓系明万历初期的夫妇合葬墓,被命名为李汝节夫妇墓。

6月9日上午,上海市文管委考古部专家和嘉定博物馆的同志赶到现场,判断该墓葬具有一定的规格等级,决定对其进行正式发掘。李汝节夫妇墓坐北朝南,石室双穴,石质为花岗岩,糯米浆粘合土封筑,均内棺外槨。李汝节棺盖上楷书“员外郎新斋”,棺内尸骨已腐烂,但随葬器保存良好,主要有木雕腰带、铜镜、金发簪各一件和木梳等。李汝节夫人程宜人棺盖内侧有北斗七星图案,棺内清理出发簪、耳坠、金玉戒指、铜镜、纸质文牒、腰带等数十件(套)文物。查地方志书及有关史料,墓主李汝节,字道亨,新斋

应是其晚年之号,嘉定南翔人,南翔李氏是著名的文化世家。李汝节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的学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曾任安吉知州、饶州通判、刑部员外郎、登州同知。李汝节墓志铭由徐学谟所撰,徐学谟与李汝节同为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为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汝节夫人程宜人墓志铭由王锡爵所撰,宜人为明代五品职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王锡爵也是嘉定人,为明代著名文学家。

此后,工作人员又对李汝节夫妇墓右侧的一座墓葬进行了挖掘清理。通过发掘得知,这也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但规模小于李汝节夫妇墓,未发现墓志铭。据光绪《嘉定县志》有关古墓的记载推测,这座合葬墓应是李先芳夫妇的合葬墓。李先芳字茂实,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

虽然上海此前曾出土过明代古墓,但是,有石虎、石羊

等镇墓兽及大量陪葬品的墓葬尚属少数。在明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在墓中放置这些陪葬品,并且此处墓穴是家族石室墓,且墓室内填满石灰以及棺内随葬宣纸等在上海非常少见。此次发掘对于研究明代万历时期的上海史尤其是嘉定地方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汉洪 邵辉 马剑颖 陶继明)

(二) 上海普陀区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2001年5月发现的志丹苑遗址,经过2002年考古发掘,2004-2005年小范围发掘和2006年全面开挖,已经完整暴露,是迄今中国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结构严谨、做工考究、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元代水闸。

遗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和延长西路交界处,这里是明代之前的吴淞江下游故道范围。水闸平面呈对称八字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东西长42、进水口宽32、出水口宽33米。河水由西北流向东南。整体由闸门、闸墙、底石、夯筑三合土等组成。

闸门,又称金门,是水闸最为关键部分。门柱为长方体青石柱,上部稍有残损,其中南方柱残高4.6、北石柱残高6、两石柱之间宽6.8米。石柱两侧面正上端开凿孔眼、正面凿出闸板槽口,宽0.28,进深0.18米。槽口下部保留一块木闸板,闸板左右两端插有木销,木销上承托长条木板。闸板下安置木门槛,高0.31、宽0.6米。门槛下部左右两边各凿出两个穿孔,其中一个穿孔内出土正隆元宝1枚。门槛下横铺青石条,其下为底石。闸门两侧底石上散置铁钩、铁环、铁铜、铸铁残件等,可能是同启闭闸板有关的部件。

闸墙,又称金刚墙,长47、残高1.3-2.1米。由青石条层砌筑而成,现保存4-6层。闸墙以折角分为三段,紧靠闸门的一段称为正身或身;正身两端左右斜张如八字形者称雁翅;雁翅外端的一段为裹头。裹头内侧立密集高大的木桩,木桩上端与闸墙高度相当,部分木桩上刻文字。其中顺闸墙雁翅走势的一排木桩,内侧横置档水木板。高大木桩与档水木板的作用是在涨退潮与启闭闸门时,减缓水流的冲击力度。出水口裹头旁发现2件石夯。闸墙四角有木护角,顶端有顶石木桩。闸墙外砌衬河砖,有顺砌、丁砌和斗砌等不同砌法,逐层相向砌成,砖缝之间填灰浆。

衬河砖的高度同闸墙高度相当,宽1-1.35米。砖的规格基本相同,长0.38、宽0.19、厚0.08米。

衬河砖外堆砌荒石,荒石形状不规则,表面加工痕迹明显,为切割石条、石板等遗留下的边角料,当为废物利用。闸墙、衬河砖、荒石三者牢固连成一体。底石东西长30、南北宽6.8-16米。由长方形青石板平铺而成,表面平整。石板厚0.25米,石板之间企口拼接,面上凿凹槽并镶嵌铁锭,铁锭与石板接缝处和铁锭表面均灌满砂浆,以防止渗水和石板错位。石板下满铺厚0.2米的木板材,称衬石木板,拼接处亦为企口并以铁扒钉固定。衬石木板上被木梁承载,木梁下有地钉(木桩)支撑。

底石的东西两端铺设木板,上部平铺一块,宽

0.2-0.26、厚0.18米,下部直立7块木板,各宽约0.3、厚0.18米,拼接成通高2.04米的板墙。上部的平铺木板每隔0.3米钉铁钉固定在下部木板上,铁钉顶端涂满砂浆。木板之外裁密集的地钉(木桩),地钉上端与底石齐平,以加固底石。

闸墙,衬河砖和荒石的外侧夯筑三合一,宽2-10米不等,其另一侧边缘是水闸与旧河道分界处。三合土由碎砖瓦层和黄土层相间夯筑,含大量残砖碎瓦和碎石块,夹杂少量陶瓷残片等。三合土内包含物年代最早的为元代。三合土之下裁密集分布的地钉。最外面的一排地钉距闸门石柱9米左右,顶部与保存最高的闸墙高度大致在同一水平线。地钉从外到内逐渐降低,直至荒石下,高低落差2米多。最外三排地钉粗大,排列比较整齐,桩间距约0.5米,为排桩,其内的地钉分布密集。部分地钉的上半部有文字,为墨书,内容主要记载地钉的数量,个别文字旁有戳记。其中一根地钉上有八思巴文印章戳记,为水闸的断代提供了直接证据。在有八思巴文戳记的地钉附近,平放1件木夯。

通过全面发掘,已搞清建造水闸的施工顺序。先选定建闸位置,挖出底槽,然后满打地钉加固土体。底石下的地钉空隙之处填嵌碎石并夯实,地钉上架木梁、铺衬石木板,一直铺到衬河砖下。衬石木板上铺石板,为底石、再建闸墙、立闸门石柱,闸墙基础为大石块,建在衬石木板上,其上砌多层石条。闸门石柱夹在闸墙之间,背后顶大石块。石墙外砌衬河并堆垒荒石,荒石外夯筑三合土。水闸工程使用了木、石、铁、沙等多种建筑材料。木板料有木桩、木梁、衬石木板、闸板和挡水下板等,初步估算木桩就有上万根。石材全部为青石,有闸门石柱、石墙和底石等,估算使用毛石约1000立方米。铁质材料有铁锭、铁钉等,底石上镶嵌的铁锭近400只。

根据建水闸所用木桩上的八思巴文戳记和三合土中包含物的最晚年代等,可以确定水闸建于元代。据文献记载,元代在吴淞江及其支流上建造的水闸有:元大德八年(1304年),任仁发奏立都水监,开吴淞江、置木闸;元大德十年(1306年),任仁发于新泾安置木闸二座;元泰定二年(1325年),任仁发于嘉定之赵浦,上海之潘家浜、乌泥泾三处、各置石闸二座。志丹苑水闸遗址为石闸,座该同元泰定一年建造的六座石闸相关,而六座石闸所处的地理位置,只有赵浦闸和志丹苑水闸位置相近。元代任仁发《水利集》卷七云:吴淞江北岸有“东彭越浦、西彭越浦、赵浦、大场浦、桃树浦”。《三吴水考》记载:“又东为桃树浦,又东为大场浦,又东为赵浦,又东为彭越浦,又东为卢泾浦,俱北通走马塘,南入吴淞江。”

志丹苑水闸遗址的位置正好在大场浦与彭越浦之间,同文献记载吻合。因此志丹苑水闸遗址就是元泰定二年由任仁发主持建造的赵浦闸。任仁发,上海人,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和画家,致力于吴淞江的治理,还参加了元大都(今北京市)通惠河扬隐闸的修建,以及汴梁黄河、镇江练湖,杭

州盐官海塘等多项工程。

志丹苑水闸的建造工艺,同宋《营造法式》水利工程的官式做法多有相同之处。同任仁发《水利集》卷一(营造法式)所记载建造水闸的技术要求与用材尺寸基本相同,“譬欲造闸,长九丈,阔二丈,深二丈,须是开掘河身长十四丈,阔八丈,深三丈。如闸造以上,以下者,从数增减”:“下桩,用松桩,上等长者一丈八尺,径一尺,二千条,中等者一丈四尺,径九寸,四千条;下等者九尺,径七寸、八寸者三千条。用上等者作顶星桩,中等者作撒星桩,下等者作挨桩。于桩侧用瓦屑,膏淤泥和填,从一尺起,渐渐筑打积高,须要十分筑实力止”。志丹苑水闸遗址底石长31、闸门宽6.8,闸墙高约2、闸身长42米;底石与衬石木板下的地钉长4、直径约0.3米,为顶星桩,荒石外密集的地钉,直径0.2~0.25米,为散星桩和挨桩,地钉间用碎砖填实。可见任仁发建造水闸的方法在建造赵浦闸中得到了完整实施。

建造赵浦闸等六座水闸的目的,任仁发《水利集》中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吴淞江流域江湖泛涨,海潮带沙入港,易于壅塞,因此,元泰定二年八月,中书省、江浙行省奏准设立都水庸田使司,以任仁发为副使,治理吴淞江,建闸多座,以通泄江水,节泄水势,疏浚吴淞江。由此可知,水闸的功能就是泄水挡沙和蓄水冲沙,以助吴淞江的防淤和疏浚。操作方法,是涨潮时关闭闸门,使泥沙沉积在闸门外,退潮时开启闸门,利用水闸内外的水流落差,用闸内的清水将闸外的泥沙冲走。

志丹苑元代水闸的发现,在中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对研究13世纪以后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吴淞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吴淞江对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上海城镇、城市发展起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发掘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宋建 何继英 翟杨)

十二. 四川省

(一) 沱牌泰安作坊

2006年10月27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沱牌公司组织的“四川省沱牌泰安作坊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四川射洪泰安作坊遗址发掘现场举行。来自全国的12位文物考古专家在考察发掘现场和出土遗物后,初步认定该遗址主要堆积为明清时代,延续至近现代。考古发掘证实沱牌泰安作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白酒作坊。

专家们一致认为泰安作坊遗址地层关系明确,发掘过程规范,发现的遗迹遗物比较丰富,考古信息记录翔实。本次发掘揭露出的遗迹有晾床、酒窖、接酒坑、灰坑等。出土遗物包括酿酒、饮酒和日常生活用具。完整及可修复的遗物100多件,部分器物品级较高。在300平方米范围内分布如此多的遗迹遗物,反映出其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其中文字酒具、品酒杯和大量生活用具的发现尤为重要。

该遗址和四川已发掘的水井街酒坊遗址、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等同为四川传统白酒工业的重要文化遗产,这是四川乃至全国传统白酒工业作坊遗址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

(张伟)

(二) 石棉三星遗址

三星遗址位于四川省石棉县丰乐乡三星村,地处大渡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大冲河从遗址北部流过。三星遗址A区主要指三星村一组,B区主要指田家村一组,以大冲沟为界。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三星遗址先后发现了一批石器、青铜器。2003年在瀑布沟水电站建设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进行了考古调查。为全面了解三星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建立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今年4月11日~5月1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木骨泥墙建筑1处,商周时期圆形干栏式建筑和长方形干栏式建筑各1处、灰坑12个,墓葬4座、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石核、细石器物。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其主要集中在第8层、H10、H11和F5,出土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纹饰主要是绳纹、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等,器型均为平底器,包括敞口罐和直口罐。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石斧、石镑以及船形石核、柱形石核、扇形石核、三棱形石核、楔形石核等和大量的细石器。同时发现了一座木骨泥墙式建筑(F5),平面呈长方形,现存面积约16平方米,其结构为房子四周墙基挖沟槽,沟底掘柱洞和小槽子,柱间立小木(竹)棍,再于沟内填土埋实,小棍上编缀竹条,然后涂草拌泥。

这是首次在石棉县境内发现的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堆积,对大渡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出土的大量的细石器及石器对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传统及其西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的特征具有重要作用。

二、商周时期的堆积,这是三星遗址的主要内涵。堆积厚度约1米,遗迹主要有灰坑和房屋,其中这一时期的房屋以干栏式建筑为主,本次发掘清理了一座圆形干栏式建筑(F2)和一座长方形干栏式建筑(F3)。

F2平面呈圆形,直径4.8米,总建筑面积约25平方米,周围分布着10个柱洞,里面分布着4个柱洞,从柱洞大小推测该建筑应在3层以上。F3平面呈圆形,长5、宽2.6米,总建筑面积约14平方米,周围分布着8个柱洞,从柱洞大小推测该建筑应在2层以上。

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为主,大部分为素面,只有少量的绳纹和弦纹,器型以平底

器和尖底器为主,包括罐、缸、高柄豆、灯形器、圈足豆、小平底罐、瓶、捏瓣器柄等。石器选材较为普遍,器形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石斧、石镑、石刀、盘状器以及船形石核、柱形石核、扇形石核、三棱形石核、楔形石核和少量的石器残件等,同时各层伴出大量的细石器。出土陶器与成都平原地区的十二桥文化早期(即12、13层)出土的陶器风格较为相似,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关系以及“蜀人南迁”的历史有重要作用。

以三星遗址为代表的大渡河中游地区的商周文化,主要分布在大渡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其典型的遗址还见于汉源麻家山、麦坪、桃坪等遗址。主要内涵与成都平原地区的十二桥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其又表现出自身的发展特征,如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与成都平原地区以磨制的“斧、镑、凿”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判然有别,同时十二桥遗址常见的尖底器在大渡河中游地区并不很流行,主要流行平底器。鉴于此,考古人员认为将以三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三星类型”,有助于解决十二桥文化的分布、内涵及其发展。

三、本次发掘还清理了2座唐墓、2座宋墓和1座石结构建筑。唐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将人骨、随葬品和棺材放在墓室后,进行焚烧。随葬品有釉陶碗、四系罐和“开元通宝”铜钱。

大渡河中游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其文化特征有着自身的文化因素,大量细石器的出土就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可能来源于“富林旧石器时代文化”,而与我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有着不同的特征。三星遗址的发掘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完整堆积,对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作用。(陈卫东 周科华)

(三)汉源麦坪遗址

2006年5-6月,在汉源瀑布沟水库建设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库区麦坪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新石器、商周、汉等时期文化遗存。初步确认了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新发现商周时期西南一支少数民族族裔墓地。

遗址堆积以新石器时代为主,堆积单纯。发现有灰坑、房址、窑废弃堆积等。灰坑多数为长椭圆状坑,坑壁加工规整,坑底有意识,有规律放置块石数块,多数在坑壁周围发现部分小型动物骨头。坑内大部分填有大量陶片和一些石器,陶片从质地、纹饰看同遗址地层出土相同。房基为平地起建的小型木骨泥墙式建筑,发现有墙基槽、柱洞等。从暴露情况看,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双开间;基槽直壁,平底略弧;柱洞直壁,弧底。还发现有一处废弃窑渣集中堆放的遗迹,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和褐色黏土焦结的现象,也发现包含有类似炉渣的黑色渣土。表层包含大量陶片,质地、颜色多相同,均为夹细砂红陶。主要器形有直口罐、瓮、敞

口卷沿罐等。这处遗迹应该是附近窑炉清理后的堆积,为寻找此遗址早期烧陶遗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陶器以夹细砂灰褐陶、黑陶、红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泥质陶。火候较高,手制为主,部分有慢轮修整痕迹。纹饰以细绳纹为主,也常见绳纹上贴塑附加堆纹、素面,另有交错绳纹、戳印纹、刻画纹、细线纹、波浪纹、圆圈纹、蓖点纹、剔刺纹等。可辨器形以敞口卷沿罐、侈口深腹罐、敛口钵为主,另有直口罐、喇叭口罐、敛口瓮、盆等。石器数量较多,制法有打制、磨制、琢制。种类有斧、镑、凿、刀、穿孔石刀、细石器。

遗址发掘出土敞口卷沿罐、侈口圆唇罐、敛口钵、瓦棱纹盆等和岷江上游汶川姜维城、茂县营盘山同类器相似;口部贴塑附加堆纹的手法,也见于安宁河流域的横栏山、咪咪郎等遗址,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出土的敞口宽沿罐、敞口平沿矮领罐、敛口瓮等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一宝敦同类器形相似;遗址盛行半月形穿孔石刀,和澜沧江上游以昌都卡若为代表的遗址相似;初步推断遗址的年代当在距今4000-4500年。

清理的8座商周墓葬排列有序,均为西北向,另在探区以西初步钻探,可能还分布有一定数量墓葬,故此次发掘应是该墓地的一部分。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1.9-2.4米,其中2座墓主可能未成年,形制较小,与成人墓间距较小。多数都在墓坑的一角放置一较大块石,可能是标记墓葬位置所用。其中一座墓坑内墓主骨架上覆盖有2排块石。随葬器物组合清晰,基本组合为头部放置夹粗砂侈口鼓腹平底罐1个,脚部放置平底钵(碗)3个,仅一小孩墓头部放置1个罐,脚部放置1个钵。3座墓葬另在膝盖处放置石箭镞2个,另有一座在颈部放置玉珥2个。随葬陶器陶质为夹粗砂黑陶、黑褐陶,器身素面,底部施“叶脉纹”。

随葬的陶钵、陶碗,似乎和安宁河流域的礼州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中陶碗和云南弥渡笄力石棺葬同类器形很接近。陶钵和会理箕箕湾墓地出土同类器相似。器物底部施“叶脉纹”是四川境内商周、汉早期土著民族的风格。综合来看,这批墓葬年代和以上遗址年代相当或略早。本次发掘的早期墓葬,随葬器物组合清晰,为近年来四川考古发现所少见,其随葬器形组合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对全面了解大渡河中游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别是民族走廊内民族的迁徙、融合,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大渡河中游地区有一定的时空分布,如狮子山遗址、大地头遗址。这类遗存是适应山地生态环境和当时气候环境的典型实例,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没有桎梏文化的交流、传播,相反对同时期周边文化兼收并蓄,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本次发掘墓葬,出土器物组合清晰,为近年来四川所罕见,更多可能是早期西南少数民族先民遗存。其具体的年代及和周边文化的关联

有待进一步研究。

(郭富任江)

(四)成都市考古

2006年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除在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外,重点放在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与环境的考古调查。历史时期的考古主要有佛教寺院、墓地、瓷窑的调查与发掘,部分是为大型遗址的保护所作的调查与发掘。由于成都平原古代文化与周邻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弄清成都平原古代文化的来龙去脉,与周邻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变迁动因等,必须要将成都平原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和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内去关注,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与阐释,有些问题才会看得明白。因此近年我所很重视对成都平原周邻地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2006年继续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安宁河流域进行了系列考古调查、发掘。通过这些工作,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川西高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川西高原是联系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走廊,这个区域的考古研究对整个西南地区古代文化、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岷江上游史前考古

2000~2005年,我所在对岷江上游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试掘和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茂县波西遗址进行了两次试掘。上述工作为研究岷江上游史前文化提供了科学发掘的研究资料。营盘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面貌较为相似。波西遗址出土遗物显示,部分遗物可早到庙底沟时期,但遗物还太少。有意思的是,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与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遗存相比,也有一些相近似的特征,之间好象应有某种承继的关系,但二者之间有比较大的时间缺环,这种关系不是十分清楚,而在茂县调查发现的沙乌都遗址采集到的陶片却与宝墩文化很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值得进一步作工作弄清的问题:岷江上游史前时期与甘青地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往上能追溯到什么年代?后来明显岷江上游与甘青地区的文化各自走了不同的路,目前岷江上游还没有发现“半山”、“马厂”的遗存,营盘山与马家窑文化近似的遗存是如何发展成沙乌都那类遗存的?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近年三峡地区的考古取得了大的进展,其新石器文化面貌已比较清晰。我们注意到,巫山以西的渝东地区发现最早的是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城背溪文化,后来的大溪文化遗存好象还基本没有发现。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侵入一支明显不属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系统的一支新的文化,就是以丰都玉溪坪,忠县哨棚嘴、中坝,奉节老关庙等为代表的“哨棚嘴文化”,这支文化将来自于长江中游系统的文化挤了出去。“哨棚嘴文化”除没有发现彩陶外,有许多陶器特征都与甘南与白龙江流域的仰韶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十分相近,自然与茂县营盘山的新石器文化遗

存相比也有许多相似特征。要弄清三峡地区“哨棚嘴文化”的渊源,川东北的嘉陵江、涪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就十分重要。因此,2006年我所除了对营盘山遗址开展第三次正式发掘之外,还在岷江上游西面的大渡河上游地区,以及东面的四川盆地西北缘地区,进行了多项考古调查、试掘工作。

2006年营盘山遗址发掘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2003~2005年度营盘山遗址系列发掘项目的组成部分。发掘地点位于遗址的中部及北部,发掘面积近3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遗迹现象包括灰坑及窖穴14座、灰沟3条、房屋基址3座、窑址2座等。灰坑的开口平面形状包括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窖穴主要为圆形袋状坑。房屋基址保存情况较差,仅发现柱洞、基槽等现象。个别柱洞规模较大,洞内还填有石块、陶片、陶球等遗物,房屋均为地面式木(竹)骨泥墙建筑,房屋废弃堆积物中包括有大量的红烧土块,上面有明显的竹木棍插抹痕迹。

本次发掘出土遗物与前几年发掘成果基本相似:包括陶器、玉石器、骨蚌器等。陶器从陶质陶色来看,以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其中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陶胎夹有颗粒粗大的片岩砂粒的陶片最具特色。泥质陶的火候均较高,尤其是彩陶片和表面打磨光亮的细泥红陶、褐陶片的硬度更高。陶片的纹饰种类丰富,包括粗细绳纹(包括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线纹、附加堆纹、彩陶、绳纹或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弦纹、瓦棱纹、划纹、复合纹饰(绳纹与附加堆纹组合成的箍带形装饰、绳纹之上饰凹弦纹)、戳印纹等。一些陶片上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陶器以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矮圈足器,器形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带嘴锅、缸、宽折沿器、瓶、甑、纺轮、陶球、穿孔器等。其中彩陶器的器形有盆、钵、罐、瓶等,器表打磨光亮,少量表面还施有白色陶衣,除黑彩外,还有少量的彩绘陶,图案题材有花卉纹、各种形式的线条纹、变体鸟纹、弧边三角形纹、网格纹、蛙纹等,多在器物的口部、颈部、腹部施彩,有一定数量的内彩。石器可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包括由大型剥离石片稍作加工而成的切割器、砍砸器、杵、石球(弹丸)、网坠等,还有少量个体甚小的燧石片;磨制石器包括斧、镑、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等。玉器包括中部带切槽的穿孔刀、斧形器、小型的镯形器、镑形器等,还发现了穿孔的玉芯。细石器包括大量的石叶、石核,质地以燧石及水晶为主,以长条形且下端多呈弯曲状的石叶最具特色,石核包括锥状、柱状、船底状等。骨器包括簪、簪、锥、箭镞等。

本年度新发现的器型有:腹部带缕孔的泥质灰陶罐形器、外表刮抹朱砂的磨光黑皮陶盆、中部有穿孔的泥质褐陶构件等。本次发掘在全面收集陶器、玉石器、骨器等遗物的同时,还为环境考古学研究提取了多个种类的实物标本资料。如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全面的收集,以供进行

全面鉴定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动物骨骼中在往年的基础上有新属种发现,发现盘羊角1件,为探索川西地区绵羊的畜养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线索,是目前川西北考古发现中所见最早最确切的材料。对灰坑填土全部进行了浮选,为植物考古学研究积累了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另外在浮选中发现了2件鲤科鱼类的脊椎骨和一些细石叶。还对标准地层及灰坑进行土壤标本的采集,以供进行孢子花粉的测试鉴定,为研究该地区五千年以来的植被变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发掘同时调查了营盘山南部的安乡遗址,位于茂县南新镇安乡村小学校附近,2005年安乡小学校内教学楼建设工地上发现文化层堆积,并采集较为丰富的陶片、玉器、燧石器等遗物。本次复查在小学校其外面的断面上又采集较为丰富的陶片等遗物。又在小学校以上的公路边断面上发现文化层堆积,并采集大量陶片等遗物。安乡遗址地处岷江东岸小支流的南岸三级阶地所在的坡地之上,南临一条自然冲沟,北靠山脊。遗址中心部位因民居密集,破坏较为严重,残留面积不大。采集陶片与营盘山遗址相比,具有年代略早的特点。安乡遗址对于探讨岷江上游小支流两岸的遗址分布规律及特征有启示意义。

此外,茂县沙乌都、白水寨遗址的调查又有新收获。茂县沙乌都遗址是2002年进行营盘山遗址环境调查时发现的,本次复查在遗址南部的坡地上(即2002年发现灰坑地点附近)及山脊上又发现暴露的灰坑现象,表明遗址的南部地带有不连续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而遗址北部又有一条东西向的山脊,本次复查在此采集有较为丰富陶片,并发现不连续的文化层堆积。遗址南北山脊之间相隔一条较为平缓的凹沟,沟内基建取土开挖处也采集有少量新石器时代陶片。

白水寨遗址位于茂县南新镇白水寨村,2000年调查时发现,遗址位于岷江东岸三级阶地的台地之上,遗址因村民取土破坏严重。现场已暴露三座以上的石棺葬,人骨架残片随处可见。在取土场的北部断面上发现了文化层堆积(红褐土层及灰褐土层),并采集大量泥质灰陶片、夹砂褐陶片、磨制石刀等遗物,陶器器形包括瓦棱纹泥质灰陶罐、夹砂褐陶锯齿状花边口沿罐等。又在遗址南部机耕道边的断面上发现灰坑等遗迹,包含泥质灰陶片、木炭、带有木棍插抹痕迹的红烧土块等遗物,填土为灰黑土,结构疏松。

(2) 涪江流域下关子遗址

下关子遗址发现于2000年,位于阿坝州茂县光明乡马蹄溪村四组,地处涪江一级支流土门河的北岸三级阶地的台地之上,台地地表呈现缓坡状,总面积近二十万平方米以上。在台地范围内均可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台地及附近的马蹄的下关台分布有密集的秦汉时期的石棺葬。本次试掘地点位于台地的东部边缘地带,表面为后期改土,对上部的堆积破坏较多。试掘地点的文化层堆积厚度约50厘米左右,可分三层。

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包括夹砂黑褐及红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磨光黑皮陶、泥质褐陶等。纹饰有斜向及交错的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较深的锯齿状及较浅的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瓦棱纹、斜向及交线纹等。陶器以手制为主,部分经过慢轮修整加工,多数陶器内壁可见明显的刮抹痕迹。器型包括侈口罐、鼓腹罐、长颈鼓腹罐、敛口罐、直口罐、喇叭口壶形器、陶臼等,石器包括打制和磨制石器,器型有刀、穿孔石刀镑、斧、切割器、砍斫器、尖状器、盘状器等。骨器有筭等。在第3层地层中全面收集了出土的动物骨骼,属种有马、猪、水鹿、斑鹿、麂和鸟类等,其中马虽然仅发现1颗左上门齿,但其是川西北地区全新世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标本材料,为探讨川西北地区马的起源和驯化提供了重要材料。另外在第3层中发现了1件人左下颌支,保留有P₁(第一前臼齿)和M₁(第一臼齿),M₁从磨蚀度观察,有3个齿质点,大概为3度,年龄约25~30岁。

下关子遗址出土陶器的面貌与茂县沙乌都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江油大水洞遗址等出土的陶器相似,应属于同一种文化系统,推测年代在距今4800~4500年间。下关子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不仅为这类文化遗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也在时空上建立起了更为广泛的联系,为探索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遗存的转变及其与成都平原、三峡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该遗址是四川盆地西北缘一处面积较大的河谷台地型聚落遗址,座山面水,地势开阔,地理环境条件较为优越,宜于人类长期定居生活。下关子遗址的分布面积、周边地理环境条件、文化层堆积厚度等,均超过沙乌都、高坎、边堆山、大水洞等山间坡地型、洞穴型聚落遗址,值得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发掘工作。

(3) 大渡河上游地区史前考古

与营盘山新石器文化相近的遗存,包括马家窑风格的彩陶目前最南在大渡河中游的汉源地区有发现。作为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扩展,并为深入了解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2006年3月又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选择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遗址进行了试掘。揭露面积87平方米,发现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骨角器、蚌器、兽骨等类遗物上千件。试掘工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哈休遗址地处茶堡河北岸三级阶地之上,行政区划隶属于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村一组,地理位置为东经102度9.4分、北纬32度10.3分,海拔2840米,高出河床80米。东南距乡政府驻地1500米,北靠八谷脑山,西临布尔库沟,南面隔河为沙(尔宗)马(尔康)公路。遗址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遗址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秦汉时期遗存主要位于遗址南部的台地边缘,但破坏严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积较广,其中心部分位于遗址西北部的台地上,面积近万平方米,局

部因晚期改土受到破坏。试掘地点选择在遗址中心北部的台地边缘,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如下: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可分为A、B两个亚层,为秦汉以后堆积;第三层至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第三层和第四层之下均了现有灰坑等类遗迹。

灰坑的开口平面形状包括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类。多数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个别坑口及坑底铺放石板。坑内填土多为灰黑色。灰坑H10近底部还发现较硬的烧结面。灰坑H2出土有涂抹朱砂的双孔石钺、泥质灰陶双唇式小口尖底瓶等遗物。出土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等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石片切割器、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包括穿孔刀、斧、镑、环、镞、穿孔珠、砺石等;细石器包括水晶石片、玛瑙石核、燧石刻划器等。一些石器表面、个别陶片上还涂抹红色颜料。出土陶器包括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褐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等。纹饰包括线纹、粗细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凹弦纹、绳纹花边口沿等,还有少量彩陶器。彩陶均为黑彩,图案题材包括弧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水波纹、粗细线条纹、长条叶片纹、圆圈纹等,底色有红褐、灰褐色之分。器型以平底器为主,还有少量的尖底器,包括侈口罐、小口瓶、卷沿盆、敛口盆、折腹钵、敛口钵、碗、杯、纺轮、环、丸、哨等。部分陶器壁上有穿孔。骨角器包括锥、笋、簇、骨梗刀等,骨质细腻、坚硬,部分鹿角表面有切割痕。玉器可分为仿工具类和装饰品两类。前者主要为淡绿色的斧形器、单孔凹背玉刀、镑刀形器等。后者包括较宽及较窄的大理石环镯器、白色穿孔珠等,个别环镯表面有穿孔。还出土了少量穿孔蚌器、云母片。此外,还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包括鹿、猪、牛、狗、马、獐等种类,部分应为家养牲畜。发掘时还对灰坑填土进行了浮选,发现了粟等作物品种。

根据以上发掘资料及其与周围地区尤其是岷江上游、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初步判定哈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间。哈休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存其文化因素包括土著文化、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其中土著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较高。其经济形态是以定居农耕为主,狩猎、采集业为辅。一定数量涂朱石器的出土,表明尚红习俗是哈休先民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

过去只在大渡河上游的丹巴罕额依作过发掘,在该遗址的第一期发现过少量遗物包括有彩陶片,大渡河上游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不清楚。哈休遗址是继茂县营盘山遗址之后,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有助于认识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期及晚期早段的文化的根本面貌。为探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此外,还对大渡河上游地区丹巴县蒲角顶遗址进行了调查。蒲角顶遗址采集大量陶片和磨制石斧、弯月形石刀,陶片包括夹砂褐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泥质红陶等,纹饰包括绳纹、附加堆纹、划纹等,器形包括罐、壶、钵等,还

有带耳器。其时代延续较长,从龙山时代至战国秦汉时代,相当于罕额依遗址的第二期、第三期(战国秦汉时代)遗存。另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左比村采集到少量磨制石器、夹砂陶片等史前遗物。

(4) 安宁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安宁河属雅砻江的一个支流,这个区域最有特征的是大石墓,过去发掘的除大石墓外,就只有礼州遗址和大洋堆遗址。上述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区别较大,与大石墓遗存的文化内涵也明显不同。由于各类文化遗存之间缺乏直接的层位关系,相互间的年代关系也就无法确认,因此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掘脉络一直都不清楚。为了弄清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凉山州博物馆联合对该区域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调查与发掘,2004年至2005年已对西昌大兴横栏山、咪咪啷、榧木沟、马鞍山、营盘山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另外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攀高速公路建设发掘了德昌县王家田遗址。上述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了安河流域考古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初步认为安宁河流域从大约距今4500年至东汉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大致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土著的横栏山文化,横栏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礼州中段遗存,与此同时,外来文化进入安宁河流域,这当中目前比较清楚的是与齐家文化较为密切的大洋堆下层遗存,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外来族群的迁入,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并存而后逐渐融合,礼州晚段遗存和咪咪啷遗存正是这种融合过程当中出现的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最后融合发展的结果形成了1类大石墓文化遗存,在大石墓遗存的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第2类大石墓文化遗存。

尽管我们已有了述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总还是感觉到真正弄清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目前的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还存在不少缺环和薄弱的环节,需要进一步作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还需要针对一些典型遗址进行规模稍大的发掘。因此2006年我们又对榧木沟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榧木沟遗址位于西昌市琅环乡红星村五组,地处安宁河西岸的山间坡地之上,高处安宁河河面约50米,遗址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13万平方米。该遗址上层为大石墓阶段的遗存,下层叠压有横栏山文化遗存,因此该遗址的发掘对探索横栏山文化与大石墓遗存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上次的发掘资料太少。为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时代和生业环境等相关信息,在2004年发掘位置的东面再次进行试掘,二地之间仅相距不到2米,实际发掘面积102平方米。本次试掘发现了竖穴土坑墓3座、瓮棺葬1座、建筑1座、灰坑3个以及相当数量的柱洞等遗迹现象,同时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器、石器以及少量的铜器。该遗址地层堆积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第3层的包含物有较为丰富的夹砂和泥质黑陶片、石块、红烧土颗粒、碳屑及少量的石

器,陶器有带耳罐、豆、杯、壶、瓮、罐等;石器有砍砸器、刀、斧、镑、砺石等。时代推测为战国至西汉时期。M1~M3、H1~H3、F1以及柱洞等遗迹单位均叠压于该层之下。第4层堆积形状呈水平状,仅发掘区内东南有分布。地层堆积中有少量的碳屑和大量的沙砾,未见其他文化遗物出土,为过渡时期的堆积。

本次试掘中发现土坑墓、瓮棺葬、灰坑以及建筑遗迹等,这些遗迹现象均叠压于第三层之下,相互打破关系清晰。土坑墓发现3座,坑口均被扰动,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内未发现葬具和人骨痕迹,除M3未出土随葬器物外,M1和M2方向为西北—东南向,墓室内均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泥质黑皮的觚形器、高柄杯、豆形器最为多见,另有带流壶、双耳罐、穿孔半月形石刀是其基本组合。M3方向为西南东北向,墓室不见葬具和人骨痕迹以及随葬品,墓室东部和西部有二层台,墓室内的填土中出土大量于第3层堆积包含物相同的器物,该墓估计未曾使用便被废弃?瓮棺葬为随罐挖筒易的坑,其口部有器盖置,瓮罐内为出土任何文化遗物以及人骨痕迹。建筑遗迹主要有两种建筑形式,一为挖基槽柱洞式建筑;另一为柱洞式建筑。这些建筑的平面形式以长方形多见。

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中可明显看出两个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陶片是具有横栏山文化特色的颈部装饰压印附加纹的罐,但未见这个时期的堆积。而晚期遗存陶片则可分为两类,一为泥质黑皮陶为代表器物,主要有杯、觚形器、豆形器等,与我们分的第一类大石墓特征相近。另一类则是夹砂的灰褐双耳或单耳罐、卷沿罐、喇叭口高领罐为代表,与我们分的第二类大石墓遗存特征相近。该遗址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器,最多见的则是盘状砍砸器以及部分磨制的斧、镑、球、杵等。青铜器仅见M1出土的2件镞。

木沟遗址丰富的遗迹现象以及特征鲜明的遗物对于安宁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再梳理以及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土坑墓与瓮棺葬共存以及出土器物与流行大石墓葬俗居民文化风格的相同,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的族群复杂性与文化多元的认识对于安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的诠释有着特殊的意义。

(5) 金沙江流域的会理地区考古调查

会理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入滇的要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素有“川滇锁钥”的盛誉,位于东经 $101^{\circ}52' \sim 102^{\circ}38'$,北纬 $26^{\circ}5' \sim 27^{\circ}12'$,北距西昌市185公里,南距攀枝花市1202公里。东咀遗址位于会理县南阁乡南阁村5组北面的一级台地之上,距离会理县城城关镇约5公里。遗址地处麻郎河和成河交汇之处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遗址北面山坡上为雷家山墓地。本次试掘地点位于2005年发掘点南面。二者之间仅隔一北隔梁,此次实际发掘面积70.75平方米。该遗址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第1层为耕土层,2、3层为明清层,第4、5层为早期堆积。

灰坑和建筑均为叠压于第四层之下,灰坑的平面形状有圆形和长方形,以圆形多见。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少与早期地层中出土物相同。建筑形式分为两类:一为全为柱洞式建筑;另一为带基槽和柱洞的建筑。柱洞的平面形式有圆形和椭圆形。建筑的平面形式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

该遗址早期地层堆积中出土器物有陶、石以及青铜器。石器可分磨制和打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多见片状切割器、砾石砍砸器以及大量石片和石坯等;磨制石器较为少见,仅见斧和砺石。陶片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另有少量的褐陶;泥质陶仅见黑皮陶。陶器上常见的纹饰有绳纹、水波划纹、叶脉纹、菱形纹等以及乳钉和角状装饰。器形有带耳罐、锯齿状花边口罐、卷沿罐、高领罐、壶状器、豆形器(黑皮陶)等,其中以带耳罐、锯齿状花边口罐、卷沿罐是其常见器形。青铜器不可辨认其器形,呈豆状,表面多见气孔,较为粗糙。

本年度的试掘出土的陶器中的带耳罐与雷家山墓地、龚箕湾墓地、安宁河流域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底部装饰叶脉纹与安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一致,同时少量青铜器的出土,可以初步推测该遗址的时代应该属于青铜时代,可能在春秋时期;其居民与安宁河流域青铜时代的居民有着非常亲近的亲缘关系。

雷家山墓地位于会理县南阁乡南阁村五组的雷家山坡上,墓地的南面为东咀遗址,麻郎河和成河在此交汇。该墓地于2005年12月由会理县文管所调查时发现。墓地现被许多民房叠压,由于当地村民取土盖房习惯用土筑墙,因此该墓地在村民的建房活动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联合考古队在对雷家山墓地的调查中发现,该墓地已经遭到彻底破坏,仅在几户村民家围墙陡坎上发现有零星的陶器遗留,墓坑已经全然不存。2006年对一村民房后的陡坎上的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的地理位置为北纬 $26^{\circ}36'63.8''$;东经 $102^{\circ}15'49.1''$,海拔高度为 1743 ± 12 米。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仅存北部,南部和中部都已不存。残长1.4米,宽0.8米,深1.5米。墓室内未发现人骨和葬具的痕迹。在墓室的北端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器物,这些器物呈叠放状态,最上层全部是陶器,往下就是陶器、石器和卵石交错而放,越接近底部陶器的数量逐渐减少,卵石较多地出现,但摆放没有一定的规律。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河卵石,以陶器数量最多。陶器的器形主要有圈足豆、罐、单耳罐、带流壶、圈足杯、尊、纺轮等。其中圈足豆、单耳罐、圈足杯、尊、纺轮是该墓最为长见的器形。石器全部为磨制石器,有数量巨大磨制精细的石针和少量的穿孔磨石、凿、斧、杵等。

该墓的出土器物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有其自身的特点:随葬器物丰富,具有其自身地方特色;石针和纺轮的大量出土是否反映其墓主人特殊的身份;墓室中大量随葬河卵石,反映其特殊的葬俗。河卵石来自山坡下的麻郎河中,在河床中随处可见,用取自附近河流的卵石随葬于墓室

中,是该墓的一个特点,它对于研究当时居民的丧葬习俗有着重要的意义。雷家山墓地出土器物部分与箕箕湾墓地出土同类器物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单耳罐、圈足豆等;而带流壶、圈足杯、觚形器、穿孔磨石等则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有着许多相近之处。结合目前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研究成果,可初步推测,雷家山1号墓的时代大致在春秋和战国至交?雷家山1号墓的发掘,对于我们了解该区域青铜时代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展示出该区域多元的青铜文化面貌,以大石墓为代表的文化势力已经深入至金沙江北岸,而同金沙江沿岸地区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势力在此发生碰撞或“涵化”,共同创造了该区域灿烂多元的青铜文化。

2. 成都平原先秦考古

(1) 区域考古调查

2005年~200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联合在成都平原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取得了非常大的收获,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该项目的目的是集中对成都平原地区进行大范围抽样调查,采取地面调查、钻探,结合古地貌、古环境调查,全面摸清成都平原史前至汉代古遗址空间分布情况与变迁,及其与古环境的关系。并进而充分考虑到与资源的关系,解释成都平原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社会结构及其文明特征。2006年的调查主要是以郫县古城遗址为中心,向西、北、东和南进行抽样调查,范围涉及到郫县和彭县。对抽样调查的范围古代聚落的分布规律及其变迁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比如郫县古城往北和西,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相对较少,向南和东相对较为密集;调查范围内宝墩文化的遗址多集中在宝墩文化三期,聚落规模较小,多在几千平方米。商周时期的遗址多集中在十二桥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明显比宝墩文化时期的大。

(2) 金沙遗址的发掘

金沙遗址除划出的保护区外,周边土地均被房屋开发商征用,因此近年我所进行了大量抢救性发掘。2006年发掘了如下几个地点:

金沙遗址“西城天下”地点位于成都市城区西部,南临西延线蜀汉路段。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西城天下”地点地层较为简单,呈水平分布,遗址的东北部先秦时期堆积保存较好,而在西南部保存较差;遗迹现象较为单一,有灰坑和窑址两类,主要分布在发掘点的北部。灰坑共发现57个,根据灰坑的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陶窑共发现2座,均为小型窑,平面呈椭圆形。该地点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居多,夹砂陶以灰褐陶占多数,另有黄褐陶、黑皮陶等;泥质陶数量较少,以黑皮陶占多数,另有少量灰褐陶、灰陶等。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绳纹、弦纹、压印网格纹、圆圈纹、刻划几何纹、

戳印指甲纹等。陶片较为破碎,可辨器形有小平底罐、高领罐、敛口罐、盆、瓮、尖底杯、尖底盏、簋形器等,这些器型均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典型器型。在这些器物中,小平底罐、簋形器、尖底杯、尖底盏最具时代特征。总的来看,文化面貌与成都新一村、成都高新西区新锦犀包装厂地点、四川方源中科地点、金沙遗址芙蓉苑南地点等遗址的特征相近,其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

金沙遗址“雍锦湾”地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北临摸底河,南与金沙遗址“人防”地点相邻,东接金沙遗址“燕莎庭院”地点。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18000平方米,其中东南部区域由四川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完成。“雍锦湾”地点先秦时期文化堆积距地表浅,被晚期堆积和现代民居破坏严重,保存较差。以发掘点的西北角和东南角之连线为界,连线之东部,分布着大量的墓葬,连线之西部则墓葬较少,但却分布着较多的灰坑、窑址、房址等遗迹现象。该地点共发现先秦时期墓葬381座,灰坑713个,陶窑29座,房址9座。“雍锦湾”地点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燕莎庭院”地点相同,年代大致商代晚期至西周,主体遗存属十二桥文化。

金沙遗址“金牛区城乡一体化”5号BC组团地点的发掘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在金沙遗址时期,该地点先是作为居住点,共发现了6座房址、30余个窑址、1口水井、200余个灰坑;废弃后,该地点成为墓葬集中埋葬的地方,共发现400余座墓葬。时代约为西周时期。墓葬有竖穴土坑葬和船棺葬,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在区域的下层还发现有宝墩文化遗存,发现有房址,出土了少量陶片。

金沙遗址黄忠小区一号墓地处于金沙遗址金牛国土分局5号地块a地点、b地点及西延雅舍地点,范围不小于26400平方米。金牛国土局a地点和西延雅舍地点有墓葬362座,其中船棺葬96座,占墓葬总数的26.52%。西周中期至春秋前期的船棺葬根据随葬器物组合不同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在棺内放置磨石和小型铜质明器,在棺外放置为数不多的人或动物肢体、陶器。后期则在棺内放置青铜剑、戈,在棺外放置数量较多的水鹿肢体和陶器。黄忠小区一号墓地中船棺葬占总体墓葬数量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年代较为明确的最早者为西周中期,并且有一定数量,虽不能肯定这是最早的船棺墓葬,即船棺葬的发生期,但船棺葬的流行期很可能始于此时。船棺葬的出现并流行是十二桥文化丧葬习俗的重大变化,是该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多变革之一,为探讨十二桥文化的分期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信息。

2 成都平原历史时期考古

(1) 蒲江冶铁遗址的调查

为了配合中日“西南早期铁器的发掘与研究”这一课题的

开展,2006年9月、2007年1月,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爱媛大学和蒲江文管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分别对蒲江境内的冶铁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本次考察调查主要是以地面观察为主,对蒲江境内已知的冶铁遗址点的分布面积、时代、堆积、保存现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调查的方法是地面踏勘,对各遗址点堆积的厚度、时代、保存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考察的目的旨在了解这些冶铁遗址的保存现状、时代特点、文化内涵以及内部结构的初步信息的情况。本次考察了古石山遗址等共计25个地点,基本上涵盖了蒲江目前境内冶铁遗址的主要区域。

本次考察主要是对已有的点进行观察,了解其保存现状、时代、文化性质等方面的信息。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目前蒲江境内的冶铁遗址由于近年的大量种植柑橘和修建道路遭到了严重破坏,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刻不容缓。通过踏查,发现目前蒲江境内的冶铁遗址时代涵盖从西汉至近代,遗址点的分布呈北早南晚的趋势。汉代冶铁遗址的发现对于西南地区古代早期铁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发现了三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炼炉,对于不同时期炼铁技术与工艺的复原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蒲江发现的冶铁遗址主要分布于五面山区,该山脉内富含丰富的赤铁矿和茂密的森林。这为该地区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矿料来源和燃料供应。

(2) 邛窑遗址的发掘

2005年11月至2006年5月,对邛窑什邡堂遗址一号窑包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区域选定在什邡堂遗址的一号窑包及其周围的平地、台地上,通过发掘,确认发掘区内均分布着从隋、唐代到南宋各不同时期的遗迹和地层堆积,目前发掘工作只完成了一个年度的工作,发掘面积1950平方米,发掘内的大部分区域完成了对宋代地层的遗迹、遗物进行清理,部分区域已开始进入唐代地层。一号窑包的宋代遗迹的分布情况较为明确:作坊区和生活面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东部台地、北部平地和南部坡地上,废品堆积区集中在遗址的西部平地、窑包的南北两侧坡地上,窑炉建于窑包西部坡地上。围绕一号窑包,一共发现了9道挡土墙、护墙的遗迹。

主要遗迹现象包括窑炉及作坊遗迹。一号窑炉(Y1)位于一号窑包的西坡,为斜坡式龙窑,方向90度,窑门向西,长42米,由窑门、火膛、挡火墙、窑床、烟道以及窑门前的工作面、护壁组成。窑门宽度为1.85米,用匣钵砌作的挡火墙厚度为0.9米,窑床宽度为2.8米,其上的垫砂层最厚处大约在1米以上。窑壁由砖和废弃的匣钵修筑而成。一号窑炉的窑壁有增补、改建的痕迹,表明一号窑是在前期废弃的窑炉上修建或改建而成。从已经发掘和正在清理的遗迹观察,一号窑炉是一号窑包宋代的主要的生产窑炉,其废品主要堆积在窑炉的北侧和窑包的西部凹地。一号窑炉的废弃年代应在南宋末年。作坊遗迹ZF1、ZF2、ZF3、ZF4均分布在东部台地上,年代为唐代早中期至南宋末期,但此区

域的遗迹保存都不太完整。ZF3有冶炼铅的红烧土坑遗迹。ZF5位于遗址北部的平地上,时代为宋代,由储泥池(C1)、房屋(F3、F4)、井(J2)以及过道组成。C1为一个储存瓷泥的储泥池,用匣钵铺作而成。F3内发现了水缸/釉缸的遗迹,F4北部被灰坑(H4)打破,东部有一口水井(J2)。在ZF5的南边有一道挡墙(DQ8),将废品堆积与ZF5间隔开来,表明ZF5和DQ8是两组互相关联的遗迹,而ZF5通过DQ8与Y1也建立了联系。这是首次在什邡堂遗址中找到成组并互相关联的遗迹单位。ZF6位于西部平地上,Y1的护壁南侧,时代为南宋晚期,保存了两道房屋的墙体(F5、F6)和轮盘车坑、水缸等遗迹现象。

出土的器物包括了碗、盘、碟、杯、壶、瓶、瓷塑等产品和窑具、印模等工具。本年度发掘出土器物以北宋、南宋为主,唐代器物为少数,为我们了解邛窑宋代的生产状况提供了大量信息。出土的南宋时期器物以碗、瓶、壶等生活用品为大宗,表明该时期邛窑的生产仍以本地的餐饮器具为主;宋代地层里的产品釉色以绿色、浅绿色、天青色的乳油釉为主,绿釉为高温铜绿釉,多肥厚滋润;浅绿色、天青色的釉面多有开片。有不少釉色为蓝色泛紫的瓷片和器物,特别是天青色略泛紫的碗类器物数量很多,这些器物釉色上表现出类钧窑的产品特征,是邛窑生产颜色釉器物的新资料;在宋代废品堆积区内发掘出土了一些高温铜红釉的器物 and 残片,不少残片的铜红釉成色鲜艳而优美,釉色纯正,釉面光洁,表明什邡堂窑当时已经能较为稳定地生产此类产品;高温三彩器、绿釉瓷器主要在ZF5的房屋(F3)中出土,共出的还有大量的三角形支丁。从出土的素烧坯上反应,三彩器采用拉坯、模印等不同的成型方法,其中不少模印成型的器物采用了接足的方法。出土的器物 and 遗迹现象表明什邡堂一号窑包的生产技术承袭了河南一带烧造三彩器的窑场的不少制作工艺。

(3) 邛崃龙兴寺遗址的发掘

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起步时间较早,1947年邛崃瑞云村大佛院附近西河涨水冲出了数尊唐代石刻佛像,因中有铭文“龙兴寺”,遂称此地为龙兴寺遗址。该地原为一片农田,遗址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现已为住宅和厂区包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汇同邛崃市文管所曾于2000年底,对造像出土地点及其周围进行过考古调查。在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啤酒厂的扩建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发现和清理了房屋、灰坑、水井、水沟、墙基、墓群、池子、塔等多种遗迹现象,并有大量佛、菩萨、经幢等各类造像数百件以及大量邛窑生活用瓷器。整个遗址出土遗物有石造像、经幢、经版、建筑材料、陶佛像、建筑构件、陶瓷生活用器、玩具、铜镜、钱币等各类文物上千件。佛教造像是这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时代以唐代为主,其中有“天宝”、“大中”等年号,造像题材几乎囊括了石窟中所有类型,有立佛、坐佛、半伽坐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士、供养人、狮子、经幢、经

板以及一些附属构件,如莲花纹条石、背光等。

遗迹主要有四处,即罗汉殿(F1)、塔(T1)、四合院建筑遗址(F9)和一处小型墓葬区(M1-M6),均为宋代修建。罗汉殿基址坐东南向西北,长近28米,宽近23米。台基东北角有一堆废弃的琉璃瓦,西北面正中位置活动面较厚,可能为门道。现建筑基础上仅存25个礅礅,为方形或圆形,采用卵石和黄土相间夯筑。此外,许多琉璃瓦上印有“官”字,少数青瓦上有“XXX造罗汉殿”。时代上,罗汉殿应为北宋至南宋时期使用的建筑。砖塔遗迹位于遗址东南,略呈方形,残高近两米,四个边长在9~12米间各不相等。砖塔以条石为基,夯土实心,外砌包砖,基础外有石砌散水。西北面有楼梯门道。塔基外最早活动面低洼处多用北宋早期建筑废墟铺垫,而南宋时期堆积叠压在残塔上,推测该塔的修建及废弃年代在北宋至南宋间。位于塔的东北面距塔基约1.5米处发现一处砖墙遗迹,编号Q7,与塔基平行,叠压塔现存最早的活动面之下。由于揭露范围有限,其性质还无法确定。四合院建筑遗迹坐西北向东南,由两个以上以天井为中心的小院构成,包括中堂、侧屋、天井等遗迹。中堂基础长方形,长约22米、宽近14米。其后(北)小院以一天井为中心,有暗沟与天井相连;西侧为厨房,内有残灶,外有水井和排污沟槽等。整个房屋基础使用红砂石板砌成,表面叠压大量红烧土和灰瓦块,并有

木碳、竹篾碳等,因此推测其为竹篾夹墙,木梁,瓦顶。这一重院落前方还有一个天井,由于其南侧是公路和现代建筑物,未进行清理。房基朝向和寺庙相反,与寺院的关系不清。小墓葬区在遗址西部,罗汉殿西南方,两排6座略呈南北向排列的方形砖室墓,结构、方向、用砖基本一致。长宽在1~1.6米间,残高约0.2米,棺槨不见,有瓷罐、瓶等,推测为小型僧人火葬墓。

经过这次发掘,推测寺院大致依河流方向坐东南朝西北。从1947年收集的遗物中有“永隆”、“会昌”等年号的纪年材料,证明至少中兴寺之前,该处已有佛教寺院。罗汉殿遗址所出“官”字瓦,证实该地点直到宋代时还是一所官府寺庙。唐武宗会昌毁佛时,下令各大州仅留一所佛寺,从邛崃龙兴寺出土有会昌前后的造像刻经,可以证明该寺院不在会昌毁佛之列。我们这次发掘在宋代遗迹下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和瓦砾堆积,其中包含大量的唐代佛像、经版等遗物,说明龙兴寺很可能毁于唐会昌之后的邛州战火。邛崃龙兴寺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南方地区对唐宋时期寺庙遗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发掘工作,基本弄清了唐代龙兴寺的修筑地点、废弃原因以及继之兴建的宋代寺庙与唐代龙兴寺之间的关系,补充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收集而得的造像在考古研究中之不足,提高了邛崃龙兴寺遗址研究的学术价值。

十三. 西藏自治区

(一) 西藏萨迦寺考古

在2005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06年5~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委托,在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萨迦寺维修工程指挥部的协助下,对西藏萨迦北寺的相关遗址进行了继续发掘和调查。这次工作除结束了北寺德确颇章遗址2005年剩余部分的发掘外,重点对德确颇章南侧的一排佛塔和古绒颇章、乌孜大殿进行了发掘清理,还对其他的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1. 德确颇章祭祀坑及其南侧佛塔的发掘

2005年,对德确颇章内的3组建筑均进行了发掘清理。这次除对西门等剩余部分进行了补充发掘和清理外,还在区和区之间发现一处祭祀遗迹。该遗迹为方形小坑,边长50厘米,周围以片石砌筑,坑底亦铺有石片。该坑内出土陶罐4个,泥塑小动物34个,带彩绘石片2块,零碎骨骼数块。可能与奠基仪式或某种禳灾仪式有关。

在德确颇章遗址的南侧和西侧,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佛塔,形成规模较大的塔林,由于年长日久,大多数已经倒塌,其余也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损毁。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有些佛塔的建筑年代较早,在萨迦北寺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此,考古人员对这些塔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绘制了平面分布示意图。按照调查的顺序,把南侧和西侧的塔林分别编为区和区。区共有佛塔49

座,区共有佛塔66座。在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德确章南侧紧邻的第一排佛塔做了清理发掘。该排佛塔共有9个,西边8个佛塔共用1个塔基,形成完整的为纪念释迦牟尼一生8件大事而修建的八相塔(聚莲塔、菩提塔、吉祥多门塔、神变塔、天降塔、和好塔、尊胜塔和涅槃塔),东边的大佛塔为独立修建。通过发掘清理,基本搞清楚了萨迦早期佛塔的结构样式与建筑风格。清理出土大量不同类型的红陶塔饰件和用于塔内装藏的擦擦。

2. 古绒颇章与乌孜大殿的发掘

上层是古绒颇章,下层是乌孜宁玛大殿。建筑群总体上采用了藏族传统的建筑技术与风格,依地形而建造,高低错落有致。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曾经对此做过调查,并绘制了乌孜大殿的平面布局图。这次发掘,进一步搞清了乌孜大殿的平面布局、与周围建筑的关系以及建筑结构。共清理大小房间8个,祭祀遗迹1处,发掘面积1408平方米。

上层的古绒颇章共清理房间6间,在F1北壁上有3个圆拱顶的小龛,据调查原来供奉有萨迦五祖中的“白衣三祖”像,这种在墙壁上开龛置像的做法,是“后弘期”早期佛寺建筑的特征之一。F2是藏书室,出土了一些残毁的经书和用来做经书架的木板,还有大量包裹佛像底座的鎏金雕饰铜皮。F3出土了大量的铁质铠甲、头盔片和数量较

多的铁箭头,在其北壁上有一门道,推测F1的下面还有一层,可能是废弃之后重新再修建F1。根据文献记载,F4和F5是北寺最早的建筑之一,始建于1073年,在F5的四壁上,均残留有壁画,但构图简单,绘制粗糙,不似早期作品;从出土的大量文物上,亦没有发现能够说明该处建筑年代较早的证据。在古绒颇章,共出土各类文物280余件(组)。

在古绒颇章的东侧,清理出祭祀遗迹一处。该遗迹中心为石砌方台,在其四周分布有10个祭祀坑,其内埋藏陶罐,东边4个,北边2个,西边3个,南边因面临断崖,一部分已经坍塌,仅从残迹上可看出也有1个祭祀坑。除南边残损的1个外,东边的1个坑内仅埋有1个罐底,1个仅埋有5、6块陶片,其余7个小坑内均埋有完整的陶罐。小坑的结构一般是在坑底铺片石或鹅卵石,坑壁除发现一个小坑用石片砌筑外,其余均用鹅卵石镶嵌加固,罐口周围的空隙亦用鹅卵石填充,最后上面盖上片石。其性质应与德确颇章祭祀遗迹相似。

下层乌孜大殿清理出南北相连的殿堂,南面为乌孜宁玛大殿,北面为北佛堂。其中北佛堂原有12柱,多数柱础尚存,地面为阿嘎土,可看出原主供佛座和周边原置经书架的痕迹。乌孜宁玛大殿虽已不完整,但北半部形制仍很清楚,2排柱础东西间距3.6米,柱础坑直径0.6~0.7米,可知原来均为粗壮的大柱。东壁和北壁还残存壁画局部。80年代,萨迦寺曾组织僧人对其进行过挖掘,据当时参与人员的介绍,曾清理出大型佛像4尊、灵塔11座,此外还出土有木雕护法神像和其他造像。这些出土文物现分别存放于萨迦南寺的普巴拉康、却惹拉康、灵塔殿和拉康拉章。这次发掘,除出土少量遗物外(如包裹木质佛座的鎏金雕饰铜皮等),主要是搞清楚了大殿的整体布局、柱网分布、与周边其他建筑的关系,对于重新认识这组建筑的宏伟结构和它昔日的辉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3. 其他遗迹的调查与试掘

除对以上遗迹进行了重点发掘外,还对萨迦北寺的其他建筑遗迹如桑阿德吉林、东热布拉克、雄阿巴雄努拉克、冈嘎查巴祖拉克、杰尊拉克、通瓦顿丹、卓玛拉克、荣康、细脱颇章、尼德拉康、夏布丹拉克等进行了实地考古调查,并对其中的4处进行了局部清理;此外,还对位于雄麦乡的萨迦寺的属寺琼堆寺遗址进行了调查。

其中卓玛拉克为原卓玛颇章的主要建筑。现存的2层

佛殿组合中有卓玛拉克(度母殿)、江白央拉克(文殊殿)和次巴麦拉克(无量寿佛殿),壁画保存较好,内容丰富,绘制精美。其中卓玛拉克的萨迦法王夫妇供养图和度母救八难图,次巴麦拉克的萨迦法王世系图等均为萨迦南寺所少见或不见。

琼维寺位于萨迦县雄麦乡琼堆村东,据载系鄂巴·贡嘎桑布(1382~1456年)于15世纪创建,历属萨迦派。毁于文革,现为一片废墟。遗址每个区都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围墙外均有挖出的人工壕堑。1区以吐旺拉克和杜康为主体;2区以强巴拉康为主体;3区以崩钦大塔为主体。此遗址建筑极有特色,吐旺拉克三面环绕礼拜道,墙体厚达1.7米,保留了早期佛堂建筑的特点;崩钦大塔平面呈亚字形的坛城状,其中有众多佛堂,据调查原有9层,结构如同白居寺十万佛塔。

4. 对古绒颇章与乌孜大殿出土经书的整理

80年代,萨迦寺僧人曾对北寺古绒和乌孜大殿进行了局部挖掘,除出土一批铜造像和灵塔外,还出土了大量经书及经书残页,现均存放在南寺普巴拉康内。为了解原北寺藏经的情况,考古工作者对现藏的北寺出土经书进行了初步梳理,共整理出各类经书92种。其中重点对萨迦寺僧人初步整理的散页进行了逐一的检索。这些散页既有封面、也有末页,但主要为中间的经页。按照标注的函数、页码和字体、纸张等特点,有的经页能连续拼接数张,但大多数则为单页。

经书残页一般长20~50厘米,宽6~12厘米,大多4~8行。其中,最大的残页长71.5厘米,宽28.5厘米;最小的残页长11.3厘米,宽6.8厘米。纸张分为藏纸、宣纸和机制纸,绝大部分纸张为藏纸,而藏纸又分为蓝色藏纸和素面藏纸。其中,蓝色藏纸主要用于写本,素面藏纸在写本和刻本中都广泛使用。从版本形式上看,这批藏书主要有写本和刻本,版式设计也有多种形式。其中写本达43种之多。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有瑜伽图解、法器图解、历法、佛经诵读标注、书信等残页。

通过发掘,为进一步了解萨迦北寺建筑群的整体分布情况,搞清萨迦北寺建筑遗迹的结构与相互关系,从而研究萨迦北寺的创建、扩建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萨迦寺维修保护工程和制定萨迦寺文物保护方案提供了确切的基础信息。(田有前 张建林 杨曦)

十一. 云南省

(一) 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第三次发掘

大河旧石器遗址位于云南东部的富源县大河乡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藕石山上的洞穴内,洞穴总长约35米。洞内人类活动遗迹发现于199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01和2002年进行过两次清理和正式发掘,

2002年的发掘确认该遗址是一个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遗址。

2006年的发掘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按1×1平方米为单位连续布方,在有洞顶的部位永久保留了布方的标志。根据实际情况以水平层结合自然层逐

层进行发掘,对出土的石制品和化石都进行了三维坐标测量,对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和遗迹进行了产状测量。发掘布方共计106平方米,实际发掘74平方米,共获得石制品1400余件,动物化石150余件,人牙化石1枚。出土器物以石制品居多,伴有少量骨器。石制品的种类主要有:盘状石核、柱状石核、长方形石核、三角形石片、边刮器、端刮器、半月型刮削器、锯齿刃器、尖刃器、雕刻器、砍砸器等。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非常丰富,上、下两个层位都有人工垫石地面、火塘等。该遗址发现的人工垫石地面为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国内除福建三明船帆洞以外的第二次发现。

大河遗址的石制品加工以锤击法为主,偶有锐棱砸击法;有指垫法和压制法的修理技术,有勒瓦娄哇连续剥片技术,常见石核预制和台面修理的现象。从器物形制和加工技术看,发掘出土的石制品既有地区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

经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用加速器质谱(AMS)测定,大河遗址上文化层第四、第五层的年代分别为3.6和3.8万年;而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海岸与第四纪研究所用铀系法检测下文化层顶部的石笋和石铺地面上的石笋,得到的年代分别为4.1万年和4.4万年。我国最早发现莫斯特文化并得到广泛承认的是水洞沟遗址。后来在内蒙古的小口子、上榆树湾、清水河、准格尔、阳场和云南的路南、呈贡等地也采集到过类似的标本,但它们的年代均未超过距今3万年。大河遗址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而且这种交流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路线。该发掘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吉学平)

(二) 大理银梭岛贝丘遗址第二次发掘

2001年,省考古所和大理市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在洱海区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洱海银梭岛上遍布早期陶器碎片,并捡到一些纺轮和网坠。进一步调查,发现文化层堆积较厚,但遭破坏严重。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下旬,对该岛北部地区的3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2005年3月初至5月下旬,因建设工程需要,又对该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

发掘共布探方13个、探沟4条,最深的探方约3.5米,各探方及探沟均有早期文化堆积。发掘出土陶器碎片约有20吨,编号小件器物10000余件。出土器物的种类比第一次发掘多出一种,为木器;遗迹现象有新发现,为大量的打入地下的粗细不等、长短不一的木桩,为古人的一种建筑遗迹。在靠下面的地层堆积中出土了不少的完整器物,有石刀、石斧、石锛、骨锥、陶器等。25号探方16层中还出土一残木器,这在云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

第二次发掘后,从采集的C14标本中选出9个,送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作检测,检测数据为:最早地层里样品

为距今5000年左右,最晚为公元前,早晚跨度达3000年。在这漫长的3000年间,古人在该遗址的活动很频繁,留下近7米的文化堆积。从地层剖面看,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共6个,跨越的时代近2000年;青铜时代的层位有近50多个,跨越的时代达1000多年。地层堆积包含三个时代,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为青铜时代,最晚到铁器时代。从中获取的大量实物资料和古代信息,可基本构建起洱海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

早期地层的年代测定数据告诉我们,约在5000年前,洱海周围就有人类在此生活。这一发现,将已知的洱海周围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银梭岛遗址也因此成为目前云南省已发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闵锐)

(三) 景谷南北渡遗址

南北渡遗址位于景谷县勐班乡芒海村公所南北行政村村西南大约20千米的澜沧江东岸,地处澜沧江和其支流南旺河交汇的二级台地上,海拔660米左右。在云南地图上,该遗址之所在是澜沧江拐弯最大的地方。

南北渡遗址于2002年澜沧江糯扎渡电站文物考古调查时发现。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抽调思茅市各县和楚雄、曲靖等州、市文物干部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采用布方法进行,共布10×10米的探方50个,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

发掘清理出的遗迹现象较丰富,计有道路、灰坑、沟、房屋柱洞、火塘和用火遗迹等。出土的文物较多,数量达1万件以上,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青铜器三类。石器既有我们以前所知的“芒怀类型”的打制双肩石斧,又新发现了三角形、长条形、梯形石斧,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制的磨光石斧、各种形制的网坠以及至今仍比较锋利的石箭镞等。陶器是主要为红褐色的夹砂陶,种类主要有罐、釜等。陶器纹饰种类繁多,既有绳纹,又有划纹,同时还有以前没有见过的类似于“雷纹”的纹饰。

原来的考古调查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但从出土的文物,尤其是从遗址的晚期地层中发现的青铜器和石范来看,至少该遗址的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掘中已采集了一些标本送有关机构测定,其绝对年代有待进一步测定。

(四) 景谷上船口遗址

上船口遗址位于思茅市景谷县碧安乡光明村上船口社的江边台地上,遗址分为A、B、C三个区,发掘共在A区布方31个、B区布方3个、C区布方16个。

A区各方均有早期遗物出土,文化层分布较广,最深的探方达1.6米。出土遗物主要是打制石斧,还有少量的磨制石斧、锛、凿、环等,还有少量的陶器残片出土,可知器形有罐,不见早期遗迹现象。

B区3个方出土早期遗物,但数量较少。出土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器形主要是斧。出土少量的陶器残片,可知

器形有杯、罐。

C区16个方均有早期文化层和遗物出土,但未见遗迹现象;出土器物有打制的石斧、磨制的石斧、锛、凿、钺、星形器、箭簇、弹丸、磨石等,以及陶器三类。陶器残片较A区多,可知器形多为罐;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兼有其它纹饰;陶片火候一般,以夹砂为主。

通过发掘,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生活获得了初步了解。出土的石器中,以打制的石斧为多,占绝对数量。磨制的石器只占少量,但磨制的工艺不差,星形器的出土可以说明这一点。打制和磨制石器出在同一地层,说明打和磨的技术同时被当地古代居民掌握使用。从出土的石器种类和陶器看,当时的古代居民主要以捕鱼、打猎和采集为生。

根据出土器物推测,该遗址的年代在距今3000至4000年间。发掘中已采集了C14样品,待检测工作完成后,遗址的年代将会有个准确的结果。(闵锐)

(五) 景谷白银渡遗址

白银渡遗址位于思茅市景谷县碧安乡白银渡自然村北侧,地处澜沧江左岸二级台地之上,海拔约656米左右,距澜沧江江面约20米,其南有威远江自东向西注入澜沧江,分布面积近10000平方米。

为配合糯扎渡水电站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思茅市文物管理所、景谷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于2006年10月18日—2007年1月18日,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选择在地势相对平缓的三个区域进行,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出土各类石器6000余件,同时伴出部分陶器碎片。石器器类有斧、镖、锛、镞、钺、璧、锥、铲、网坠、砺石、尖状器、星形器、花形饰件等,其中石斧占据了器类的主流。石器制作方法上以打制居多,少量磨制。陶片多见夹砂褐陶或黑陶,同时发现有少量磨光陶片,可初步辨识器型的有罐、盘等,纹饰可见绳纹、篮纹、戳点带状纹等。

该遗址发掘出土遗物与同期发掘且距此很近的上船口遗址发掘出土者,无论在制作技术上还是器物的形制上,都有很多相同点。遗址的年代亦可初步推断为距今3000~4000年间。(刘旭)

(六) 澜沧孔明槽古城址

孔明槽古城址位于澜沧县迁六乡腊撒寨后的一个小山头上,于2002年文物考古调查时发现。当地老百姓传说,城址的城壕为三国时诸葛亮南征至此挥马鞭一抽而成,城址因此而得名,此外,史料对此城址无记载。为配合糯扎渡水电站的建设,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有多项收获,一是发现了一种新的原始形态的环境城址。该城址除城壕和城墙(城墙为堆筑而非夯筑)外还有城围,城围、城壕及城墙由外向内依次将城市所在的山头环绕围住。除东面山脚现为寨子而未发现城围、城壕、城墙

外,南、北、西三面均有城围、城壕及城墙(西北端外的其余城墙已于近现代被夷为平地)。三面城围、城壕现存长度约550米,从地表仍可看出城墙的仅有城址的西北端。现存城围与城壕的高差在2米左右,城壕底与城墙顶的相对高差在城址的西北端约7米,城墙顶与城内地表的高差约4米。围突壕陷,壕深墙高,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充分保证城内的安全。通过发掘,获知城址的构筑过程:先挖城壕,将城壕的土少部份堆于城壕外侧形成土埂以作城围,在城围上栽种荆棘等植物作为防御野兽或外敌的入侵第一道防线;将大多数城壕土堆于城壕内侧的山坡地上使其高出城内地表形成城墙作为第二道防线。城内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因而不能确知城址的年代和建造者。但从城墙内的包含物及向当地村民调查了解,推测城址的时代为元明时期,建造者可能为傣族。这种推测,亦可从明代史籍中得到证实。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云南古代傣族“公廨与民居无异,虽宣慰府亦楼房数十而已,制甚鄙猥,以草覆之,无陶瓦之设。头目小民皆以竹为楼,如儿戏状。”明代钱古训《百夷传》言,古代傣族建筑“贵贱悉构以草楼,无窗壁门户,时以花布幃围四壁,以蔽风雨而已。”从这些记载看,至少在明代以前,由于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云南傣族的建筑多较为简陋。据民族学调查,滇南滇西南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傣族,在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其传统民居建筑干栏式建筑不用柱洞立柱,而是在地面上铺一石块为柱础。这或许是孔明槽城址只有城围、城壕及城墙而城内不见建筑遗迹的原因。

第二个收获是发现城址叠压了一个新石器遗址。该遗址出土石器900余件,器形近十种,有斧、砍砸器、切割器、磨石、锛、镞、矛、祖、圆孔六角星形器、角形石雕、圆盘形钻孔石器、石璧等,从加工技术看可分打制、磨制两类。石斧可分条形、梯形、靴形、钺形几种。石器中以圆孔六角星形器、角形石雕最有特点,为以前所未见,与同期发掘且距此较近的上船口遗址和白银渡遗址发掘出土者十分相似。

孔明槽古城址的特点是壕外有围、围上栽种荆棘、城墙为堆筑而非夯筑,围、墙之间形成深壕以利于防御,其时代虽晚至元明时期,但这种筑城方式从城市建筑史来看当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夯土城墙出现之前,夯土城墙应由此发展而来,所以孔明槽城址为一种原始形态的城址。孔明槽城址之所以到元明时期还停留在这一原始形态,是由于山高坡陡江河纵横阻隔等种种因素,许多古代民族进入云南后缺乏与外界的交往,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没有大的发展,保留了大量的早期文化特征,因而云南素有“古代文化的活化石”之称,孔明槽城址也说明了这一点,它为中国城址建筑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而各种打、磨制石器大大丰富了芒怀文化的石器种类,也为对芒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颖而珍贵的资料。(何金龙)

(七) 永善务基乡青龙村汉墓

2006年2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青龙村古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青龙村古墓为砖室封土墓,曾在1981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菱形纹砖100余块,现封土已夷平。经发掘,发现此墓属带墓道的、有左右耳室的券顶砖室墓,主墓室券顶早年已塌陷,左、右耳室保存较好,墓道口有三块石头封堵墓道,在墓道近墓门处有一处早期盗坑,但未及墓室。由于该墓早年被盗且墓室券顶已坍塌,没有发现葬具痕迹,随葬品亦被盗掘一空,仅在墓道口采集到汉式“五铢钱”,左墓室靠墓门两侧发现残陶碗底及数片陶片,在墓尾端底部有一铜质圆环,左右耳室底部残留两件银环。根据墓室结构及墓砖形制,及在墓道口采集到的汉式“五铢钱”,判断该墓葬为东汉时期墓葬。

该墓属当地较典型的东汉墓葬,此类型墓葬的出现说明汉文化已在同期乃至更早的时期传入该地,发掘为研究当地和民族提供了实物依据。

(杨帆)

(八) 会泽东川土府城遗址

明代东川土知府历经禄氏十九代。据龚荫《明清土司通纂》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3年),朝廷派西平侯沐英开滇,“东川土酋禄鲁祖附,朝廷授予姑姓古为东川土知府职,为东川第一代土知府,延至十九代”。土知府址几经变迁,明《嘉靖四川总志》卷四载:“西南马鞍山,府旧志在焉,后寻移万额山之南”。马鞍山,即今会泽县金钟镇乌龙募村,而万额山之南正是同属金钟镇的水城村所处的位置,东川土知府城由乌龙募移至水城当是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的事。关于水城土知府址的记载,据《东川府志》载:“‘禄氏水城’在罗乌门外,青龙山下,今毁。”另据赵淳《旧志》载:禄氏水城“四周皆水,石基仅存,尚有黑龛数户。”文献仅寥寥数语,因此我们对其建造形式、布局等状况的了解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为配合待补—昭通高速公路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曲靖市文物管理所、会泽县文物管理所分别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和2006年2月至4月,分两个阶段对位于水城村的东川土府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共揭露出护城河及相应的独具特色的附属堤岸设施遗存两段,并清理桥桩遗迹一处。

护城河宽度约18~30米,深约1.5米左右,河体横剖面大致呈锅底状,底部不甚规整,其中北段河道感觉开挖不够彻底,其中部顺河道走向发现有多道宽窄、深浅不一且不相连通的沟槽。护城河附属堤岸设施南北两段存在明显差异,南段护城河内侧河壁近岸沿处顺河道走向斜铺石板一列,石板多近长方形,厚约10~20厘米,长多在40~100厘米间,其正面及朝河心一侧加工较规整。河内侧岸边紧靠石板同样顺河道走向插有二至三列木桩,木桩均为两头尖之四棱柱体,粗7厘米左右,长多在140~160厘米间,多数一端桩尖出露地表,在已揭露的整个南段护城河

内岸均有分布。北段护城河内侧河壁近岸沿处未见斜铺石板及木桩,但发现铺有一层碎石块,石块大小多在5~10厘米间。桥桩位于南段护城河南部,大致西南—东北向横跨河道清理出木桩三列,多数直立,个别斜置;木桩少则一根,多则五根集中成一组;桩均为圆柱体,多数平顶尖底,直径在20厘米左右;个别桩或上部或下部发现有榫孔。上述木桩初步推断为横跨护城河桥梁的桥桩。

通过本次考古发掘,不但进一步验证了文献的记载,而且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土府城的认识。根据已清理两段护城河河道走向再结合今水城村地貌状况分析,府城平面大致呈椭圆形分布,分布面积18万平方米左右,尽管未见城墙,但新发现了以石板或碎石块加固内侧河岸,并在内侧河岸栽植尖木桩进行防御等设施,此类做法在其它城址发掘中极为罕见,这是与其当时府城所处的沼泽遍布的独特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桥桩的发现使我们对当时桥梁的建造工艺及做法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又可根据桥桩的具体位置分布推知府城西门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出入府城交通道路的大致走向。北段护城河极不彻底的施工以及简单的堤岸设施,是我们感受到府城局部区域建造之匆忙,或许从某个侧面说明该土府城使用时间不算长久。总之,本次东川土府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我省古城址研究的一个方面的空白,同时丰富了会泽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刘旭)

(九) 陇川麻栗树水库淹没区文物点

为配合陇川县麻栗坝水库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宏州文管所和陇川县文管所于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对淹没区内的新山古塔、牙塞墓地、吕着火葬墓地、吕着火葬墓地、广姐雷遗址、小广姆(傣语:佛塔)遗址和卢碗窑址七个文物点进行了发掘。

新山古塔位于清平乡政府所在地西南约2千米的缓坡台地上,周围种满甘蔗。由于早年屡次被盗,古塔已被严重破坏,塔身中部还长有一株高大的榕树。发掘表明,该塔为须弥座重檐方形砖塔,平面呈方形,实心,下有一地宫。出土贴金陶佛像头1个,铜佛像1尊,汉白玉佛像1尊以及一些陶珠和琉璃珠,全为佛教遗物。推测该塔始建于明朝初期,大约在清代中期废弃。

牙塞墓地位于清平乡牙塞村村北,清理前地面有7座石堆,每座石堆下均有一个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2米,宽0.5~0.6米,深0.3~0.5米,墓向多为东西向,没有任何随葬品。仅在墓葬填土中有碎陶片及瓷片出土,这些陶片特征与当地火葬罐陶片相同,应属于同一时期的遗物,时代为明清。相传德昂族先民有‘以摔碗来决定埋葬地点,在哪个地方摔碎就埋在哪个地方’的习俗,估计该墓地与德昂族有关。

吕着火葬墓地位于清平乡吕着寨子南部及东南部的缓坡地上,墓地破坏严重。发掘共清理墓葬31座,墓葬墓口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墓口直

径0.4~1米左右,深0.2~0.6米。葬具多为陶罐,有少量釉陶罐和壶,瓷碗、碟多与陶罐组合出土,均为当地烧制。个别火葬罐内残留有骨渣,无随葬品。现居住于当地的傣族和景颇族群众一直相传这些墓葬是德昂族先民遗留的。

广姐雷遗址位于清平乡户宛寨子的村后山和村东北,遗址紧邻密林。清理前,当地的村民都认为这两处是佛塔遗址。发掘表明:广姐雷遗址原为一砖石结构的长方形高台建筑,南北长10米,宽5米,残高1.5米,在东北和东南角有专供人上下的石块。房址底部垫一层厚0.1~0.2米的红烧土硬面,在硬面上砌长方形石基,内部填充夹砂石的红褐色土,再在其上砌砖,在内部则平铺地砖。在房址的东南部发现大量板瓦、筒瓦以及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推测该建筑为石基砖墙瓦屋顶。另外在基址东南角附近发现中心为圆穿的圆形大石头一块,圆穿未穿透,与一般寺庙中用于烧香的石座极为相似。出土少量青花瓷片,青瓷灯柄以及带网格纹、绳纹的陶罐、钵、盘等,据此推测该遗址的年代为明清时期。从房址的结构、出土建筑构件的特点以及石座推测,该房屋建筑不是一般的民居,应是当地少数民族用于祭祀的奘房。

小广娥(傣语:佛塔)遗址位于户宛寨子村东北,遗址周围有茂密的竹子和树木。发掘表明,该遗址为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略呈长方形的台子,在台子正中还砌有一供奉神灵的佛龛。在佛龛外侧的堆积中发现一清代的“道光通宝”铜钱。当地的傣族群众传说,他们的先民200年前迁居于此,认为遗址是德昂族的遗留物,我们初步推测该建筑是古代居民祭祀神祇的场所,其时代应为明清时期。

户碗窑址位于清平乡户碗村的东南角。窑为一球状体,窑的周边均匀分布六个烟囱。窑门位于窑体的北面,有拱形顶,供装窑和取成品,火门位于窑体的东面。窑顶到窑内地面高度为4.4米,窑体最大直径在其中部5.7米。建筑方法是在底部用方形砖横向放置逐层外扩,中部竖直砌3层方形砖,再向上用楔形砖纵向排列逐层内收,直至顶部留一直径50厘米的圆孔。窑底直径达4.4米,底部中央有一椭圆形火塘,火塘以东至窑壁形成一略呈扇形的窑室。呈放射状排列,便于搁置砖瓦和其他需要烧制的器物。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在建成以后经多次修整,窑内出有碎瓦片,推测该窑适用于烧制瓦。据当地村民介绍,20世纪60年代,当地村民还使用过。该窑形制较特殊,在陇川县境内并不多见,与现代烧制砖瓦的窑也有很大区别。

麻栗坝水库淹没区内的七个文物点均位于清平乡南宛河的两岸,遗存年代大致相同,但类型比较丰富。遗存既有佛塔、奘房,又有祭祀遗址,还有窑址和墓地,对我们了解该地的古代文化面貌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蒋志龙)

(一〇) 云龙功果桥桥头遗址

为配合小湾水电站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12月,对功果桥桥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

积200平方米。

功果桥位于云龙县旧州镇功果村,东西向横跨澜沧江。功果渡口,原是云龙井盐运供保山、腾冲等地之捷径。1912~1916年,省参议员王九龄、董坊等人建议省政府在功果修建铁索吊桥,未果。后经多方集资,于1921年由字肇图负责设计施工并建成铁索吊桥,名为“青云桥”,此桥仅可通人马。1938年在铁索桥上游8米处,利用青云桥护岸增建桥台,建成可通汽车的公路吊桥,始称“功果桥”。功果桥建成后,一桥通车,一桥行人。1939年至1940年,为适应抗战运输的需要,在功果桥上游700米处又建成钢索吊桥一座,名为昌淦桥。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出动飞机200多架次对澜沧江流域进行轰炸,青云桥、功果桥及上游的昌淦桥均被炸断,除昌淦桥被修复外,青云桥和功果桥仅留桥头遗址至今。

考古发掘对功果桥的东西两岸桥头进行了清理。功果桥东岸现已跨塌,故对青云桥桥头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弄清了该桥头的具体建造方法为:利用江岸岩石,在岩石上凿岩沟一条,再于沟壁两侧上凿穿两洞,用于穿系铁索;铁索固定后,再在岩沟上用石板封盖;最后在江边以大石块垒砌成桥墩和护岸。

功果桥西岸发掘,发现了老滇缅公路弹石路面和护桥设施基础,以及加劲牵拉桥梁的牵拉墩等遗迹。同时,在桥头两端出土了建桥留下的铁钉、铁销等建桥构件,和日军轰炸功果桥时遗留的弹片。

对近代建筑遗存的考古发掘,在云南考古学史上属首次。本次发掘获取的资料,为云南桥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一一) 江金莲山青铜墓葬

金莲山青铜墓葬位于潞江县右所镇旧城村的金莲山。金莲山海拔1806米,相对高度50米,西距县城3公里,南离抚仙湖岸约3公里。墓葬分布于山顶和山坡,面积达5万平方米。因遭盗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以及潞江县委文体局于2006年3月开始,对被盗挖的部分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墓葬142座,出土文物500多件(有青铜器、铁器、铜铁合铸器、陶器、木器、玉器等)。

此次发掘获得多项重大发现,对研究云南青铜文化和滇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金莲山青铜墓地面积极广、墓葬密集(从此次发掘发现的墓葬密集度推算,总数可达1000多座),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面积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青铜墓地;墓地时代跨度大(从出土青铜器的形制分析,有专家认为墓地的上下限为战国至东汉),几乎跨越云南青铜文化的主要发展阶段,对研究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衰落提供了新材料。潞江金莲山青铜墓地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昆明羊甫头青铜墓地彼此相距不远,位于古滇国的核心区域,此次和今后的发掘对于滇国历史的研究

意义重大。发掘发现,金莲山青铜墓葬普遍存在着叠肢葬、二次葬和断肢葬的现象,人体遗骸多数保存完整,均为此前的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发掘所罕见,对云南古代丧葬文化研究和墓主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掘

还发现一些专供随葬用的锄、铲等青铜明器,所暗示的意义耐人寻味。

(李洪海)

(云南省2006年度考古新发现由杨德聪统稿)

十五. 浙江省

(一) 浙江长兴江家山遗址

江家山遗址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西北约2、东距县治雒城镇约15公里。200年4月~2006年1月,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二期工程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家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面积近2700平方米,主要清理了马家浜文化河沟2条,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墓葬共220座;崧泽文化房址3座,红烧土堆积7处;崧泽、良渚和马桥文化灰坑18个。主要收获如下:

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遗存主要有沟(G3、G4)和墓葬。G3、G4宽约15~20、深约2米(沟内马家浜文化堆积约1、崧泽文化堆积约1米),分别位于发掘区的东、西端。G3呈东北-西南走向,G4呈东南-西北走向,因暂时未能完全揭露,并不排除它们本是一体的可能。G3、G4出土遗物较丰富,陶器以外红里黑喇叭形圈足豆、平底釜和泥质红陶带管流的平底盂为主;兽骨种类有象、牛、猪、狗、鹿和禽类等;完整的木耜、木质漆柄更为同类遗存所罕见。此外还出土了大型的木构件、磨制精良的骨器和较多的植物遗存。多数遗物出于河沟的南岸边。

墓葬46座,多数位于G3的东南岸上,有些墓葬埋设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目前仅知土台堆筑在生土面上,东西宽约25、厚约15厘米。土台的土色为黄褐色,与生土较相似,也许与沟的形成有关。一些墓葬的排列方向与G3的走向一致,有些墓葬就埋葬在沟岸旁。出土随葬品54件,其中陶器32件,以釜、鼎、豆和纺轮为主;石器19件,以锛、纺轮和砺石为主;玉器3件,为璜、块。仅出土1件随葬品的多为石锛或纺轮;14座墓葬无随葬品。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以朝南为主。面向朝西或东,数量大致相等,少数朝上或朝下。葬式主要有略侧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少数墓葬在开口面上放置石块或砺石为标记。略侧身直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时,手多放置在骨盆上,手中或手旁多放置小陶釜、锛或纺轮。略侧身直肢葬时,躯干的某一侧多倚靠在坑壁上。随葬的陶器常会被打碎后散乱地放置在墓坑中。

崧泽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和居住址。墓葬173座,可分为早、晚期。随葬品377件,其中陶器227件,石器126件,玉器14件。无随葬品的墓葬52座。陶器组合主要为鼎、豆、罐、壶和纺轮,其中纺轮30件;石器中钺12件,锛69件,多孔石刀2件,大型网坠5件,纺轮22件,砺石7

件,以锛和纺轮为主;玉器中璜2件,块6件,余为坠饰。

墓葬多埋设在堆筑的土台上,这样的土台有4处,有的土台叠压在G4上,由此可知在崧泽文化阶段河沟已废弃。早期墓葬延续了本遗址马家浜文化墓葬的各种特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以朝南为主。面向或西或东,少数朝上或朝下。葬式主要有略侧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此外还有一座异穴合葬墓和一座多人合葬墓。异穴合葬墓中2人均成年,女性下葬较男性晚,并打破了其墓坑,但未破坏骨架;男性在东,仰身直肢葬,双手叠置骨盆上,随葬石锛一件放置在右手旁;女性人骨架倚靠在男性骨架西侧,侧身直肢葬,无随葬品。多人合葬墓墓坑近长方形,在墓坑底部散乱地放置些许人骨,4个较完整的人头骨距墓底有些空间,随葬一件陶鼎,或为家族的集中二次葬,或为因战争而死的合葬。

而晚期阶段的时候人们曾对遗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平整,在发掘区域内从东到西几乎都有一层红烧土的铺垫层,厚度约20~30厘米。晚期阶段的土台在筑高的同时还向南进行了拓展。墓室结构依旧,头向皆朝南,葬式也由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的多样性变得较为简单,主要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等,而随葬品数量明显增多,平均每墓约5件。

清理了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房址遗迹3处,有的柱坑打破了墓葬。F2平面呈长方形,未见基槽和墙,房址四周柱坑排列分布,中间一排柱坑将房子分隔为南、北间。有的柱坑底部平置砺石或堆放红烧土块为基础。

崧泽文化地层和墓葬中出土了14件形制较大的石网坠,其中墓葬出土5件,地层9件。推测当时、当地有较大的河流或水域的存在,是否和G3、G4有关还需确认,也反映了渔猎为当时的经济模式之一。

经人骨鉴定,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石锛的皆为男性;随葬纺轮的绝大多数为女性;墓葬出土石锛83件,纺轮60件;地层出土石锛121件,纺轮23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工情况。

另外还清理了良渚文化早期墓葬1座、灰坑1个和马桥文化灰坑5个。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小,堆积也较薄。而马桥文化层中则包含了早期遗存各阶段的许多陶片,这应该是其对遗址扰动的结果。

江家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保存较为完好的人骨架,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和埋

葬习俗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遗址中出土的一种泥质黑陶假腹杯形豆也见于同处太湖西南部的湖州邱城、毗山、长兴台基山、安吉芝里等遗址,显示了当时该区域的文化共性。而遗址中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与太湖西部的金坛三星村遗址的面貌相对接近;崧泽文化墓葬的有些随葬品与崧泽遗址中层、南京北阴阳营和潜山薛家岗遗址也有相似之处。这与遗址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楼航 梁奕建 华山 童善平)

(二)浙江长兴七里亭旧石器时代遗址

2005年9月~2006年5月,在杭长高速(杭州到长兴高速公路)建设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兴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长兴县泗安镇白莲村的七里亭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实际发掘7个月,总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发掘至属中更新世网纹红土下的砂质粘土层。

长兴县位于浙江西北部,全境地势属浙北低山丘陵向太湖平原过渡地带,呈西北和南部高,中部、东部低。2004年在杭长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了七里亭遗址,当时在地层中找到1件燧石刮削器。去年再次到该地点调查,发现3件石制品。根据长兴县发现旧石器地点的时间顺序,将该地点编为CP029。此处西距C009地点约500米,遗址南距西苕溪支流泗安塘约1.5公里。

发掘区域的地层可划分为19个堆积层,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石制品分析,初步划分出上、下文化层,表土下的第2~5层为上文化层,厚100厘米,属于下蜀土堆积,而下蜀土下的第6~13层则为中更新世的网纹红土,厚度约600厘米,为下文化层堆积。包括采集标本及东晋墓内填土中发现的石制品在内,共发现约760件石制品,其中上文化层的石制品约210件,主要以石核、石片为主,少量断块,石器只有宽刃类中的刮削器和砍砸器及球形器等,不见尖刃类等其他石器;下文化层约530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尖状器、石砧、石锤等。

上、下文化层的石制品岩性有砂岩、石英砂岩、硅质岩、石英岩、燧石等多种,以砂岩、石英砂岩为主。除少量石核外,上文化层的石制品个体较下文化层小,下文化层的石制品多粗大而厚重。剥片技术基本采用锤击法,大多数石核以砾石为原料,石核与石片自然台面居多,但打击台面也有一定比例,剥片方式有单向、转90度角、多向及沿周边剥片等。

上文化层的石核有125件,石片68件,宽刃类13件,其中刮削器10、砍砸器3、球形器4、断块4件。石片的个体相对较小,形态上以梯形石片居多,部分石片的远端宽度很大,大多未经修理成器,有少量的打击台面,半锥体明显,背脊特征大多有纵向交脊。

下文化层的石核约220、石片约100、宽刃类约80件,其中刮削器约30、砍砸器约40件,尖刃类中手镐5、断块123件。其中以砍砸器最有特点,一种如T4:63者,在砂岩

的一端向较凸的砾面进行二次修理,形成略呈弧状的单凸刃砍砸器;另一种砍砸器10件,器体呈斜覆斗状,刃部均位于覆斗状原材底面的一或两边,而相对较小的一端成为把握石器的部位,这种砍砸器可以认为是七里亭遗址的典型器。另一类重型石器是手镐,但数量很少,其特征与在该县调查所得的手镐无二致,均在砾石或岩块的一端用锤击法修理成正尖的尖刃,尖刃形状为小圆头形的钝尖。发现的2件石砧有磨蚀,尽管没有发现碰砧法特征明确的石制品,但提示七里亭遗址有可能存在着用碰砧法打制石器的技术。

在发掘区西部网纹红土之上的紫红色粘土层中,发现一个加工石器的活动面,在这个活动面上发现面积约3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数十件石制品,其中有石核和大量的石片,这些石片中有5个可以拼合在一起的组合。

除上述的5个拼合组外,在网纹红土中发现4个拼合组,其中的T1:264与T3:59拼合组石制品的水平间距达15米,没有观察到在这个拼合组所在的地层堆积存在水流搬运的迹象,由此可以认为是原始堆积。

根据野外对石制品的粗略观察,考古人员对七里亭遗址石制品组合有了初步认识:1. 石制品主要原料是砂岩和石英砂岩,其次是石英岩和硅质岩等。其原材大多为河流砾石,表明属就地取材。2. 采用锤击法生产石片,上文化层石核沿周边剥片和转向打片的增多,石核和石片的打击台面也呈上升趋势,表明其生产石片技术比下文化层有所进步。3. 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中的器体呈斜覆斗状者为该遗址最具特色的石制品,周边地区还未曾发现这种砍砸器。4. 修理石器用锤击法,修理方式以向背面或向破裂面居多,还有用复向和交互打击的,错向加工见于砍砸器的修理上。

发掘所得石制品与在西苕溪流域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组合基本类似,同样属于中国南方主工业,但有适合小流域的某些地方特色。从各地层均发现有石制品分析,该遗址从中更新世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的某一阶段,人类在这个遗址的活动没有间断,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初步判断为加工石器的活动面和其他石制品拼合组的发现,说明某些时段人类在这里停留过较长的时间,或者说这里是持续活动频繁的营地。这次发掘,对进一步了解西苕溪旧石器遗址的分布规律、与之相关联的生态环境以及对南方砾石工业的深入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同时对探索砾石工业的区域性特征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徐新民 梁奕建 汪良 梅岩辉)

(三)浙江龙泉窑大窑村枫洞岩窑址

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烧造历史之悠久、窑址分布之密集、生产规模之庞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

2006年9月~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位于浙

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取得了重大成果。

遗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器,其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特别是其中“永乐九年”等纪年文字的发现,对龙泉窑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地层的确立,是本次发掘的一大收获。在许多探方内都发现了明确的明代地层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瓷器。

在出土瓷器中,有碗、大墩碗、盘、执壶、高足杯、爵杯、荷叶盖罐、炉、香熏、洗、瓶、花盆、笔架、笔筒、人物及动物塑像、灯、砚台、砚滴等,类型丰富,品种多样,器型端巧精致、釉色莹绿润泽。

另外还出土了一些生产工具,如碓头、碓柱、石磨、荡箍、轴顶碗、火照、火照钩、投柴孔塞、修坯刀等,很多都是极为难得的发现,对研究当时完整的制作生产过程都有较高的价值。

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采用刻、印、划、贴塑、压模、捏塑等多种手法,装饰纹样有龙纹、凤纹、双鱼纹、八卦纹、人物故事、回纹及多种花卉果木纹饰等,变化多样,组合巧妙。

此外,瓷器和窑具上还发现了许多文字,既有标志使用者或制作者的铭记,如顾氏、顾间祠堂、王氏、毛字记号、李用记号、陈置、桂林用等;又有吉祥用语,如金玉满堂、大吉、福寿等;更有制作样式和用途的记号,如官、三样三个……等,以及纪年文字“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这些文字材料既是窑场生产情况的真实反映,又对判断窑场的性质和年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生产作坊遗迹的大规模揭露,是本次发掘的又一重要成果。整个陶瓷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诸如堆料场地、成型车间、烧成窑炉、居住存货等遗迹,均有大规模的揭露,这在陶瓷考古中也是少有的。本次发掘共揭露房子6处,包括至少有7次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1处,辘轳坑2处,素烧炉1处,储泥池3处,井1处,以及与房子配套的卵石铺的路面11处、排水沟14条、石墙和匣钵墙体23处。

其中Y1保存较好。该窑炉长29.6米。窑头部位发现有相对完整的火膛、通风口和通风道,窑炉两侧发现有柱础石、护墙和排水沟。排烟室保存完好。

而窑炉北侧的房屋建筑,其考究的建筑设施和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显示出窑场主人的富有,房址长22、宽11.8米,由房基和院落组成,房基周边用卵石包边;院落地面多用菱形方格图案的卵石铺成,院落的东南角有一门与窑炉烧成区域相通。在房基上出土的“顾间祠堂”瓷片,暗示了其建筑的功用,为研究当时的窑场生产组织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另外,发现辘轳坑和旁侧的一个由石块组成的圆形台面,用于拉坯和存放拉坯所用的瓷泥,如此配套的拉坯场

所也属首次发现。

找到了龙泉窑在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大明会典》卷一九四·陶器条:“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本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器形有梅瓶、玉壶春、执壶、碗、盘、高足杯等。这些瓷器的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主要出土于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地层中;而传世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两岸故宫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等处的收藏,说明其性质不是普通民用产品。特别是出土瓷器上刻有五爪龙、“官”字款等,对文献中关于处州烧造宫廷用瓷的记载,作了很好的诠释。

遗址出土的瓷器,对当时宫廷用瓷取得途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在出土的明代标本中,双鱼盘内印有“式号”字样,而在一垫具上则划写“三样三个,花;三样三个,内花一个;二样三个,光;四样二个,光;二样碗五个,花”等文字。而出土明代宫廷用瓷,其器形和纹样与景德镇出土的宫廷用瓷相同,应该是采用了相同的图样制作。这验证了文献中记载的“须要定夺制样”的规定。

“式号”应是一个器物型号,是按照宫廷给的样制作的。而“样”还不是成品,应根据宫廷给的图样制作的样品,还处于宫廷用瓷生产中的中间环节,有待宫廷审核认可后,才能批量制作,如果没有达到标准,还得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或重新制作。此垫具的发现,不但说明了样品的型号,而且还给出了样品制作的数量。

尽管本次考古工作还是阶段性的,但其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

2005年9月~2006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对上山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证实并丰富了作为遗址主体的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年代约在距今11000~9000年间。同时新发现了较晚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掘工作尚未结束。

此次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灰坑、灰沟150多个(条),修复陶器20余件,出土打制石器约1000余件。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石球、石磨盘、石磨棒和极少量的属于晚期阶段的磨制石器。有机质遗物仅发现一件带有切割痕迹的腐残鹿角,属早期。

早期遗存 遗迹现象主要分灰坑和柱洞。灰坑有较规整的圆型坑、方形坑和不规则的浅坑,多数仅见极少量的陶片和石器。柱洞多呈圆形,底部不见础石。

陶器中大敞口盆是最重要的器物形态,此外还有双耳罐、大平底盘、镂空圈足盘等。在众多的陶片中,发现了习惯读为“釜”的口沿片,但在2件复原陶“釜”的底部均发现了圈径很小的圈足痕迹,这种器形在东南沿海地区新

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陶质大多为外红内黑的夹炭陶,胎质中普遍裹和草本植物碎料。胎体内部可见到分层挤压的层理现象。陶器的装饰手法除红衣外,还发现少量的绳纹、堆贴、镂空,口唇部位还见有均匀分布的短线刻纹。

打制石器分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数量最多、工艺特点最鲜明是石片和石片石器,石片基本可分为背面有剥离痕、背面为原始石皮和无明显劈裂面、“双阳面”等几种。背面有剥离痕的标本最多。部分见有二次加工痕迹或使用痕迹。石器的原料多为鹅卵石,石质多为粉砂岩。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磨盘、“磨棒”、石球等。磨盘体型较大,磨面凹弧、底面未经加工。“磨棒”多呈有多面磨痕的条块状,碎块的比例较高,应该是“磨棒”常常又充作石锤的缘故;另一种为底面磨平的自然卵石。石球继续有发现,应该与遗址的功能分区有关;块石的边角部经反复锤击、使用,久而久之可以变成球状,但不少标本的浑圆程度很高,应该是特意加工出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掘过程中对可供浮选的土样标本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采集,目前已经在H52发现残损的稻米一粒。

晚期遗存 灰坑的共同特点是上圆下方,呈不规则圆形敞口的直壁平底方形坑。上部的浅圆坑或可理解为掘坑过程的自然遗留,但H150的结构呈一个大的浅圆坑中套2个方坑,可见上部的浅圆坑具有一定的功能。部分坑的底部还发现有深度不超过10厘米的小圆洞,坑内填土多可分层,并常常夹杂炭屑。

遗物以陶器为主,夹砂陶为主,陶色偏灰褐,偶见黑陶片,器形有釜、罐、盆、盘、钵及圈足器,值得指出的是,陶片中还发现短小柱状足。在釜类器的口沿片中,可以看到跨湖桥、楼家桥等遗址中常见的呈外薄内厚、沿面微凹特征的标本,另外口、耳现象比较普遍,绳纹也有少量发现。

初步认识 将上山遗址早期遗存作为距今万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认识,并以之与国内发现的同期其他遗址比较,不难发现2个特点:一是陶器的胎质为夹炭陶;二是陶器的形态相对丰富,出现平底、圈足、圈底器。这些陶器与纯粹的打制石器共存,构成一个另类的文化特征。这一特征可引出2种假设,一是遗址的年代测定可能偏老,二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个独立的分区,尤其在陶器起源上另有源头。

自跨湖桥遗址发现,关于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跨湖桥遗址引出了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遗存的关系,但论证尚粗浅。将上山与跨湖桥联系起来,或许可以看到这一地区陶器领先一步的合理性。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打制石器问题。虽然在其他地区,打制石器可以沿用到很晚的历史时期,但在东南沿海地区,这种现象似乎并未波及。虽然在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鲇

山遗址发现过与磨制石器共存的小石器,但这种小石器与上山遗址相比,在工艺特点和大小形态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打制石器作为纯粹的石制工具与陶器共存,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上山遗址晚期遗存中,最使发掘者感兴趣的是小型柱状足的发现。上山遗址的发现和跨湖桥遗址的再发现缘于浦阳江流域的考古调查,而浦阳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又缘于诸暨楼家桥遗址的发掘。楼家桥遗址最主要亮点就是以有脊釜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陶器群居然在这里与一种柱状足鼎有共存关系。一般认为,太湖南域鼎最早出现的时间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这种特征明显的双目式足鼎在钱塘江以南的出现也已到了河姆渡遗址晚期。浦阳江流域在较早阶段就出现了鼎,而且与双目式鼎不是同一种类型,这是否意味着别有文化渊源呢?上山晚期遗存为探索浦阳江流域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及其文化传承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蒋乐平 盛丹平)

(五)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

2003年6月~2004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湖市博物馆曾联合对位于林埭镇的庄桥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良渚文化时期最大墓地。为了进一步廓清这片墓地的范围和布局,在平湖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5~9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与平湖市博物馆再次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庄桥坟遗址进行二期发掘。本次发掘紧贴一期发掘的东边布方,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35座,出土随葬品约400件,其中陶器约280件,石器约50件,玉器约30件。

这次发掘所揭露的遗迹现象与一期发掘所揭露的基本相似,证实一期发掘的土台3向东延伸到T503、T504、T603和T604探方,并且还延伸出了本期发掘区的东部(即土台3的东缘仍在发掘区以外)。土台由黄斑土堆筑而成,除墓葬打破土台以外没有发现其他遗迹。土台仍表现为一个不断向四周扩大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良渚人安置了4座东西向的墓葬和2个狗的祭祀坑。与一期发现相同,东西向墓的葬式有屈肢葬,而不见随葬品,这些死者中有未成年人。

总体来看本次发掘墓葬的分布不如一期发现的那样密集,但T603和T604东部的墓葬分布密度有所增加,从现场迹象判断,这片墓葬区还没有全部揭露。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多寡不一,多者约20件。个别墓葬的葬具痕迹明显,如M271发现有葬具盖板的遗迹,而且在墓坑的北端放置了一条狗,狗屈肢置于墓坑的西北角,狗的骨架保存较好,其头骨却背向墓主人的脚端,这与一期发现的殉葬狗面向墓主人脚端刚好相反,这种差异性是否另有含义还有待整理研究。

随葬品中的陶器有鼎、豆、双鼻壶、壶、簋、罐、盆、盘、宽把杯等;石器主要有石钺、石镞、有孔石刀等,而石钺的形制则较为丰富;玉器主要有玉镯、玉锥形器、玉坠、玉珠

等;骨角器有骨镞、骨锥、靴形器等。

新发现的墓葬在布局上与原来的相同,年代更为集中,使考古工作者对庄桥坟的埋葬布局、葬俗习惯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资料。殉葬狗和狗祭祀坑的再次发现,显示了狗在庄桥坟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

(程杰 杨根文 徐新民)

(六)上虞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

尼姑婆山窑址位于浙江省上虞市上浦镇大善村,地处曹娥江中游的西侧,其地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窑址的密集分布区域。自东汉晚期成熟青瓷在该区的小仙坛窑址诞生后,曹娥江中游两岸的青瓷生产长期处于我国早期青瓷生产的领先地位。

尼姑婆山窑址是越窑三国西晋时期的典型窑场,鉴于该窑址近年面临当地生产建设的破坏,200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上虞市文物管理所、上虞市博物馆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龙窑1条,类似作坊遗迹1处,并获取大量瓷器及窑具标本。

龙窑由火膛、窑室和排烟坑组成,全长约13米(排烟坑部分被现代墓叠压),窑宽2.2米,窑壁残高0.15米~0.3米,窑壁的向火一侧具有坚硬的烧结面。龙窑的建成系在自然山坡上挖一浅槽,然后紧贴浅槽以土坯砖(生坯)堆砌窑壁及窑顶。火膛平面呈长方形,宽2.2米,进深1.7米,火膛后壁高0.5米,紧贴火膛后壁设有一级踏步台阶,表明窑工可由火膛正面出入,从而也可解释大量废品堆积形成于龙窑左侧前方的原因。窑室长10.2米,宽2.2米,窑底留有若干垫具、间隔具及最后一窑的废品,并局部保存有自窑顶坍塌的拱顶块体。窑室明显分前、后段,前段长4.2米,后段长6米。窑室后壁由土坯砖砌成,且留有通风的缺口;尾部的排烟坑紧邻窑腔后壁,系一长方形浅坑,因现代墓葬叠压,未作完全清理。

类似作坊的遗迹,位于龙窑的右侧前方。揭露了一条长约9米的水沟,水沟起点处为一圆坑,圆坑附近有许多釉陶缸残片(为同件釉陶缸),推测可能是浸釉缸。除此,还发现有4个取土后形成的形状不一的土坑。当时的作坊可能多为因陋就简的临时建筑,未能发现类似柱洞、柱础等遗迹。

窑址出土的窑具,数量众多,主要有间隔具和垫具。间隔具,是在2件器物之间作间隔叠烧的窑具,有三钉饼形间隔具(主要用于碗类器的叠烧)和锯齿口孟形间隔具(主要用于碗、平底樽、洗等的叠烧),与产品的大小匹配,每一类间隔具的大小规格差异约有20种。垫具,指置于窑底用于承托器物外底的窑具,形式较多,有束腰形、钵形、筒形、孟形、浅盘形等,除大小规格的差异外,还有高矮之分,通常置于窑腔后段的垫具较高。窑具上间或刻划、模印有文字及刻划符号等,文字有“朱君”“朱”“范”等。

窑址的产品十分丰富,有碗、钵、罐、双唇罐(泡菜

坛)、盘口壶、盂、水盂、三足圆砚、扁壶、虎子、各式器盖、三足樽、平底樽、洗等,釉色多为青绿、青黄,胎质细腻,烧结程度良好。装饰题材丰富,压印、戳印、刻划的纹样主要有斜方格纹、连珠圈纹、连珠花蕊纹、龙纹、栉齿纹、水波纹等,粘贴装饰的主要有兽面铺首、佛像、麒麟、凤凰等。最为精彩的是一批动物造型的器物,有虎头罐、鸡头罐、牛头罐、马头罐、鹿头罐、蛙形水盂、狮形器、大象形器等,无不写实逼真。三足樽是较能代表该窑工艺水准的器物,器型硕大,口径最大的有40多厘米,贴塑的佛像、兽面铺首,清晰且富有立体感,压印的斜方格纹带规范而清晰,三兽足造型生动,其精美程度在浙江同期墓葬的出土物中罕见,又如大型器盖、牛头罐、马头罐等器物,也是同期墓葬中罕见的精品。上述的多数器物及各类器物的纹样装饰,屡见于三国、西晋的纪年墓葬,多数器物具有该期的典型特征,故断代为三国吴末至西晋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同期墓葬中习见的堆塑魂瓶、猪圈、狗圈等明器,在窑址中无一所见,似乎表明该窑是专门生产实用器物的窑场。

三国西晋是早期越窑发展的黄金时期,尼姑婆山窑址是三国西晋时期的典型窑场,代表了当时青瓷生产工艺的最高水准。此次发掘揭露的龙窑首尾完整、保存良好,获取了大量精美的青瓷标本,并能清晰揭示出各类瓷器的制作、烧成工艺,是三国西晋时期瓷窑址考古领域的重要发现。

(郑嘉励 张盈)

(七)宁波市考古

2006年是宁波文物工作“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宁波地域考古工作全面推进的一年。一年来,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批团体考古领队资质为契机,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为主线,积极开拓,有条不紊,全年共开展奉化白杜南岙村石菊花地建设地块、高速公路江北连接线、鄞州姜山山西村古墓、江北慈湖景区建设工程、甬台温高速铁路奉化段、宁波市区和义路二期工程建设地块、鄞州姜山山西村小溪坑地块、鄞州东吴小白村蔡沟塘地块、鄞州横街溪下水库明墓、奉化奉南输变电工程、慈城新区建设工程和奉化中心粮库建设工程等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10多项,勘探与发掘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勘探和发掘过程中共发现宋代码头遗址1处,清理古代墓葬百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数百件(套),其中以宁波市区和义路二期工程建设地块发现的宋代渔浦码头遗址和奉化中心粮库建设工程考古发掘较为重要。

渔浦码头遗址位于宁波市区和义路以北的余姚江边,2006年11月为配合和义路二期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时发现。码头遗址建造于海相沉积淤泥之上,由于受发掘场地限制,遗址未能全部揭露,初步推测其平面呈“凸”字形,已揭露部分平面呈L状,石包土心结构,残高1.04米,面江宽5.7米以上,进深残宽5.38米。木桩基础,条石砌筑,石灰粘接。顶桩石露脚0.1~0.2米,其上全由规整的条石和块石包砌,上下条石之间有0.01~0.02米的收分,隔一段距离有

一根垂直的拉攀石。包石宽 0.7~1 米不等,转角处加宽,并有木桩加固。顶桩石外侧另有护脚石,宽 0.5~0.8 米,用碎石和卵石铺成。根据遗址所处位置及地层叠压关系,并参照相关地方文献记载,初步判断其为宋代的渔浦码头遗址。

奉化中心粮库建设工程考古发掘始于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4 月全部结束。共清理古代墓葬 62 座,窑址 2 座,墓葬形制结构可分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墓、平面刀形砖室墓、平面长方形砖室墓、并穴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几种,时代从三国东吴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发现的 2 座窑址均为方形砖窑,结构由窑道、火门、火膛、窑室、窑算、火道和

烟囱组成,时代均为晋代。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盆、钵、罐、灶、甗、盏、鼎、甑、洗、鏝斗、三足盆、五管瓶、碗、耳杯、香薰、剑、矛、琉璃耳珰、钱币等一大批珍贵的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等文物。这批墓葬的集中发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该地区人们活动的频繁,同时严谨的墓葬结构和丰富的墓砖印纹也反映了当时砖室券顶墓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出土器物组合虽不完整,但仍可看出以本地所产越窑青瓷为主,反映了当时越窑产品产销两旺的盛况。

(王结华)

(上接第 187 页)

必不可少的资源,是农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秦统治者特别重视粮食的储存、使用,在粮食管理方面作了封印、登记、核验、负偿、人事、宿卫等一系列法律规定^②如《仓律》中对粮食入仓、出仓,规定了严格的手续,谷物入仓,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负责发放粮食的仓啬夫、仓佐各开一门,由他们独自封印,以便出仓,到仓中没有剩余时才再给他们另开一仓门。并用封印防止贪墨、检验奸萌。秦还规定粮食簿籍制度,即粮食进出仓的登记造表和呈递。《仓律》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③,平时,无论是粮食入仓、出仓,还是增积,粮仓官员都要会同县、乡有关人员随时随地填写簿籍,会总后,年终上计,各县要上报太仓审核:“至计而上会籍内史”。^④在《效律》中还规定:谷物、刍稿贮藏在仓里,有超出或不足数情形而隐藏不报和种种移多补少、假作注销而用以补垫其他应赔偿的东西,“皆与盗同法”,惩罚很严厉。《内史杂》规定贮藏谷物的官府要“有实官高其垣墙。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乌会及仓茅盖者。令人勿近舍。非其官人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敬)。有不从命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⑤建筑粮仓要高筑围墙,防火防盗,不是本官府的人员,不许在其中居住,夜间还要严加守卫,关门时即应灭掉附近的火,谨慎警戒,粮食管理人员不遵守上述法令而致使粮食被盗、霉烂、失火的,则严惩不贷,轻者谪之,重“赀”、“赀”、“赀”并罚。粮仓有鼠穴也要受罚:“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谪。”^⑥仓房门不紧密、容得下手指或撬动的工具“容指若抉”,也要罚一甲。秦国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保证了秦国政府对这一关系到国家生死

存亡的战略物质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仓律》中提到一般的县“入禾仓,万石一积”,一积就是一堆,其规模可观;至于战略要地如“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⑦粮食储备更是惊人。无怪乎史载其境内“积粟如丘山”。粮食的大量储积,大大增强了秦国国力,对秦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云梦秦简中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禁苑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耕牛和粮食管理制度等,无不反映出秦人对经济资源的保护意识,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 ①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2 年。
- ②、④、⑥、⑪、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年。
- ③ 梁启雄:《荀子简释·王制》,中华书局,1983 年。
- ⑤、⑦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 年。
- ⑧ 《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 ⑨ (春秋)管仲:《管子》卷十四水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⑩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 年。
- ⑪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⑫ 蔡万进:《云梦秦简中所见秦的粮食管理制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 15 卷,第 4 期。

(责任编辑:刘慧中)